

右派情踪

（新西兰）周素子 来源:北京之春

作者简介：生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老家在浙江乐清。十五岁始至杭州受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后考入福建师大艺术系音乐专业。大学毕业证书，要到八〇年代落实右派政策后才拿到的。是补发的。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即被下放到宦溪林场劳动改造。一九五八年冬，到北京与同为右派的陈朗先生结婚。并于一九六〇秋跟随陈朗先生，帶著才一岁的大女儿，同到兰州。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陈朗被判刑关押在青海红古劳改农场达十三年之久。直到一九七八年，所谓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后，才得以被浙江省右派落实政策办公室，分配到浙江机械学校教语文，当了六年的老师后，又于一九八四年末调到杭州市《风景名胜》杂志社任编辑，直至一九九三年退休。现居新西兰。

自序

我在 20 多岁的学生时代即被打成右派，后所嫁夫婿亦为右派。因此，坎坷、困顿伴随了我的大半生。且平生相识相交，无论师长前辈或同学友朋亦多为右派。相遇之间，息息相关，感同身受。而今寄身海外，遥念故旧，形诸笔墨，聊留雪痕，与前人思亲友之作“尚友

录”、“停云集”等意愿相同。诸篇文字皆草于 1997 年前后，初总题为“右派婚姻百例”，然写至 70 多例时停顿了，且所写也并非全属婚姻状况，故改为今题。自选多篇交《北京之春》发表，以此作为反右运动 50 周年祭。

——作者 2007 年 2 月

方轸文

1957 年反右斗争前夕，我还是福建师范学院音乐专科的学生，这个学院后改称福建师范大学，音专与美专合并称为艺术系。57 年暑假，我不知道“黄雀在后”，还到北京访友，看陈朗先生，他当时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任《戏剧报》编辑，风华正茂，发表过《苏州买笛》，《昆丑王传淞》等品味较高的作品，人称“翰林院编修”。

当时北京的反右派斗争开展较各地为早，剧协正在批判吴祖光及他的“小家族”干将如杜高、汪明等成员，虽未深入，大家对运动的趋向也看不清，摸不透。50 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年事不高的剧协诸仁，像初生的牛犊，尚不知道老虎的厉害，但是老虎未来之时那股强劲的山风，似乎人人都感受到了。陈朗先生很忙，批判吴祖光时，他还担任会议记录哩！

有一天我到《戏剧报》办公室看他，办公室内另有一位年轻先生坐在办公桌前写什么。陈先生为我介绍说“这位是方先生”。我叫一声“方先生”，方先生并不抬头，悻悻然，似应非应。事后陈先生告诉我说，方先生大约在写检查，可能在写揭发陈朗的反党言行文字。《戏剧报》和《剧本》两刊编辑部相加共 20 几位编辑，原先他们两人较谈得拢，又有跑旧货店的同好，接近得较多，大约常有些奇谈怪论吧！对某些党员同仁尤其行政人员，态度不甚恭。反右开始，人人洗脑，据说领导找过方先生谈话，让他揭发陈朗。陈先生对我轻松地说：“没有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方先生。等我第二次再见他时，已是 23 年后的 1980 年夏天了，在所谓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后，居然大家又庆生还，再聚北京了，确实是奇迹。

方先生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苏州社教学院，专攻戏剧。方先生眉宇轩昂，英姿风发，南人北相。陈朗与方先生在 57 年均被打成右派，陈朗发配西北，而方先生去了桑干河、张家口。风霜刀剑，岁月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23 年后在北京再见他时，他还带来一位比他年轻 24 岁的四川籍妻子小张，并一个 5 岁的男孩铁柱，一家三口同住在惜薪胡同新建的简易楼房二楼的一间屋里。小张是四川某县山里人，母亲早死，多病，跛足，后母很憎厌她，四川连年饥荒，她在冬天还是光脚。她怎么会嫁给老方的呢？人们都说，是老方拿 50 斤全国通用粮票换来的。我们所见到的小张，已是到京数年后，她的足

跛，经过医疗已大见纠正。几年后，老方在我们团结湖居所小饮，说起他娶小张的经过，使我们对他人的人格有更高的认识，在崇敬中又满含辛酸……。

老方在张家口外农村戴罪劳动，岁月悠悠，一晃 44 岁了，还是孑然一身。纵然右派是人民的敌人，还是想娶妻成家的，因为是常人嘛！他从每月的微薄生活费中锱铢累积，又省下口粮，积了数十斤粮票，在那个年月，粮票是命根子，陈朗先生故乡一位朋友就因为聪明过头钻国家空子，伪造粮票，事发而被判死刑。老方有数十斤粮票在身，俨然“富翁”，田舍翁有五斗米尚思娶妾，何况老方娶妻。他的一位难友王某是四川人，有亲戚在某县山村，难友建议老方亲自到该村寻找他的亲戚，估计饥寒中的姑娘是不忌讳年龄与政治身份的。老方到达山村后，居然像选美，姑娘们因为他尚有几十元月工资，还听说桑干河边的肥沃土地，居然尚无天灾，可以收成粮食，不啻是天堂！老方竟是“热门”夫婿，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愿意嫁给他，愿随他到遥远的北方而远离父母。老方如果是一般普通人，定会感觉侥幸，但他不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有致命的政治桎梏，又年龄过大，塞外的风霜使他显得比 60 岁的人还老迈，面对年轻姑娘他很犹豫。这使那位介绍人为难、不解。某天他与友人的亲戚也即介绍人在村中街道上走过，迎面走来一个又丑、又脏，跛足的女子，走路时身子倾斜到快接近地面了，老方觉得他若娶这位女子方不负疚。他对同行者说：“我想娶她。”跛足女的后母收了老方赠的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

老方于傍晚时带她离开山村。小张是近 70 岁老父的唯一小女儿，不忍远别。他们还是“私奔”的哩！那年小张 20 岁。舟车劳顿，几经周转，老方带小张到了上海，看望了老方的大哥，为小张买了一件大衣，然后同至苏州故里，到市内河边徘徊，以吊祭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的骨灰是洒在这条河里的。然后双双同到塞外，在桑干河畔的农场安家。老方在 46 岁那年得了一子，是铁柱的哥哥，在冰天雪地里，因为父母均在田间劳动，这个 3 岁的孩子在桥上玩，失足落水，小尸体已顺流淌出数里之遥。老方的伤心无法形容，他躺在坑上足足有半月之久，不吃不喝，竟没有饿死。他养育这个孩子实不容易。孩子出生，他自己接生，在寒冬冰河中洗小张的血污衣裤和孩子的尿布。仅有的一点小米，他用来熬粥为小张生奶。他每晚一灯如豆，土坑瓦灶，这个家庭，这个孩子带给他许多人生温暖，许多期望与生机。他是在儿子死后 5 年才再有勇气要孩子的。铁柱的诞生、抚养，他的关注、尽责，大约世间的父亲要数第一了，回北京居住在惜薪胡同时，二楼的阳台全用铁丝网好，以免铁柱不慎掉下。去年（1994 年）我即将去国来纽，他为我饯行，却频频为铁柱夹菜。

张郁

50 年代北京朝阳门外东大桥芳草地，是全国文联宿舍所在。一大片简陋的红砖平房，分成若干小院落，组成一个大院落，像棋盘一样。

大院北边有一个传达室，统称“芳草地 5 号”。每小院内，一排 8 间平房，每间祇有 12、3 平方米，单身者住一间，有家小或老人的占两间。每小院有一厕所，为公用。平房阶前为黄泥地，是夏日乘凉或种葱蒜的活动余地。所有小院都是一个格式。那时的朝外，冷落、荒凉，名为“芳草地”却无绿茵，倒有一股乡间气息。5 号虽是宿舍大院，但送煤、送菜小贩都可自由出入。每小院前后紧挨，院外左右是道路。这个大院，文联各协会的文艺家们多住在此，例如油画家倪貽德，“胡风分子”主将路翎，左派戏剧家屠岸，曲艺界领导人陶钝，评论家戴不凡等等。

芳草地 5 号靠中一排的 10 院，8 间房中住着陈朗等 6 户人家，1957 年反右斗争中，6 家中 3 家是右派。后来历经阶级斗争的深入，芳草地 5 号各院住户，陆续地不少划入“黑五类”份子的范围了。

张郁住在靠右边一排院落某院，在陶钝院之前，路翎院、唐湜院之后。他是四川人，出道较早，到剧协之前当过报人、记者，性格活泼热情，爱交际，爱戏剧，尤爱川剧，相当自许。1957 年“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帮助过多了，秋后算账，如张郁其人自然是瓮中之鳖！我在 1959 年离开福建到北京，与陈朗同住芳草地 5 号十院，因属右派，是孤立的。平日来往也是右派，不敢公然交往，影影绰绰，避人眼目。张郁都是夜间来我们家。那时反右斗争已胜利结束，全国揪出的右派份子据说有百万之多，文联各协会所定右派，部分已“先

遣”入监或遣送边远劳改，其他大多尚在等待处理，前途未卜，人心不定。张郁尤见忧愁，因为他的妻子，川剧名演员杨淑英提出要和他离婚。杨身为共产党员、川剧院院长，本来嘛，张郁既是四川同乡，又是全国剧协大编辑，是川剧的鉴赏者，杨淑英表演艺术的吹鼓手，玉种蓝田，门当户对。但是张郁划成右派了，四川省领导不能让四川省的名家有一个右派丈夫，不能在政治上沾污共产党要培养的红人。是一定要杨淑英离婚的，杨淑英从小学艺，出身贫寒，“根子”正，是提拔对象。她没有多少文化，谈不上远见卓识，经不起政治压力及地位的诱惑。她一次次从四川赶到北京，他们新婚不久，还来不及调到一起，她要来面议离婚。但每次都以“抱头痛哭、情意更深”而分别！夜深时，张郁向我们诉苦，满面的焦虑与无奈，但是他对杨淑英祇有理解，没有怨言。他时又患腰痛，似乎忽然衰老了。

时在“大跃进”、“大炼钢铁”，文联在怀来（桑干河畔）设有劳动基地，各协（剧协、音协、美协、曲艺等等）轮调一般干部到那里“劳动锻炼”，而定性的右派们也调入其中，名曰“劳动改造”，受所谓贫下中农和无冕同志的监督，实际上是受后者的监督，饿肚子的老乡哪里管得着这许多。张郁和陈朗们也都先安顿在这一基地，等待再处理。对右派份子的处理，渐次展开，这是从1958年春天对极右份子驱送北大荒以来的继续。后我们一家发遣甘肃，于是变卖家俱，分赠古董，束装远行，这是我们今后20多年每况愈下的第一步。目的地是甘肃兰州。60年代初期正是路有饿殍的时期。陈朗分在甘肃省文

化局戏研会工作。他曾从文化局分回一小袋土豆，在大街上被人抢了。10月的兰州，已经下雪，据说在春天，不仅像北京一样风沙满天，还要落土。我们到了兰州约两个月后，张郁亦从北京被驱遣到了省文化局。我们又在贤后街一个院落里相聚，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呵！他仍然抑郁寡欢，最先告诉我们的消息是与杨淑英终于离婚了。在兰州祇过了一个月，他想回成都去，提出辞职。当时的形势，对“辞职”一说，大家不可理解，无法接受，真乃“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怎么可以离开“组织”，脱离“组织”？否则一个人不就没有前途和没有活路了吗？但在那个年头，谁又顾得了谁？张郁一走，再也没有音讯。

过了漫长的颠沛的20年后，直到1979年底和次年初，右派“改正”，张郁像出土文物一样，又冒出来了，他又回到了北京，参加文化部举办全国戏曲会演的会刊编辑。陈朗比他仅早数天，已从甘肃西部农场经兰州返北京。二人又成了同事。接着剧协体制恢复，二人均回到剧协。

20年不见，张郁还不见老，然仍孑然一身。他说这20年以来，虽然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但学会了木匠活，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张木匠”。他笑着对我们说：“待你女儿出嫁，我亲自为她们做家俱。”

约1985年夏，我们在杭州老家，张郁因出差之便到杭州看我们。

我的居所是旧屋、阁楼，但是很雅致，帘笼低垂，顽石生烟，时花满座，张郁很赞美。我们请他到龙井饮茶。他对西湖，对龙井的幽深林密都极欣赏，他让我们代购两斤上好的龙井名茶为杨淑英寄去。谈到杨淑英 20 年以来对他，无论是经济上、精神上仍都支持，她的子女亦待他如同亲爹。杨与后夫感情不好，落实右派政策后，他曾想过破镜重圆，但终属不可能。

1986 年，我为张郁介绍了我们的朋友施美玲，觉得他俩可以互相扶持走完人生这条道路。小施是个孤女，年轻时恋爱受挫，一直觉得没有好男人，故而一直单身。她护士出身，40 岁，有些漂亮，有些情致，喜欢与三五良朋品茗赏景，喜欢听苏州评弹，情性温厚，但身体多病，长年患高血压。张郁看了她的照片，经过我的口头介绍，觉得他们俩人可以作进一步的交流，因工作忙，先两地通讯。这本来是件好事，如果“好事”终于因为“多磨”而成功倒也罢了，通讯后不久，不料小施忽然摔了一跤，竟中风卧床了。张郁想整理一下手头工作，南下探望。他先汇来数百元钱，然后是两封长信，备极安慰，说是安排她进京治疗，将遍访天下名医，为她妙手回春。信写得真挚感人，不相信是 50 多岁的男人手写。他还说“即使她终生卧床，也不以为累赘”云云，还设想了他们以后共同生活的情况。

但施美玲毕竟未及等到张郁来面见她，就去世了。医院的护士说她“死得很快乐”，头一天她还好好的，来了一位广州朋友，为她洗头，

为她烧了些可口的菜肴，一起看什么信件，朋友到晚上才离去，临走前还一起唱歌呢！可是她就在这天午夜突然地，悄悄地死了。我不能明白她那天的心情，但护士们都说“她很快乐”！

一直到 1990 年，张郁与武汉一位歌唱家结婚了，我常常在北京，因逗留时间短暂，始终未见着这位歌唱家，据说是色艺双全。张郁是多情种子，他历经患难，必然珍惜，我祝福他们地久天长！

肖里

肖里是漫画家，当日京城漫画界，他的声名在方成、钟灵之后，与李滨声齐名，能在 20 余岁进入美术界核心美协为漫画专业者，可谓少年得志。

1959 年，我居住芳草地 5 号大院时，他住在我的 10 号院前院（8 号院），他家的后窗，开在我阶前的“照壁”上，声息相通，遇有紧要事或者贪图方便，即于此窗传递、沟通。

肖里于整风运动“鸣放”阶段画了不少满含讽喻的漫画，内容犀利，这些画曾得到反右时重头对象“章罗联盟”（章伯钧、罗隆基）的中心人物章氏的欣赏，使其加重“罪行”，后成为特级右派的份量！在右

派等待“处分”之际，在不安、无奈的同时，各各难免有嚶鸣求友，互慰寂寥之举，经常是夜间相约于僻处的 酒楼，借酒浇愁，或豪饮狂歌。肖里与陈朗、杜高、胡忌一时成为“酒中四友”。四友中唯独胡忌是逍遥派，他是有成就的青年戏曲史学家，“右派”漏网者。痛饮 的结果，往往“醉扶归”。

59 年我到芳草地时，杜高已于上年 4 月被定为极右份子，与汪明（二人同属吴祖光“小家族”成员）、戴再民、唐湜、阮文涛等同时发遣东北兴凯湖冰天 雪地劳动改造。“醉扶归”的生涯已告一段落。肖里和陈朗处分较轻，暂时还未离开北京，祇是肖里到怀来（桑干河畔，张家口地区），陈朗到安国（保定地区）， 属“监督劳动”。

与肖里作芳邻时，他独居，妻子张大盈，好像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工作，她从不到肖里居所，所以在一、二年内，我没有见过大盈一面。张大盈是山东人，她 的父亲原是山东的老民主人士，很有声望，共产党入北京城，49 年开国大典前夕，即应召参与“政协”，商讨“政体”。老先生在 57 年也被打成右派。约在 58 年年底，肖里曾到山东看过一次老岳丈，翁婿俩右派谈得很投机。老岳丈说在开国前夕的那次“政协”，他对“一面倒”（苏联）的国策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最瞧不 起的人是郭沫若，说是“小丑”，“应声虫”。还说在议政大厅里，后来为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祇有“站”的资格，“什么东西”！根本不在老先生眼里。他 还豪迈地对贤婿说：“右派份子，休小看这顶帽子，20

年后大家恐怕要抢着戴！”肖里向我们转述老岳丈的这番谈话时，我们体味这“20 多年后要抢着戴”的话 无不精神为之一振！大盈出自如是名门，看来她与肖里之间的感情破裂不会是因为政治原因，但从肖里口里，有时也听过他们热恋的往事描述。独居中的肖里，还带着 3、4 岁的儿子，平时在幼儿园，祇在周末带回芳草地。夏天周末，他常携儿子在我阶前小柳树下共进晚餐。

在一段期间里，肖里曾被调回美协打杂，家居时也颇见悠闲，这时他的热情转到搜集世界名著（中文译本）上，出入书摊，尽量寻觅旧书，他将购买之书拆去封面，然后装订上自己设计的统一的精装封面，黑底、朱红字。“红与黑”排列在几个书橱里，美观、整齐、庄重！即使再破旧不堪的旧书，他都细心装订，哪怕 是高技术的“蝴蝶装”大厚本，他都能极专业地修补、改装，并乐此不疲！

肖里之所以能够常回北京，原因是因为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狂热中，到处“诗画满墙”，7、80 岁的农村老太婆和几岁的小娃娃都写诗，全国人民都是诗人，这些诗歌都要配插图。肖里会画画，政治任务第一，他因此减少了田间劳动，整天在白粉墙上为那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之类的诗歌配画，他还常常公差回城购买工具、颜料，得以回芳草地住处小休。

但肖里大部份时间还是在桑干河畔劳动（文艺界的右派大多被分置

在头堡、四堡、五堡、八堡等村落，丁玲先前曾在八堡体验生活，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即以此地为背景）。这期间，他曾与李又然同室而居，成为难友。李又然是诗人、翻译家，属作家协会管辖。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最高潮是批判“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全国报刊雷厉风行大批特批其“罪行”，李又然竟是该集团的“死党”、“黑干将”、“家丁”。有一幅漫画，为“丁、陈反党集团”造像，李又然被画成穿着戏台上丑角皂帽服饰，手举写有“丁”字灯笼的奴仆形象，讽刺他是“丁、陈”集团的“家丁”。李又然的名气本来并不大，这时他成了全国“知名”人士。

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赴塞外探亲，肖里回京城办事时为李又然捎带家书，自然，刘蕊华和肖里成了熟人、朋友。刘蕊华比李又然小 20 多岁，而比年轻英俊的肖里大 5 岁，当时仅 35 岁。1960 年前后，我住芳草地时，刘蕊华常来看肖里，也曾在我家小坐、便饭。她生相娇小、轻盈，面目清秀，但是憔悴、消瘦。她与肖里从同情竟至相爱了。她曾向我述说，她与李又然的那段婚姻是师生情，而非夫妻情，她尊重李又然的为人和学问，是尊敬，不是爱。她认为她与肖里的感情才算得上爱情。她将不惜牺牲一切要争取它，拥有它。她称肖里为“孤儿阿廖沙”。阿廖沙是莫泊桑小说的主人翁，描述一位妇女抚养一个孤儿，这孤儿成长后，认为养母是世上最可爱的女人，爱她，并娶她为妻。她以此比喻肖里对她，有如阿廖沙挚着、热烈，不顾其他的专注爱情。

1960 年间，我随陈朗“发配”西北，一路烟尘，形影相吊。到第二年冬，收到肖里自东北来信，说他和刘蕊华终于历经曲折，成了眷属，当他发配东北 时，刘蕊华抛别都市的繁华与一切感情瓜葛，相随出山海关，踏上生长乌拉草的土地，他俩情深似海，而且有了一个女儿。肖里说这女孩像她妈妈一样清秀。这是肖 里给我们的唯一信札。以后阶级斗争更趋残酷，岁月艰辛，彼此一切音讯都断绝了。

20 多年后右派“改正”，“生入玉门关”，在京与来自各地区的难友相聚，但未见肖里俊影。据自东北返回的人们说，肖里早在 1970 年左右自杀了。 我至今不能理解肖里的死，他生性乐观，奋发勤勉，就算忍受不了无休无止的迫害，他又如何抛闪得下随他流放天涯以他的爱为支柱的女人？还有那个同样清秀的女 儿？

据说，当初刘蕊华向李又然提出离婚时，李又然非常豁达大度，他理解刘蕊华，他觉得无论从政治压力上，从感情因素上，他都该与刘蕊华离婚，盼望她能 获得真正的幸福。刘蕊华再嫁的人又是一个右派，她并非攀龙附凤！李又然的命运像一阕悲歌，他在怀来呆了许多年，虽未发配到更远的地方，他被人遗忘，寂寞、 失意、病贫、饥寒，最后到了无栖身之所，无谋食之处，他终于凄惨地“路毙”在北京一所公园的靠凳上。

今天，我在这繁花似锦，平和、宁静、友好，不谙斗争哲学的异国，
向他们招魂，肖里！李又然！魂兮归来！

“右派情踪”（二）

（新西兰）周素子

高天白

1960年10月，陈朗从北京被处置“发配”西北，我随同前往。那时我大女幼吾不到两岁，我又怀孕在身，陈朗还患病。孕妇病夫是家庭最大的负担和忌讳，但我们却要奔向人地两疏，行将戴罪生活的地方。

自从始皇帝的大公子扶苏开垦西北以来，已过去了数千年，但西北仍然荒凉干旱。当火车过了宝鸡，但见穷山恶水，所过村落，显得落后，物质匮乏。新建的铁路，通车尚不久，当我们抵达兰州站时，车站还未建立，我们站在黄土高原上，抬头即是皋兰山，山头光秃秃的，不见草木。难道这就是《汉书》里所说霍去病与匈奴“鏖战于皋兰之下”的皋兰山？后听人说古时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哩！

兰州古名金城，是瓜果之乡，1949年前，人口虽祇得10万，交通

闭塞，但人们的生活尚是富裕安定的。50 年代以来许多工厂内迁，离城 30 公里的西固，新建有炼油厂、化学工厂等大厂，遂使全市人口骤增。1960 年前后，因为共产党错误政策的导向，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上万言书而被黜。甘肃省第一把手 张仲良则成了“冒进”而为之下台的替罪羊。全国处处饥馑，地处西北干旱地区的兰州，就更形肃杀，路有饿殍，哀鸿遍野了。

陈朗向甘肃省文化局报到，被安置在省局下属的戏曲艺术研究会，有一份不定期内参刊物让陈朗参与编辑。一时没有宿舍，我们 3 个人就住在戏研会楼上一个 小房间里。戏研会所在地，在贤后街，是一条靠黄河边的僻静小巷，木结构老四合院，比起北京四合院具体而微。小小的开间，小小的窄长的天井，既是戏研会办公地点又兼宿舍，里面还住着两位秦腔老艺人，都有 80 岁左右。反右之前，曾经一度重视传统，优待知识份子，全国似有一番“文艺复兴”气象。西北的古老剧种 秦腔老艺人都是师徒以口传身授薪传，在此时期，将一些老艺人从民间挖掘来让他们像汉代伏生一样，从没有牙的瘪嘴中，吐出满腹的戏本子，加以记录。据说请了不少艺人，记录了不少剧本，但等我们抵达时，好多位都已仙去，祇剩下王老、曹老二位与我们朝夕相处。两位老人的辉煌时代已经逝去，此时，他们在戏研会楼下 阴暗的房间里，踽踽而行，挣扎在饥馑的死亡线上。我们离开北京时，北京毕竟是首都，虽已见饥馑的端倪，但我们尚未十分身受，初来兰州，物质的贫乏，城市的 萧条，令我很震惊，而且供应的每人定量

24 市斤中，有 70%的粗粮、代用粮.初来乍到，我出手不凡，曾经送给曹老一大碗白面粉和几个白面馍，令老夫妻不敢相信！

10 月的兰州，天降大雪，似乎为两个流亡的右派以壮行色，兰州的冬天比北京的来得早。

几个月后，我们从戏研会楼上搬到贤后街 28 号。与戏研会邻近，是一个标准北方四合院，有前后二院，二门，门道。我们住在前院西厢房，砖地、土壁、木窗。戏研会的刊物祇出过一、二期就停止了。陈朗一直在病中，我则挣扎在煤炭、粮食的苦海里.这里不像北京家居那么方便，那里燃料、粮食都送上门，住东城的老太太，一辈子没有到过西城，安逸得很。而这里，一切都要自己去搬着回家，包括那因寒冷而大量需求的煤炭，我们的日子很艰难，但又没有一个朋友。

一个冬日的傍晚，忽闻叩门声，进来一位身穿军大衣神情焕发的人，不请自坐了。自我介绍说，名叫高天白，也是“右派”，现为省京剧团借用，刚随团上北京回来，在京时听中国剧协范溶（《剧本》月刊的一位编辑）介绍陈朗情况，故此特来拜访.我为他奉上了一盖碗茶，他向我行了个屈膝礼，口称“夫人”，大加赞赏茶具之美，女主人的美，滔滔不绝，一丝一毫没有当时身为右派的那份抑郁感。并说他在写一部题为《神灯》的长诗，到时候一定送来请教云云。

老高的出现，使我们在兰州的处境，豁然开朗，蓬壁生辉！他的妻子名叫柴洛苇，也是右派。无独有偶，也是一双右派。他俩原是甘肃省一本名为《百花》的文学杂志编辑。由同事而结婚。老高写白话诗、散文、小说，从青年时代起就颇负盛名，人戏称“甘肃的高尔基”。他是甘南武都人，抗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参与救亡运动，写过不少诗文，以激励人们的士气与斗志。

就我所知的几件事，可以说明老高的性格。50年代初，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受当局信任，经他介绍约有7、80名人员进入各机关工作，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外调人员挤破了他的门，要他证明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面目，其中有些人他早淡忘了，但他一一为他们说好话。

50年代初他工作时，因为写的简历过于简单，组织上让他重写，他一时高兴，竟写了一部情节颇为离奇的“自传”递交。政治运动来临时，外调人员根据他所写情节进行调查，找证人，跑遍了全中国，跑断了腿，寻找了许多证人，结果都是子虚乌有！

老高与柴洛苇的婚礼，在兰州市算是破天荒头一遭。他俩都是文化界人士。柴洛苇是兰州世家，亲戚渊源，今知旧雨；高天白是甘肃名士，三教九流，莫不乐与之相交。他俩的婚礼在兰州一家名酒楼举行，酒宴招待除酒楼工作人员外，还延请当时全国著名四小名旦之一

陈永玲（当时为省京剧团主演）主持，陈永玲少年 倜傥，站在门口接待，凡过往人等，他一律热情招呼，延请入座。据说宾客鱼龙混杂，真真假假有数百人之多。我们认识高天白时，他已有了 4 个孩子，但结婚酒宴 之账款尚未还清。高天白的 4 个孩子都聪明有加，机灵有余，第一个平地一声雷，取名“一雷”，生到第 4 个，他觉得够了，取名“满彩”，乃“满堂彩”也。

1958 年，天白夫妻双双划为右派，双双将发配甘肃河西走廊一个唤作夹扁沟的地方。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右派集中营。河西走廊在沙漠边缘，已经沙漠 化，缺水，即使有水也是咸水，偶然有一淡水，大书“甜水”二字于旁，赐福于人！老高夫妇与众多右派被押，赶赴途中，当火车过了永登县，柴洛苇忽然胃部大 痛，几致昏厥，经检查属实，就让他俩半途下车，禀报有关部门，自行就医。柴洛苇的胃痛，竟救了他们两人的性命——凡发配来夹扁沟数以千计的右派份子，以后 几乎全部饿毙，饥饿到啃光了木头门槛，连粪桶中的瓜皮也抢食不到，饿死的尸体是干瘪如柴的。收尸的工作人员，起初将尸体埋入沙漠时，还插木签以志姓氏，后 来死人多了，收尸时叠成井字形，一次能抬 4 具，胡乱埋入，也懒得插牌了。多年以后，我们每接触新友，述及夹扁沟，大家都谈虎色变。兰州市文化馆长詹乐政说 起，夹扁沟右派中，有一位国学老教授，他因不舍而随身带了一部宋版书到农场，宋版书极珍贵，完整的已很难求，就是残页，也值一两银子一页。这位老教授，在 奄奄一息待毙之时，身旁有一堆枯枝败叶燃

烧取暖，他以余力慢慢地撕下一页页宋版书，投向火里，观其燃烧，待到投入最后一页，断气了。不待“文革”的“秦火”，老教授先“殉宋”了。但夹扁沟的生还者还是有的，80年代我们在杭州认识邹梦禅先生，他是书法家、篆刻家。30年代，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尚是青年，参与编纂《辞海》。封面、扉页“辞海”二字即是他集汉隶而成。他即是生还者。是夹扁沟少数被派往瓜园劳动的人之一，右派当不敢窃瓜而食，但他却逃得了生命。甘肃人右派生还的还有高尔泰（美术家和美学家），是天白的朋友。老高夫妇回到了兰州，后来阖家居住兰州城郊伏龙坪，属半山区，因为是农村，管束较轻，夫妻俩俨然是乡居生活，一家7口（4个孩子、老高夫妻，加老高的老父），老高说，吃不饱，也饿不死。他仍然抽暇看书，写诗文。家徒四壁，然骨骼仍然清傲。一天一个公社书记到他家中道三说四，让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云云。当书记起立回转时，老高猛地把书记刚刚坐过的那张椅子，一把摔出门外，说道：“这些人坐过，老子不要了！”土皇帝领略这一架势，愕然！

老高不以下乡务农为苦，为折磨，真有些魏晋风度，可以箕踞，可以负曝，扞虱，赤膊，趿鞋，翻青白眼不理人。最令他舒畅的是清晨如厕。坪上的厕所均在室外露天中，以矮土墙围之。老高与夫人双双并肩而登，而蹲，在朝霞旭日中悠悠远眺，高声谈笑。此举连阮藉、稽康也远远不及。

我们的贤后街居所，是省文化局所属宿舍，原住南房的右派王仲才（原省文化局文艺处处长）受到“甄别”待遇，另迁别处了。我们赶紧通知老高有此空房。他与长子一雷（当时祇 10 岁）连夜以独轮车冒雨载书下山占房。次日，省京剧团一班青年武打演员再帮他搬杂物。于是他又做了城里人。省文化局以前都回说城内无房，此时当然无语可说。老高终于成了我们的芳邻。他常在我们吃晚饭时，捧着他的诗文前来朗读。他每每见我都行屈膝礼。夫人柴洛苇对他的种种“创举”，宽待到熟视无睹，早习以为常。生活的贫困，人情的冷暖，斗争的血腥，与老高似都无关。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我们也渐感轻松。我们和老高一家祇做了一年有余的邻居，就搬到了中山路。

“文革”一开始，陈朗即受冲击，关入“牛棚”，我是居无宁日，时受惊恐。乃约老高于某汽车站见面，讨教。他却珊珊来迟，旁若无人。远远的就向我行屈膝礼，说：“美丽的夫人，有何见教？”老高呀老高，此时也，长剑正悬在头上哩！但是老高在这一次的谈话则是一反常态，严肃的告诫我种种防人之举。例如，他说，千万别到陈朗单位去，万不得已非去不可，也带孩子去，免遭毒手。但这一点，老高失算了，他还是把造反派想得太人性了。因为我后来终于挨了打，受了重伤……接着，我们的遭际更陷于“深层”而流离颠沛，与老高一家人也就失去了联系。直到 80 年代初，陈朗已返京，老高曾赴京观摩戏剧会演，他们曾再聚头，而我恰恰未在京。80 年代中期，老高因公顺道来杭州看我，而我又恰未在杭州，再度失去了劫后重生的会面机会。

不过我相信，他的傲视世态，宠辱不惊，当一如既往。“举头西北浮云”，我祝愿他和柴洛苇白头眉寿。

袁炜

60年代初，兰州市中山路街道办事处组织改造右派的学习班，共5名右派参加，我和袁炜即在其中。每星期五召集大家一起学习党的文件、政策。讨论时，别人都不大说话，发言也诚惶诚恐，但袁炜声音宏亮，语言极富逻辑性。我们都很叹服他的口才。他当时才50来岁，反右斗争前，是《甘肃日报》主编。他的被划为右派，是自告奋勇“自愿”要来的。1957年《甘肃日报》与全国一盘棋，也正轰轰烈烈展开反右斗争。袁炜认为共产党既然主动提出整风，要求全国人民放下包袱，多提意见，且表示过决不秋后算账，可是又出尔反尔，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说成是别有用心，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不服。在一次会上说：“如果提些意见就是右派，我同意这些观点，我也是右派。”谁料得这顶“沉重”的帽子，一扣竟达20多年！

在处理右派的政策条文中，其中一条名为“自谋生路”。袁炜“自绝于人民”，竟脱离组织，走上单干的生活道路。他作出这一决定主要是为了家庭着想。他不愿被押送外地，远离兰州。因为他有一个不聪明的妻子和一个痴呆儿子必须由他照顾。

袁炜的住所与我同在中山路，隔路遥遥相望！我见他在门口路边摆过修理茶壶、破脸盆等的营生，也制作过雪花膏在门口零卖。他干得最长的是挑着货郎担 串街走巷收购旧衣破鞋，然后分类再卖出，以此维持生计。他嗓音宏亮，吆喝地道。他身材矮小，终年一袭蓝布大挂，很脏。他患过胃病，开过刀，因无钱输血，以致营养不良，脸色青绿。文化革命席卷神州大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朗是自北京下放的右派，自然首当其冲，最先被关入“牛棚”，备受精神折磨及皮肉之苦。接着扣发他的工资，家庭成员祇能享有每人每月 9 元生活费。我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因而想到了“自谋生路”的袁炜，找他商量。他为我们母女作了周密的安排，我们一起收破烂，他争取多收些、走远些，我则将塑料、纸张、旧书、破衣等分类，好一些的衣服缝补后可穿也可卖，破布则打成褙子送往鞋厂。为节省开支，两家一起合伙做饭，由孟夫人掌勺。袁炜还谨慎的将我们合作维生此一情况向街道办事处汇报立案，方可保无事！

每日晚饭以后，大人们在灯下拆破衣旧裳，孩子们则于破烂之中搜寻他们的“宝贝”，尘土飞扬，更显得灯光昏暗了。但这时是我们一天之中最愉快的时 候，双手不停的干活，口中则叙述家常，早先读过的世界名著等，也重新再说一遍，互相提示遗漏的情节。在收来的旧书中，我得到《本草纲目》，与一批版本极好的针灸书籍。

袁先生是内蒙托克托人，兄弟二人，一个留学日本，一个留学德国，是当地青年的楷模。抗日战争爆发后，袁先生愤而从日本回国，且直抵延安，以示抗日决心。不幸的是，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他被视为法西斯特务，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关入黑暗的窑洞，要他作无休无止的交代。初进窑洞时，另有一个难友，他俩相约，谁能活着出去，谁就向对方家庭通讯，设法营救。约半年时间后，难友得先出“狱”，通知了因避寇在武汉的袁炜的舅舅，当时是《申报》主编。他舅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袁炜的爱国行动，谴责关押迫害的不合理性。毛泽东有亲笔回信，袁炜因得出狱，但他坚决要求离开延安，来个180度转变，直抵南京政府任事。几年后又弃政从商，到过缅甸。抗战胜利后，他整装回国，途径兰州，经友人推荐，当了《甘肃日报》主编。这时的袁炜已经30多岁，漂泊半生，经历了许多政治风浪，经人介绍孟二小姐，作安家之计。

孟小姐是山东邹县人，孟子后代，祖上因山东战乱迁居甘肃，经商致富。到孟小姐的父亲一代已经俨然大家，在兰州中山路置有深宅大院。孟小姐姐妹二人，父亲视同掌珠，择婿极苛，大小姐的婚事就被耽误了，及至选好婆家，她已病入膏肓，不能行婚礼了，临终之时，她要求看一眼丈夫，结果允许她隔窗一窥，就此仙逝！孟家鉴于长女的伤春而死，所以对袁炜这个其貌不扬的才子，别无挑剔。婚礼很隆重，将中山路这个前后有3个院子的大房作为陪嫁。这时的二小姐已经30岁左右了。孟小姐皮肤白嫩，时人给她一个雅号，称“腊美

人”，能做一手美食，祇是智力不如其姐。袁炜常说，别人说她智力低，我想不到竟低到这种程度！本来嘛，反右运动后，袁炜想跟她离婚，免得她跟自己受罪，当时许多右派都有这样的做法，但他顾虑到这么个低能母亲，又带着患羊癫疯的儿子，岂不更受人歧视？我见到孟夫人时，她已年过半百，仍依稀可辨“腊美人”风貌。她的前半生，生活优裕，嫁袁炜后，还雇有白俄保姆，没有苦过，但苦在共产党手里。中山路大宅已被充公瓜分，她们祇住西厢房一间。袁炜收入不足以糊口，一家四口嗷嗷待哺。孟夫人曾以其能做美食，为别人当过佣人。但孟夫人很快乐，从不忧愁。当我们谈到右派有赶出城市的可能性时，她插嘴说，若到乡间，她一定种很多韭菜，还要买一条骆驼来骑骑，她说不欢喜马，欢喜骆驼。在寒冬，我们收购不到太多的破烂，我曾跟孟夫人一起，到一个露天工场做手套，零下10几度，双手麻木，两脚冻僵。但孟夫人很高兴，来去途中逢人便相告她在“上班”。

“文革”深入，我辗转从关中富平回到杭州郊区。一日，袁炜只身远道而来见访，原来兰州斗争激烈，他怕吃眼前亏，携妻带子跑到西安，他的弟弟袁烙是《陕西日报》主编，共产党的红人，老延安出身！他在西安祇住了3天，觉得其弟有大义灭亲的可能，他不想被押送回兰州吃眼前亏，因而毅然只身外逃。至于妻儿，他想，他弟弟家能不照顾吗？他管不了那么多了。袁炜深谙共产党虎头蛇尾的作风，任何运动祇要避去锋芒就可能不吃苦，这是哲学！三十六计，“走”为上

策。

袁炜在杭州住了一周，我陪他浏览了杭州名胜，他觉得应该继续他往。临别之时，无以为赠，我脱下身上唯一可以御寒的一件毛衣，算是给他在寒冷的旅途上增添一丝暖意！那是 60 年代末的事。现在推算袁炜先生年龄应该有 80 多岁了，真正是“生死两不知”啊！

“右派情踪”（三）

（新西兰）周素子

张蓬舟

张蓬舟，原名张映璧，生于 1904 年，为上世纪 3、40 年代《大公报》的名记者、编辑，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在香港和大后方时期，都写过出色的报导。于 50 年代初由香港返回大陆，仍在新闻界工作。一个在 1949 年前即已扬名，尤其身为干系重大的新闻工作者，难免不遭受到 1957 年厄运的，他的被划为右派自不足为奇。这之后撰稿自然受限制，在新闻界也不能再露面。及至 20 年后“改正”，但已至耄耋之年，不再能参与社会各界活动。因此除了一些老报人，即使同住北京者，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了。

我的受业师周采泉翁广交学人，以文会友，当代名家如张伯驹、周汝昌、富寿荪、徐定戡、周退密、陈兼与、施蛰存等，以至被人冷落的如青海何之硕、兰州张思温，更如北京张蓬舟，他都与之时时书札通问，探讨学术。采翁学问渊博，为学界所推崇。我受采翁奖掖于患难之中。待到落实政策“改正”，我进入杂志社工作，经常要在全国各地进行采访活动，每到一地，采翁必让我拜识当地学者，使我在书本之外，获得知人论世的见识。

我是在 1985 年面识张蓬舟先生的。之前，由于约稿，已通过信。他先住北京西城骡马胡同一个大杂院里，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就按在先生室外。大院人口众多，尤其在炎夏，用水量大，水声昼夜不绝，先生美其室为“听泉居”。“文革”中红卫兵曾抄其家，但所抄除书籍外，所有财产仅 12 元现金，并无银行存折。按理原曾为名记者、作家，稿费多，工资高，且单身一人，无拖累，应该像沈雁冰先生一样，以麻袋装钞票才是，蓬舟先生则非是，其洒脱倜傥可以想见。

1985 年夏，我因公上北京约稿。在京期间，他约我们于北京西城一家西餐馆同进晚餐，我与陈朗同往。其时张老已过 80 高龄，但仍面目清朗，身材挺拔，风度从容。他吸雪茄，吃西餐，是一个洋派老人。他平时即在这家西餐馆包餐（每日吃一顿晚饭）。这家餐馆深知他习性，不容分付，即先为送上饮料。他为我俩点好食品后，自

己则是一盆面条，上盖以生切之黄瓜丝、西红柿片。见他细嚼慢咽，还悠然吸着雪笳。当他得知我们家里还有老母及两个女儿时，表示很遗憾未邀同食，即请餐馆另备 3 份精美食品馈赠，嘱带回家。感情细致如此。

后与张篷舟交往中，得知张篷舟夫人姓杨，福州人，早于 50 年前逝于苏州。当时夫人正怀着第 2 个孩子，而抗日战火正浓，身为《大公报》记者，他安顿了夫人与长子，只身赴桂林前线，在枪林弹雨中，作战地报导，于国事倾注了满腔热血。等到先生得知夫人病危，日夜兼程东归，然已香销玉殒。先生遂为夫人营墓于苏州郊区。从此，飘然一身，50 年来携子相依，再未结婚。先生在谈话中多次自责，没有将夫人照顾好，引为终生内疚。他说起后来在香港时，租房、寄食，父子二人正好花掉全部薪水云云。

先生对故里四川成都，感情浓厚，著有唐代成都诗妓传记《薛涛》，1947 年前出过四版。赠我们两册乃为不久前的新版。他还准备写当代歌唱家管夫人（郎毓秀）传。他说我若出差四川，可为介绍识面。当时他正在致力于《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撰写，计划写 12 册，已完成 6 册，交由四川某出版社出版。以先生的年龄、精力，完成如此庞大的史着，搜集资料，露纂晨抄，其艰巨可想而知。先生有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时间表，让我们窥见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一种治学精神和方式，丝毫不懈怠，有超乎常人的意志和毅力，且自成一

种规律。他每日在傍晚看完电视新闻联播后开始工作，中夜 2 时作半小时的休息后，继续工作到凌晨 4 时，然后上床睡觉，至上午 9 时起床，已睡够约 5 个小时。然后进食，整理内务，购物，收发信函，访友等等。中午 12 时中饭，饭后午睡至下午 4 时，如此睡眠 已达 8 小时。下午 4 时午休之后，是先生一日之中最大的休憩与享受。他漫步至包餐馆，坐于一隅，悠然吸雪茄烟，喝饮料，细嚼慢咽。这一生活规律，在“文革”中难免有所破坏，但大致仍如此。他在餐馆消耗约 2 个半小时，再漫步回家，于 7 时正收看新闻联播，然后又开始工作。周而复始，生命不息，著述不止，不知老之 将至。

他曾到过东郊团结湖访问我家并便饭。又邀请我们到他刚搬入的北京西南郊蒲黄榆新居作客。我带了二幼、三幼，“按图索骥”找到了他的新居。楼刚落成，道路尚未修整。先生居一层楼，一个二居室套房。他对新居非常满意，所有厨房用具一律崭新，还有一只小小的匣式冰箱。书架尚未购置，书籍还捆扎着放在客厅兼书房的大间里，与南窗成直角放一张大书桌。家具简朴，素壁几无装饰。先生的孙女在四川某大学读书，暑期返京与祖父同住，孙女住北向一间稍大的卧室。先生的卧室则在书房隔壁，南向、甚小，仅一单人床倚壁而放。墙上唯一装饰是一张大幅杨夫人半身玉照，照中身微侧，左手置身后，右手举放脑后，穿大方格双色毛衣，秀发如云，窈窕妩媚。书房中唯一的这张大桌上，除简单的几件文具外，还放着一个小小的杨夫人玉照镜架，斜置于案头最佳视线内，与卧室大照片属同一形象。我

曾将镜架随手挪看，还小心放回原处，但先生进入书房，到书桌前时，下意识似地感觉到照片位置有了毫厘之差，遂轻轻的重新移动了一下。这一个细微动作，令我感动至今深刻难忘。是呀！半个世纪以来，先生与此玉照朝夕相对，即使位置有毫厘之差，能不明察？先生赞扬夫人，谓世间女子无此温婉、聪明。

那天在他家看了许多旧照片，有东渡日本时期的，有香港《大公报》工作时期的。先生年轻时有“城北徐公”之貌。先生的日记极具特色，如某日游某公园，此页即粘贴此公园门票；某夜观某剧，此页即粘贴此夜戏票。其中尚有在日本时的游历门券，可作为历史资料看。我曾撰文将其介绍在拙编《风景名胜》杂志上。旧照片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与杨夫人的每帧合照，有两人欢笑无邪、携手坐于树下的；有景物两忘同看一书的。其中还有一张为先生独自徘徊于荒郊的旧照。他说这是他从香港归来后，在苏州郊区寻觅杨夫人湮墓时所留影。时序变迁，坟墓已无踪迹可寻，祇剩寒风酸眼！

先生新居南向是一个公家机关的冷藏库。因号其新居为“冷对庐”，贴切含蓄。新居南窗下是一片黄土地，有手植杨柳7、8棵，仅一人高，因夫人姓杨，故植杨以纪念。先生说，他所居之处，祇要能植树，他都植杨树。

先生于1991年夏去世，其时我在杭州，陈朗恰在北京，接到讣告，

曾填《沁园春》词一阕挽之。词录如下：沁园春 挽张篷舟为真男子，是名记者，往矣篷舟。念东瀛放桌，曾书皮相；大场载笔，亦枕戈矛。沥胆披肝，追踪蹑迹，纪事赓编百十秋。（注 1）重回首，道平生事业，别有温柔。（2）

跼天谁数诗囚。但祇取清奇做一流。（3）对枇杷门巷，焉求颀颀；（4）菖蒲烟水，可也绸缪。（5）独惜深红，还期嫩绿，十样蛮笺仔细搜。画图在，（6）向蜀鹃啼处，魂系江楼。

1，君 1936 年赴日本调研，归国着《日本皮相论》一书。8.13 事变期间，深入前线，作战场报道，并以杨纪笔名写有《大场必守论》等专文，名噪一时。晚岁协助王芸生修订其《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巨编，又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成稿六卷。

2，君年 20 始研薛涛，穷数 10 年，至老不懈。

3，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著名诗人分立六主，其下为客，各分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四级。孟郊为清奇苦僻主，清奇雅正之升堂者为方干、马戴、伍藩、贾岛、厉元、项斯、薛涛，共七人。

4，薛涛《咏八十一》诗：“开时九九知数，见处双双颀颀。”

5，元稹《寄赠薛涛》诗：“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6，张大千丁亥为绘《薛涛制笺图》，君曾于所著四版《薛涛》一书中作为插图。

附：周采泉致张蓬舟札

采泉先生道席：奉读惠书，如亲芝范。所附诸诗，并皆高妙，至深钦佩。前作《杜甫草堂》，实对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而发，以为不及范文澜之公允也。足下以为如何？《澳门报》大作，甚欲拜读，可否复制一份见寄？《柳如是传》已杀青否？前知陈寅恪业有所作，想邀鉴及。拙作《薛涛诗笺》，至祁教政。塑像之议，已见温昌绪、刘啸音两种，温作曾展于美术馆，刘作已建于三台县。愚以为均不见佳，不如无有也。尊意欲竖于乐山，未悉是否囿于刘孟沅以为涛系该县人之故，刘说谓据县志，弟已查过，实无此说也。今后有便，尚祁时赐教言。先生已过古稀，自谦称晚，罪杀小弟矣。幸勿客气，始见交情。草此奉复，敬颂道安。弟 篷舟上言。6月12。

林希翎

1957 年中共整风运动，在“鸣放”阶段，人们尤其是青年学子，本着由衷的、天真的出于爱戴向党提出我见，以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马首是瞻，各省市 学生无意间互相影响，像钱江的潮水，后浪推前浪，蔚为壮观，其程度可与后来的 89 年天安门广场的波澜相比拟，祇是形式不同而已，然而，无论朝野皆浑然对“阴谋”、“阳谋”玄机其时皆无法体会。等到反右运动步步深入，殃及年轻学子，北京各大专院校就首当其冲，其中以北京大学谭天荣、人民大学林希翎为批判重点，全国报刊，一时撰文对其批倒、批臭，长篇累牍，历久不衰，其触目惊心的程度，不下于批判大右派储安平、章伯钧、葛佩琦等。为配合报刊批斗，还有电影《反右派斗争》宣扬教育广大人民，让人民进一步唾弃右派份子。我当时是福建师大艺术系学生，我班以比例，要“揪出”两个右派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叶焜。学生右派年轻阅历浅，在此后的 20 多年遭遇中一般都沦落在低层，是右派这一族群中最为惨淡者。当时《反右派斗争》宣传影片在福州公映时，身为右派，我没有胆量去看，可是叶焜看后，回来悄悄的、激动的对我说，他在电影里看到学生右派中的大右派林希翎了，他非常敬佩她在斗争场面上，面对着千夫所指（应该是万夫），从容自若，面无惧色，并说她面目清丽，穿一袭旧军装，两袖卷在肘弯处，一副英姿勃发的样子。叶焜赞叹说，做右派就应该像她这样，“臭”得壮烈，像我们这样窝窝囊囊被人揪斗一场，算什么？叶焜还说，他要设法到南洋经营橡胶园的姑妈那里去，他要混出一个百万富翁来，他要挣钱给林希翎用。

我以后就一直后悔，没有看到穿旧军装，面目清丽，临危不惧的林希翎形象！

意想不到的，度过了艰难困顿的 23 年后，我和林希翎都生存下来，我们不但相遇，而且相交。那是在 80 年代初，全国右派大都已“落实政策”，安置就绪，而林希翎则属于少数几个典型右派，不予“改正”，留作“活教材”者，以示党的政策路线一贯光荣、正确，反右祇是“扩大化”而已，右派以百万计，除章伯钧、林希翎等 5、6 人外，其他均为“扩大化”。林希翎从她待罪的浙江省武义县前往北京，奔走于各有关部门，要求彻底平反。此时她认识了从大西北返回原单位的右派乡亲陈朗，于是在京活动期间，就曾一度寄宿在和平里陈朗和女儿的住处。其时我在杭州工作，二幼等自京来信时时提及林希翎种种，说她是一个热情、活跃、不拘小节的人。她虽然往返北京多次，但都与我到北京的时间相左，始终无缘识面。

林希翎本名程海果，浙江温岭人，父亲早在 40 年代去了香港，她随母在浙江，成年后就读于北京人民大学法律系。人们说她因为钦佩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二位敢于批判大学者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因为是小人物批判大人物，几经受挫，毛泽东给他俩撑过腰，而成为全国明星，程海果推崇这种精神，在他们大名“李希凡”、“蓝翎”中各取一字，因母亲姓林，故名“林希翎”。陈朗曾问过她是否如此，她说这是巧合，非事实。

1982 年夏，我在杭州为暑期《大学语文》教材集体备课，回家上楼，见东窗下，一位体态丰盈的中年女子，大大咧咧的半躺在藤椅上，微笑着并不起身，陈朗坐在她左侧，他让我猜猜这是谁？我不待思索冲口而出：“林希翎！”她并不接话，也不起身，却以脚用力顿地板，大声赞叹，说她料不到陈朗有这么一位有风度的夫人，说陈朗好福气。这一次她在我杭州的家中，住了 3 个晚上。此时她的工作已初步落实在金华市文联。她又忙碌起来，大多受人之托，到杭州时，她即带来一本《曹天风诗集》稿。曹天风是一位才气横溢的旧体诗家，老右派，程海果与他并未谋面，即为之奔走谋出版。又因她在人民大学是学法律的，所以亦有多人托她担任辩护律师，在中国这块权大于法的国家里，她觉得十分无奈。一日深夜，我们总算有机会谈心，她说到她的婚姻。说反右斗争后，她曾一度留在人民大学干些杂活，起“惩恶示众”的“活教材”作用，后来被辗转送往监狱和劳改农场（剧协老右派戴再民曾在一个拘留场所与林希翎有过短暂的待罪遭遇，老戴说林希翎每日记日记，锻炼身体，还拉二胡自娱，没有丝毫自暴自弃情绪，甚佩服她）。她说到她在监狱时，由于死不认罪，时与管监狱干部发生冲突，干部骂她，说她这样的认罪态度将会老死监狱而断子绝孙。若干年后，毛泽东主席于日理万机中忽然向左右问了一句“林希翎现在干什么？”于是立即被关注，立即鸡犬升天，立即从农场被安置到浙江省武义县一个农机厂当工人。她的师傅是一位从浙江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年轻的师傅与徒弟在朝夕相处中，被她的

性格魅力所吸引，由欣赏、爱慕 而求婚。林希翎自我解嘲说，在囹圄中与社会相隔若干年，一旦重回，就像出土文物，仍然保持着“入土”前的学生风范，仍然单纯。林希翎不得不向年轻师傅暴露 真实身份与不相符的年龄差距。师傅认为既然毛主席他老人家都关心她，夫复何疑？至于年龄大小，他也不在乎。林希翎想到了监狱干部咒她断子绝孙的话，何况小 伙子不在乎年龄差距和她的政治身份，遂与之结婚了。婚后他们有了两个男孩，都是由孩子外婆带大的。至于他俩的夫妻感情，并不很谐调。她感叹说，她不是一个 好女人，她不应该结婚，她没有资格为人妻子，为人母亲云云。

在这一次武林夜话后，我再得到她的消息都在报章上，先是有消息报导林希翎到香港并到台湾探父，在台湾，她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表态对国共两党均不感兴趣，她来台湾仅是探视父亲云云。

到了 80 年代中期，报章又载林希翎一家四口赴法旅居，她被聘为法国某科学院院士。

我和林希翎之间，从无鱼雁往返，我们之间非老友，非深交，祇是有共同的命运，今后若有机会重逢，我相信我们仍然会彼此沟通的。

57 年“鸣放”运动以前，身为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的林希翎即已头角渐露。曾受聘为《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到各地采访，并多次担任

陪审员，参与政法方面的社会活动。在这期间，她得识了团中央负责人胡耀邦，且与胡的一位青年秘书某多有接触。鸣放运动开始后，与某的接触尤多，从大鸣大放的交流发展成为恋爱关系，且发展得很快，待林人大毕业就将举行婚礼。谁料风云突变，一场反右的大风暴将这对情人分隔开了。某也被打成右派，且被开除出中央所在单位，流放到外省。等到他们的重逢，已是20多年之后的80年代初，林为落实政策到京上访时，二人都经过沉沦且各自都已结婚并有子女了。他俩在北京曾抱头痛哭……

80年代初林在北京为其平反事奔走，曾与胡耀邦有过多次电话交谈。也到人民大学党委会交涉多回，最后祇允许发给她一张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证书，连“改正”也得不着。当年人大给右派定性时，革命前辈、老校长吴玉章出于爱护之心，要保她而没有保住，结果她被定为“极右”学生而重判15年徒刑。后来虽因毛泽东一句话“从宽”给分配到武义农机厂当工人，实则刑期也差不多已经满了（祇差几个月）。人民大学之所以不给以“改正”，显然是出于最高决策者的旨意，即要在全中国保留若干个右派作为“活”的“标本”，用以说明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没有错（祇是“扩大化”而已）。当林希翎拿到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证书，准备“打道回府”回浙江时，曾向胡耀邦电话告别。行前，得到胡秘书转致她的8字赠言：“祇要我在，后会有期。”可惜的是不久林希翎即离开了大陆，“我”后来竟“不在”，“后会”自然是无望的了。

也是 80 年代初，林希翎即将离开大陆赴海外探亲之际，她草了一篇数万言的《给邓小平的公开信》，信的开头称谓为“邓伯伯”。信发出了，据说邓接读 此信后，曾“大发雷霆”。看来邓的气度不及胡耀邦的大。此信的副本，在林离开大陆前先曾请一位知友赴香港时带出，嘱托在未得到她同意前不能公布。等到林抵 香港后不久，此信终于在《广角镜》上连续两期全文发表了。文的内容大致分两个部分：前部分阐述当年自己的右派言论，无论政见，与对社会制度、经济等观点，同邓复出后所实施的各项改革，都很相似。她说她不改初衷，十分愿意做右派，无须为她平反或“改正”，说她右派当定了。于是她强烈地提出要求给她一个人民代 表的席位，让她参加人大会议，充分抒发她的右派论点。后部分请求因她牵连而被打成右派或受其他不公正待遇的近百人，给予他们平反，因为在鸣放中，许多青年 曾响应她的论点，在反右当中，有些同情过她的人，均受到各种迫害。文中还举了一些事例，其中一例是她被打成右派之初遭到拘捕，关在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监 狱，因病住在公安设的医院治疗时，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考虑到毛或收不到信，想到鸣放阶段曾经得到郭沫若对她的当面赞赏，也许郭能帮她将信转去。因在住院 当中一位护士对她表过同情，她即委托这位护士将信寄给郭再由其转递。护士毅然担负了此一委托。不想郭某竟直接将信交付给了市公安局。这位护士于是遭了殃， 被开除并被打为右派。林希翎文中对郭沫若有一评语，谓“有才无德”。

当林希翎 80 年代在京活动平反之事时，与文艺界人士多有接触，中央电视台新闻摄制组对她的活动有作录摄之举。他们竟未忘怀她当年叱吒风云的日子，可见她的“知名度”。当时录摄安排的诸场景有：她与吴祖光、新风霞夫妇的，与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与陈朗好友陆阳春的，等等。无非都是与右派们在一起。右派确是“香”了一阵。已经摄录了一部分，且作过试映，但未完成，停止了，故未得到正式放映。不管怎样，80 年代大陆的文化艺术界确曾透露出一丝曙光来，以后的岁月则是随着右派白桦的电影作品《苦恋》的挨批，与清除“精神污染”新运动，复归于黯然了。至于林希翎，在大陆就少有人再提起她来，谁还能记起鸣放时她的那段“苦恋”呢！

“右派情踪”（四）

（新西兰）周素子

王流秋

王流秋从 50 年代初开始，就是原国立杭州艺专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教师，但他与当时艺专教授如黄宾虹、潘天寿等完全不同，后者都是出身旧家，有国学传统的画家，而王流秋是泰国华

侨，而且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来的。

40 年代，王流秋尚属少年，身在泰国，而思效忠祖国，受当时潮流影响，历尽千辛万苦，只身抵达延安，一方面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一方面进“鲁迅艺术学院”研习油画。精湛的画技，使他在 50 年代后有机会荣任艺专教师。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大多在“白区”、“旧社会”成长，出身非工农兵家庭，算是“先天缺陷”，是历次政治运动检查的对象。而王流秋在延安革命熔炉中锤炼出来，真是百中挑一，凤毛麟角。他属于“又红又专”的大学教师。

国立艺专（现称中国美术学院）有教师宿舍在西湖北山岳坟附近栖霞岭 108 号，57 年整风反右阶段，我哥哥周昌谷在美院任教，与王流秋都住在该处，我父母与哥哥同住，我在寒暑假由学校返家能时时见到王流秋，我们算是芳邻。

王流秋也被打成右派，同样受到孤立。他深居简出，脸上表情甚为冷峻。一反当时常情，身为右派份子的王流秋此时竟向“革命”的妻子提出离婚！他在延安时结婚，与妻子是“革命伴侣”，同来杭州后，妻子在浙江医学院任职，也是共产党员。在很长时间内，他的妻子不愿离婚，虽然分居（女方住医院宿舍），但常为他送日常用品来，她自己站在栖霞岭宿舍门外，由孩子送东西给爸爸。每当这种时候，我的老母亲若看到此，就私下为他妻子抱不平。但最后他俩还是离婚了。

文化革命一开始，受磨难的知识份子就面临更大的灾难。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是造反派的司令部，一时抄家、批斗、隔离，来势凶猛。王流秋等一概不能幸免。几年以来，运动常处于一张一弛中，故王流秋有时被监督洗厕所，有时又被关押，有时亦有人见他在风景点为人画肖像赚钱。但在某一次关押中，他竟不可思议的锯断铁窗的两根铁条，逃走了。王流秋拒绝改造，自绝于人民的消息，一时震撼了人心。直到王流秋于中缅边境偷渡被抓获押回后，人们才知道他的去向。

原来王流秋是想回泰国去。当时不允许私人出国，祇有偷越边境一个办法，但偷渡属叛国，抓获是要判重刑的，何况是身为政治犯。他为越境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预先设法向泰国寄出两张名家国画，以便在抵达泰国后变卖可作日用，又购了一只汽车内胎，好在漂流时节省体力，然后备足可供若干日消耗的干粮。在中缅边境选择好一条河流，为了安全，他祇能于夜间漂流。这类终年不通航的河流急湍，肯定惊险万状。日间他则伏于丛草岩石中，如此夜行昼伏，过了若干天。他计算日程以为已经安全出境，但一经上岸，谁知尚在境内。有人说，他若再坚持半日一日，就可出境了。他被边防民兵押送公安机关，再被押解回校。见到他的人说，他消瘦、黝黑、长发，形容狼狈。此案由法院裁决，被判处 20 年徒刑！

美术学院的“造反组织”为王流秋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追随足迹。满含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专案小组都是年轻学子组成的，他们在调查后，竟发表申明“王流秋不是罪犯”。理由是：王流秋当年既为实现理想，从泰国到延安，今日，现实粉碎了他的理想，他想回到泰国去，算什么罪？！调查组自称为“5牛战斗队”，因为调查组成员为5人。那时凡是历史、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蔑称为“牛、鬼、蛇、神”，关押处称“牛棚”。此5人准备坐牢，故自称“5牛”。真勇士也。

70年代末落实右派政策，王流秋回来得较晚，已在80年代初了。是由他学生，当时已在美院任教的徐永祥到监狱将他接回的。徐永祥和我说起，别人在10年中都荒疏了画艺，而王流秋却有机会在劳改场所继续绘画，他的艺术更为长进了。王流秋还带回大批油画习作。落实政策后的王流秋，仍任美院教授。至于那位离婚的妻子，仍然在等他，他俩为大团圆结局，复婚了。

朱金楼

朱金楼先生是浙江美院老教授，美术评论家。

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他曾有过几年短暂的美好日子，其时学院还未迁院，坐落在西湖中的孤山南麓，近侧即是西湖十景之一“平

湖秋月”，连接着 孤山是桃红柳绿的苏、白二堤。孤山上有许多古文化旧址，有清朝藏四库全书的所在文澜阁。后来的省博物馆和省图书馆即建于近处。尚有声闻遐迩的西泠印社，陈 列有东汉三老碑诸古石刻。人们蕴涵在古今文化气氛中。

50 年代初的朱金楼，30 岁左右的壮年，教学、着文，习画并雕塑。他拟塑一尊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第一俏丽人物晴雯像，要在人间找一个活晴雯作 为模特儿，于是物色到了浙江省越剧名旦张茵小姐，在若干个年月朝夕相处中，朱金楼对张茵，眼观手摹，等到塑像告成，他俩也成为佳偶了。苏白二堤及孤山处处 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一个春日，我和哥哥昌谷在平湖秋月旁的湖船上，见朱金楼和张茵时时隐现于白堤的怡红快绿中，张茵身穿淡绿色旗袍，白鞋，打一顶藕合色遮阳绸伞，粉装玉琢，体态轻盈，衬托着朱金楼的朴实倜傥风调，好一对神仙眷属！这一印象给我的深刻，竟历经半个世纪尚在！

自朱金楼被打成右派后，这一对神仙眷属，究竟经不起政治风浪的考验，成了怨偶，不久也就离婚了。佳人归了沙吒利——张茵与当时的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 长张某结了婚，并且还带走了与朱金楼所生之子，小名叫做毛毛的。张茵仍然活跃在艺坛上，而且荣任省越剧团团长。她与张某生了一个小公主，取名巧鸿，巧鸿虽 没有母亲那般俏丽，但她比母亲有学问。成年后的巧鸿，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任《江南》杂志编辑。上世纪 90 年代初，巧鸿成了我的朋友。

相比之下，朱金楼的遭际与张茵可谓天差地别。右派本来就受孤立，加以别无家庭成员，他越显得形单影只，且不能再从事教育工作，所有的研究、著述工作也都被逼停顿了，祇能做一些与本职毫不相干的半体力劳动。“文革”开始，他所在的浙江美术学院发生很大的变化，当时已迁在城内南山路，这里成了省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早经停课，斗争比别处尤为激烈、残酷。院内如潘天寿、吴茀之等教授也均被关入“牛棚”。学院且成了全国群众串连时的临时旅馆、食堂，牛棚中的“反动份子”随时待命，被拉出来示众。他们有特别的帽子，在帽子上书明姓名、反动身份（如“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特务”等等，不一而足）。在进餐中，将这批“牛、鬼、蛇、神”集中一处，让革命群众围观，向他们丢掷骨头、菜皮以取乐，像耍猴一样。我哥哥周昌谷的英年早逝，与这一折磨和摧残有关。朱金楼在遭受这些非人待遇中，变得更沉默寡言了，身体也更为衰弱了。

浙江美院的革命热潮，发展到扎根农村，彻底迁移到桐庐分水县，算是达到高峰。在丛山中的分水县建立校舍，全体师生都搬到新址，且亲自动手盖房，雕塑系的师生，个个上屋，成为“称职”的泥瓦匠。但在文革后期，又络续返回杭州，就这样被折腾着。至于这批新老“反动份子”，尤其是右派，是最先下乡，也是最后才允许回城的。其中朱金楼，要到 80 年代初期才最后返城。他早早被人遗忘了。

我再见到朱金楼时，是 80 年代末，在孤山文澜阁的偶然相遇。他对我发表在《徽学通讯》上的几篇考证文章表示赞赏。“徽学”是一门近年来才兴起的学术研究，较偏而专，地方色彩较浓，不像《红楼梦》“红学”那样普遍受人注目，因此我对朱金楼的阅读之广之微，甚为惊讶、钦佩。

90 年代前后，朱金楼已到了古稀之年，大约深感老境凄凉吧，他与苏州大学一位女教师结了婚，女方祇有 40 多岁，过去的婚姻情况我不清楚，但据说人很漂亮，而且学有专长。朱金楼这次的婚姻并不幸福，他几乎没有家庭生活，女教师仍居苏州，很少到杭州，朱金楼也没有离开自己已久居之地到苏州与她同住。连朱金楼的紧邻金冶先生也祇见过女方一面。据张巧鸿告诉我说，女方对朱金楼没有感情，她祇是为了到美国去，恐怕单身女性容易遭到使馆拒签，找个老者结婚是她的策略，作为幌子。女教师到美国以后，与朱金楼就几乎没有关系，音讯隔绝！大约在 1992 年，朱金楼重病住院，在医院照看他的，是他唯一的亲儿子毛毛。垂危之际，巧鸿奉母命，到医院看朱先生，送了一束鲜花。朱先生见到这位面庞略肖当年张茵的女儿，老泪纵横，微弱地说了一声“谢谢”。据巧鸿说，那位在美国的女教师，在朱金楼病逝后，曾回国处理遗物，取走了朱金楼所有的书籍、绘画及全部遗产。巧鸿对朱金楼没有给侍奉病榻之旁的亲儿子一点遗产，一件纪念品，表示不解和不平。我想，朱金楼也许没有想到自

己一下子会死，他还憧憬来日的家庭生活吧？

李家桢

李家桢是 50 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首任院长，他从延安过来，是老共产党员，受过红色的革命洗礼，故有此荣任。

到我认识他时，他已身为右派，年过 60，白发飘萧，垂垂老矣！70 年代中期，我尚在杭州郊区一个农村小店谋食，而安家在杭州城内武林路一间小阁楼里。阁楼木结构，在 3 层顶部，为原先房主人堆置杂物之所，大多地方身体不能直立，从木梯盘旋而上。阁楼分东西两间，我住在西边一间，也是过路通道间，东边一间住着王绍舜先生，他早年习美术，后写剧本，但于 50 年代末即被省文化局勒令退职，属于“队级异己份子”。他的生活来源是一个当裸姆的妹妹供给，身患肺病，常咯血，穷愁潦倒，他之能够在毫无医疗、半饥半饱中存活下来，因为他有精神寄托——醉心于弹奏古琴。每当夜阑人静，陋室焚香，七弦琴音量微弱，余音仅萦绕阁楼之门闾，并不惊动四邻。因为他早早离开了工作单位，倒幸免于抄家，保存了古琴，有一方与外界迥异的天地。我做了他 10 年邻居，听了 10 年的《高山流水》、《平沙落雁》，我是唯一的“知音”。冬夜雪浓，邻翁琴韵飘然入于卧榻，“一曲‘胡笳’声欲裂，始知人世有知音”，这是在那残酷岁月

中的唯一也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了。李家桢到阁楼是来向王绍舜学习古琴的。他学习古琴是为纪念他的亡妻学鸿女士。学鸿是他在延安时的革命伴侣，他俩共同生活了 20 多年，尤其是在他划为右派的孤立岁月中，学鸿与他同舟共济，为人温文尔雅，逆来顺受，可是没有等到李家桢“落实”政策的一天，即死于癌症。她与李家桢留有一女，名唤 李其容，其容从童年开始，就在右派家庭的阴影中长大，在文革中被牵连冲击，并下放到黑龙江北大荒劳动。长成后的其容，有大家闺秀风范，文采菁华，成为一名 作家，那是后话。学鸿生前善书法，精琴艺，现今人逝琴存。李家桢思念亡妻，不愿广陵绝响，于暮秋之年，拜师研习。我和王绍舜既是紧邻又有乡谊，李家桢是阁楼常客，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况我早闻其大名，真是相见恨晚了。李家桢性格于诙谐中寓刚毅，比如右派定性必须于“认罪”书上签字，但即使再施加压力，横加威逼，他就是不签字，不认罪，以致在 79 年落实政策要为他摘帽改正时，他也不屑，他说：“不是右派，哪来改正？不戴帽子，哪来摘帽？”这样无畏的右派，在那个帽子横飞的岁月中恐怕仅此一名。

在落实右派政策前夕，大约是 1978 年，一日，李家桢到阁楼来，一反往昔诙谐、轻松之态，严肃的与我们商量他的一件婚姻大事：他想与前妻淑贞女士 复婚！李家桢是湖北应城人，出身旧家，在不到 20 岁的时候，即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与长他一岁的淑贞女士结婚，并育有一女。早先革命浪潮席卷各个山村 时，李家桢受到鼓舞，

抛妻别女远赴延安根据地。在延安期间，自然要挣脱封建婚姻的枷锁了，他与淑贞协议离婚，与志同道合的学鸠结了婚。淑贞是旧式女子，矢志不再嫁人，她在那个大家庭里，侍奉公婆，抚育幼女儿，她的感情生活，没有人关怀，然教女有方，此位长女后来是个有成就的医生。至于在经济方面，李家桢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接济她们。

李家桢经历了反右斗争，爱妻仙逝，弱女下乡，算得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得了心脏病，他想有一个人生的避风港。他常常回应城老家，那边还有发妻与长女，还有一些亲戚故旧。回过几次家乡，淑贞均亲自下厨，殷殷款待，家乡口味与愧疚之心感化着他的身心，他萌生归隐黄叶村的念头，加之亲戚故旧的劝说撮合，于是他想与淑贞复婚。他将这一大事相商于王绍舜和我，问是否妥当。正因为是患难朋友，用不着按常理奉劝相合，王绍舜的观点正好和我一致，我们都认为不必多此一举。我的看法是：30多年的感情隔阂，和知识水平的悬殊，倒不如像眼下一样，保持介乎亲属、友朋之间的关系，可以每年回一趟湖北老家，愿多住些日子也无妨，尝尝可口的家乡风味，逢年过节，或是对方需要时寄些钱回去，她会感激，会觉得安慰，若将两人关系再绳之以法律，未免会产生种种复杂的纠葛而怨怼……。。过了几个月，李家桢心脏病发作，三思之后，觉得互相照顾非常重要，何况他一直想偿付他的感情债。当时他女儿其容早从黑龙江返回，在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李家桢为了避免与

女儿间的矛盾，托我在杭郊为他俩租一处住房。一切安顿就绪，我终于见到了被遗弃数 10 年之久终获破镜重圆的淑贞女士。她是标准的乡镇妇女，依稀可见年轻时的眉清目秀，说着地道的应城方言。李家桢极力想使夫人满意，据他说，走在泥泞的田间小路上，淑贞的假扮大脚鞋数次陷入泥中，都是李家桢为她拾鞋的。但不久，这种《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乐”就被清官也难断的家事纠纷所替代，大母、继母、亲爹、继爹、长孙、次孙，种种 纷繁，两年之间，淑贞赌气回应城老家多次。李家桢最听不得那些对其亡妻学鸠的怨言恶语。他叹息说“不读书真是太可怕了”！淑贞终于回老家，不再到杭州，李家桢也不愿再回应城。他避免与她相见，他们的夫妻关系，到这时，真正是“名存实亡”了。

右派情踪（五）

（新西兰）周素子

金冶

在 50 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教师中，被人称为“三金”的三个教师，职务地位都较高，教学和画艺也都是佼佼者。这“三金”是朱

金楼、金浪、金冶。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三金”都被打成右派。金浪死得较早，朱金楼则苦头吃尽，于“落实”政策后，在孤寂中死去。祇有金冶先生健在，矍铄硬朗，以 80 岁的高龄于大前年（1994 年）赴法国访问，据说自己设法留居于法国，他的油画也被一位法国画商看中，成为他的经纪人。夫人董琳也于 1995 年赴法国团聚。他们有四个孩子，长女约在 1988 年赴澳洲留学，接着两个儿子先后赴加拿大，小女儿作为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定居香港。一家六口，像维多利亚时代那英国的“不落国旗”，分布在世界各地。这一家人，若能像丑小鸭变成天鹅后那样，从高空俯瞰原先受歧视，遭屈辱的故土，该是何等的感慨！

金冶从 50 年代初华东美术分院成立伊始，即在美院任油画教师。他从政治中心的华北地区“南下”杭州，很受人尊重，先被安排居住于西湖风景区从资产者手里没收来的小别墅里，1957 年划为右派后，降格搬到栖霞岭 18 号。“文革”期间几度抄家，再被逼迁到南山路一间多年失修的旧房里，一家六口都挤在一起。

夫人董琳原是美院图书馆职员，金冶划为右派后，受到牵连，被开除公职，受居民委员会监督。

“文革”中凡青年学子均经历了一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洗礼”，当时金冶的四个子女都在中学念书，正是下乡对象，曾以“抗拒下乡”

罪名，将四人一起押送到桐庐县僻远山村强迫“扎根落户”。当时下乡青年大多靠家庭资助，然金冶的四个孩子不但艰苦自立，还节衣缩食，寄钱给家里。文革中，金冶由右派“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以攻击革命旗手江青罪名，被捕入狱，南山路的这间旧屋里，只剩下董琳一人，完全断绝了生活来源，靠做一些临时的脏活、粗活勉强度日。一日，我在路上与她相遇，见她的神情十分沮丧，相问之下，说是她羞愧得无地自容，没有勇气活下去了。原来她刚被街道居委会批斗回来，这一回不是因为思想“反动”，而是她“咎由自取”——她给孩子写了信，连八分钱的邮票也买不起，以侥幸之心贴了一张用过的邮票，结果被邮局退回，被人发觉，认为是“阶级敌人新动向”，让她站在凳子上示众，开斗争会。我极力宽慰她，我告诉她：以一个教授夫人，落到连八分钱都没有，是谁造成的？有罪的应该是别人不是她。事隔多年后，她对说起此事，说那一天我对她的安慰至关重要，我的理解给了她生活的勇气。

如果说教授夫人因八分钱邮资的得“咎”而自责，而心里放不下的话，那么教授对于自己“罪行”的认识，表现之大度豁达，很不一样：金冶的反党言论，经其专案组调查后，汇编成册，让金冶过目签字。这些捕风捉影的言论“记录”，在当时，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大多要作必要的纠正或申辩。可是金冶的表现与众不同，他对这本满载他罪状的册子正眼也不瞧，大笔一挥，签了名“认罪”了事。事后，董琳埋怨他，不该如此轻率。金冶竟说：“若把我真正想说的话都记下来，

可能十大册也记不完，现在他们祇记了一册，相去那么远，我当然签名了！”

教授和教授夫人就是这样刚柔相济，患难与共的度过了久长的岁月。1997 年的春节，是落实右派政策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三十除夕之夜，金冶患难中一家六口团聚一室，吃饺子，我是唯一的客人，畅所欲言，无话不谈，酒逢知己，都醉了。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不管我的工作如何繁忙，社交如何频繁，但每隔月余，必去他们的新居拜访。那时金冶专事绘画，而董琳亦于晚年练习国画，格调还相当不俗。我们的会面，宾主都极愉快！世上最愉快的事，莫过于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从 50 年代以来我们都是美院历史的见证人，对人与事，看法相同，评价相同，志同道合，在这淡泊的人生，难能可贵！“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金冶、董琳都是我的知己，何其幸也。

吴明永

50 年代初，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尚无明确分别科系（原国立杭州艺专是分系的），凡雕塑、油画、国画、版画、应用美术、史论等烩为一炉，统称绘画系，祇是各人有其侧重面而已，而素描、油画等基础，是人人必须掌握研习的。吴明永是我哥昌谷的同班同学，

他侧重史论。我哥先习油画，有“素描大王”之誉，他的毕业创作是国画西湖全图。研究生期间，与方增先、宋宗元由金浪先生带领赴敦煌临摹壁画，归来后创作了国画《两个羊羔》，此画于 1955 年荣获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后在校任国画教师，从此走上专门攻国画的道路了。

吴明永毕业后，留校任史论教师，给史岩教授作助教。当代有两个史岩，另一个在上海，也是研究美术史论的，被鲁迅先生骂过，从“隐蔽的大纛”下拉出来“晒太阳”的。凡遇政治活动，美院的学生就贴史岩教授的大字报，标题即是“被鲁迅骂过的史岩”。史岩先生惶恐分辩：“我不是那史岩，那史岩不是我！”没有人想澄清，半个世纪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都重覆地，明知故犯地扮演这个故事，史岩教授到死也未能分辩清楚。史岩教授在 70 多岁时，又续弦了一个旧军官姨太太，从此甚注重衣帽整齐，诸乐三先生“打油”他道：“帽儿光光，今夜做个新郎；衣衫窄窄，今夜作个娇客！”吴明永即是这位史岩的助教，非常勤奋攻读。他患肺病，为怕传染，美院将患病者离群索居。

1956 年前，美院未移址，尚在孤山之麓，这些肺病患者，都住在孤山东坡梅妻鹤子的诗人林和靖墓之上方的“一片云”古建筑内。“一片云”为晚清建筑，游廊重阁，可能原是别馆、私庵，在 50 年代初，充为公有，用作艺专宿舍，然破败倾颓，年久失修。孤山东北坡形胜大逊于西南坡，西坡有西泠桥通岳坟，山上有西泠印社、欧阳修六

一泉，南坡有四库全书珍藏处青白山居、清代有藏书楼文澜阁（现为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原杭州国立艺专所占即原先之白（白居易）苏（苏东坡）二公祠旧址。与国立艺专一路之隔者，即是湖边的康熙钦定西湖十景之一“平湖秋月”，和雕窗别致，亭台楼阁的犹太富商哈同花园，即被称“罗苑”者（当时为浙大教授宿舍）。真是蕴藉繁华，游人如织啊！相对而言，东坡幽静多了，乔木历历，芳草萋萋，游人罕到，真是养病的去处。那时住“一片云”的有徐永祥、沈海驹、吴明永等……。“一片云”三字镌刻于古建筑东向外石墙上，三字每个大若八仙桌面，作怀素狂草，游人大多不识，好事者过此，喜朗声吟读，有读作“一斤空”、“一斤云”、“一片空”者，令人发噱！我和哥哥昌谷常到“一片云”看望吴明永等。吴明永身材矮小，黝黑，面有菜色，大概与他的勤于攻读、病体、缺乏营养和生活习惯有关。他睡眠甚少，几乎通宵读书、写作，并习惯于深夜拥被倚枕完成。他有专门设计的木几，斜形，约二市尺长，一市尺阔，可收可放，可支于被上。若冬夜，他则倒穿棉衣，护其双臂前胸。孤山之麓，万籁俱寂，文思汹涌，笔底生花。祇可惜未能传世！我哥对他非常钦佩，常说当代那种欺世盗名的绘画史论家，给他拾鞋的资格也不够！

有时我在傍晚碰到吴明永，说“晚上好”，他笑着说：“我刚起床，早上好！”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被划为右派。吴明永是福建龙岩人，

父母双亡，祇有一个远侄（这还是他死后前来收拾遗物时才得知的）。他本属孤单，又因病而离群索居，生活习惯则“宵行昼伏”。反右斗争后，他被剥夺工作，在美院移址城内时，被发落住在花圃角落里，与杂物在一起。他几乎被人永远、完全遗忘了。但他和我们家始终有来往。他既是我哥同窗好友，我母又怜他孤身病体，即使身为右派，他也经常“暗度陈仓”而来我家。他来吃饭，必自带碗筷。但我母反对他自带碗筷，她不相信有“传染”一说。1959年冬，我生育了大幼，暂住在我哥昌谷韶华巷27号旧寓，因奶水过多，每日必挤倒数杯之多，我母认为此物富营养，可为吴明永补身，因此每日下午他必来喝奶，得以日日相见。他怕冷，穿一件蓝色布料棉军大衣，显得缩瑟、消瘦、忧伤。他常叹息我和陈朗的结合，说一个右派尚且难以生存，两个右派在一起如何能在政治高压下生存，贻害子孙啊，真不明事理，不懂世故啊！

吴明永死于“文革”前，这是他不幸中的大幸，因此可以少受许多磨难。据我哥说，他的死是慢性自杀所致，后期住院时，他逐渐减食，暗弃药物，他已窥透人生，作我佛的涅槃了。他的尸体在火葬场火化时，祇有寥寥如我哥、徐永祥等三数老友送葬。

吴明永是死了，但他的“日记事件”却在文革中作祟！他在医院病危时，手授平生六册日记予我哥昌谷。吴明永死后，我哥曾经废寝忘餐的阅读，有段日子他生活在吴明永的日记里，脸色苍白，眼神恍惚

了。那段日子，我哥变得极忧郁无为。他说，从其日记看，吴明永是必然会自杀的。可惜的是，我未能亲见这些发自极秘的内心世界的幽愁和美丽，充满纳兰性德般才气的文字！而且永远也见不到了。1966年文革伊始，我哥惮于吴明永的右派身份及其大悖于红色思潮的灰色文字，一旦被抄家，必以窝藏论罪，因而烧毁了吴明永的日记。他更翻箱倒柜忍痛销毁了自己收藏的古董和书画。他怕被误为暗藏武器，把出土的两把汉剑锯断，把唐俑、宋碗等宝物，半夜里由我母亲陪同，在西湖南岸僻静处悉数沉入湖底……。

遗憾的是，他曾保存吴明永日记一事并不是绝密的。文革开展不久，在一次大会中，领导突然宣布，让周昌谷交出吴明永的反动日记！并当场让毫无思想准备的马玉如作证。看来日记还是不烧毁的好，为什么要烧毁？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已经烧毁！由于周昌谷崇尚印象画派，他的家庭成份，他的反动学术思想，都足以算得上是个漏网右派，加上交不出吴明永的反动日记，他浑身是口，也无法说清。周昌谷因被关押隔离检查，一关即达3年之久。我哥昌谷最终也死于文革的磨难。

吴明永终身未婚，他居住“一片云”受林和靖诗人“梅妻鹤子”的影响吧。然就我所知，他有一段感情上的小插曲：美院女生吴性清，其兄是吴明永好友，吴性清对吴明永从敬佩到产生了爱情，但遭吴明永婉拒了，他认为自己有病，更觉得自己的暮气将会妨害吴性清的韶华。

这使得吴性清更为感动。她自此将吴明永视为知己、密友。吴性清长相很清纯，剪着齐耳短发，体相庄严，面如满月，一副浑沌无窍凿的忠厚仪表。

吴明永大约早抱定终身不娶，因为还在他刚过三十而立的年华里，就认了一个干女儿，这个女孩，当时祇 6、7 岁，是在他住处附近“平湖秋月”边草地上见到她的。小女孩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我见过她的母亲，一个平常的女工。吴明永认真培养她读书、绘画，昵称为“咪咪”。成长后的咪咪娇甜玉立，确似小家碧玉。在吴明永死时，咪咪亲到火葬场送终。80 年代初，咪咪与她的丈夫张某曾到我的阁楼看望过我。她能送义父之终于落寞之时，又能探访义父的友朋于若干年之后，看来咪咪是有善根的。

约在 1991、2 年间，美院党组织终于为死去多年的吴明永作政治上的平反昭雪，开过大会，徐永祥、马玉如、金冶先生等均都莅会。其时我公差在外，未能到会。他的知己、我哥昌谷亦已仙逝多年，愿他俩的英魂能徜徉于南、北高峰间，并孤山之麓、西湖之滨！尚飨！

夏与参

在 50 年代初，我还祇 10 多岁的时候，即知道夏与参其人，往后的数十年岁月中，由于我的生活变迁较大，“脚跟无线如蓬转”，在杭州的时日不多，而 夏与参虽则始终在浙江美术学院，见面的机会却甚少。说起来我的家庭与浙江美院（其前身为国立杭州艺专）的渊源颇深：首是陈朗早先就读于该校；次是我哥昌 谷、昌米就读于该院，毕业后任教于该院；再次是二幼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后受聘任教于该院。半个世纪以来我结识浙江美院师生几代人，与夏与参虽相同身为右 派，可甚缘悭，与他祇见过两次面。

1952 年我在杭州师范学校读书，前在温岭初级简师时的老师王伯敏当时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正活动商调到杭州国立艺专任教。王伯敏毕业于上海美 专，后期专攻中国绘画史。其年冬，他到杭州谋事，约我于一个傍晚到孤山访夏与参。夏与参从杭州国立艺专毕业，在中共建国以前，他曾是当时学校学生运动的中 坚份子，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据陈朗说，他还长于事务与管理才能，如筹款、举办义卖、救济贫穷学生等。毕业时正逢中共接管该校，他被留校协助接管，且任 教务、人事方面工作，有些实权。王伯敏想调入美院工作，故找他帮忙。夏与参当时住在孤山僻静处一所艺专宿舍内，我们穿花度柳，曲径通幽地找到他的住处，然“雨打梨花深闭门”，他不在家！我们在门口伫望了片刻，王伯敏甚为惋惜，他当时从温州来杭，得经几天舟车劳顿，何况谋事心切！这一次我没能见夏与参，一直 等到彼此成为右派，“生入玉门关”，得“落实”、恢复工作，之间 30 多年的漫

长动荡岁月后，才在美院李家桢老师家第一次与他见面。

大约在 1985 年秋吧，李家桢请夏与参吃饭，在李家桢南山路美院教师宿舍中，因我为李家常客，故也被邀。其日，由李家桢的女儿李其容掌勺。原来李 家父女二人，各有其友好。如逢女儿李其容宴客，在她相与的一班朋友中，我常为座上客。记得 1979 年冬其容宴请朋友，从中我得而结识了厦门才子王翼奇，后 与他交往甚深（他后来任浙江古籍出版社副主编和副社长）。今则父亲李家桢宴客，我也为座上客。在他家两代人中，我的年龄居中，可谓两无隔阂。那天见到夏与 参，无丝毫生疏感。夏与参原名代育，字与参，以字行，四川人，乡音浓重，个子甚矮小，小小的方脸盘，小小的手脚，穿着整齐、清洁。那天三人对饮，随意而 谈，就谈到浙江美院的极左思潮，迁校分水县，扎根农村时的荒诞、劳民伤财，戕害知识份子诸况；喟感岁月流逝，旧友星散，多人亡故；谈到美院历次运动的极左 表现，雕塑教授萧传玖因不堪屈辱而上吊身亡；王流秋的逃亡被捕；造反派头目张永生在“四人帮”倒台后病死狱中，以及某些人卖友求荣、钻营、无耻，各派之间 的殴斗；更评论画坛流派，新事、旧事……正是往事如烟！不觉夜深樽空，三人均微醺了。

夏与参当时已 60 多岁，然尚独身，似也无意成家。时正在勤奋习画，并想另辟蹊径，感情甚有寄托。据陈朗说，夏与参在求学时期曾致力于白描工笔人 物，曾见其临摹过唐周昉《挥扇仕女图》等。惜

甚少见其作品传世。李家桢十分赞扬夏与参的洁身自好，生活谨严，说他在最艰辛的日子里，也未曾见其有过生活上的拮据、狼狈。“文革”期间，浙江美院对所有“牛鬼蛇神”（包括地、富、反、坏、右以外的新、老阶级异己份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每人每月祇发给九元人民币为生活费，例如我哥周昌谷，当时家有老母、妻子连他共三人，每月祇发给 27 元人民币。别人都不够用，苦不堪言，而夏与参（右派份子）同样的祇这么一点收入，但他节衣缩食，安排得当，除奉养（寄钱）在四川的老母使勿致冻饿外，居然还借钱给别的患难朋友，为人解急。

在李家桢家识荆以后，由于彼此忙于工作，未获机会再与夏会参谋面。次年，也即 1986 年春，偶然的又有一次与他相见，地点为杭城吴山茗香楼。那天我陪老母登山赏花。我的老母生平最喜爱观剧、赏花，四季中不论桃花、荷花、桂花、梅花，祇要逢开放之时，必思外出赏花。比如孤山之梅，常盛开于风雪交加之时，老母则必穿上厚棉袄，缠上围巾，作踏雪寻梅之举。老母虽无书本知识，但对梅的花、蕊、萼、色、面，无不精赏，恐“梅王阁”主人高络园也无此精到！平时在我们自己陋室阁楼屋顶阳台上，老母即莳花有 50 余盆，精心培植，护理，乐此不疲。

杭州城夹于钱塘江、西湖间，故东西窄，南北长，俗称“腰鼓城”，吴山横亘城中，将杭城分为南半、北半，更具形胜。吴山西连云居山、

桃花山，隔万松岭为南宋故都皇宫所在凤凰山。吴山南麓一带则为宋室皇族贵胄的别业遗址，遍山摩崖石刻，有宋米南宫“第一山”、苏东坡“感化岩”并元麻曷剌密宗佛龕等胜迹。吴山之顶建有“江湖汇观亭”。吴山上有若干棵宋樟，被荣冠全市古树“一号”、“二号”……。

吴山在城内，近在咫尺，山路平坦，为我母常临之所。我母平日甚为节俭，凡萝卜头、菜边皮皆盐渍作饭菜，但外出则喜尝美食，不需多样，但求精美。就在此繁花似锦的春日，我陪老母于吴山茗香楼进餐。进门，祇见南边明窗下若干人围圆桌大啖高论，认得是美院黄裳等一干人。又见西窗下一人悠然独酌，细辨乃夏与参也。我们就近入席相叙，夏与参说，该日美院部分教师联袂郊游写生聚餐，他之所以独酌，是因为大啖既费资又嘈杂，不如独吃经济实惠，落得清静。我母甚赞赏他会过日子。

归后，我将夏与参茗香楼独酌之举，说与我哥周昌米听。我哥即谈起夏与参断桥相亲轶闻一则：某年某日，有冰人为夏与参作伐，相约某女与他于白堤断桥（即传说许仙与白娘子初次会情处）相见。暮色苍茫，两人按时先后而至，各坐于断桥石栏上。夏不与女者打招呼，也不寒暄，更不看女者，祇看西湖。良久，以浓重的四川普通话作开场白：“我，夏与参，42岁，男，汉族……”道白完毕，回头看女者反应，不料并无人影，那女人早已不知去向……。

这轶闻可能有“演义”成份，后来我续听到有详、略多种“版本”。大

家之所以乐于传述此一轶事，想来一则对他婚事的关切，再则对他特立独行性格的激赏。我还曾听陈朗的友人金尚义谈起夏与参，除说他平时办事的一丝不苟外，还说凡是旧友或与他有什么瓜葛的人，从远地而来访求他，谈事以后他总少不了一句郑重申明：“宿食自理，恕不招待，我是六亲不认的！”金君学着用四川乡音说此话，甚肖。

右派情踪（六）

（新西兰）周素子

夏子颐

夏子颐为永嘉人，我是乐清人，我们不同县，但同府（温州府，现称地区），故亦可称他为同乡前辈（他比我长 10 来岁）。他是一代词宗、我的老师夏承焘的侄儿，因而比一般同乡交谊深厚些。在杭州，他住建德路，与我当时所住武林路阁楼相距仅一箭之遥，又可称得上邻居。加上我们又同是右派，那便可称“一丘之貉”了。落实右派政策前夕，我尚未搬家至见仁里前，一度我们颇有交往。他的心情欠好，性格不豁达、不乐观，胆小怕事。他常到阁楼向王绍舜先生诉苦，愁眉苦脸，谈话内容乏味，从未稍涉学问，都是些琐屑的芝麻绿豆之

事，且无幽默感。他身为右派，20 多年的磨难，事业不顺心，家庭之间，夫妇关系冷漠，他有苦无处说，没有自我排遣的能力，故表现出压抑、猥琐之情！究竟 20 年右派生涯，他有何遭遇，不得而知。

一个人在遭受磨难之际，往往有多类表现：一类变得灰心丧气，从此意志消沉，以至自杀；一类为了生存，不惜卖友求荣，变得圆滑世故，自私自利；另一类则经过磨炼，从此发奋图强，更为自珍自爱。夏子颐似乎徘徊于灰心丧气、圆滑世故、发奋图强三者之间……他缺少君子坦荡、睿智深沉的风度。王绍舜先生算得上是个弱者，但他也不喜欢夏子颐，笑评他“鬼鬼祟祟，不知干些甚么！”

夏子颐中等身材，五官端正，在落实右派政策时，已 50 多岁，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在浙江省文联群众艺术馆任职，后期为专业画师。陈朗说早先即认识 夏子颐，是在他上海美专时期。陈说，当年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夏也曾意气风发于一时，以木刻为武器置身于美术战斗者行列，一直到 50 年代初，他还是以木刻创作为主，题材多属战斗性的，如表现浙南游击队员形象等……然到我结识夏子颐时，他则已专攻国画花鸟了。

夏子颐的画风先宗大颐潘天寿，后期私淑石壶陈子庄，然他均无二者大师之磅礴气象，祇取其一鳞半爪。他曾赠我一幅睡鸟图，破蕉覆盖之下，岩上有饱食相偎二鸟，略有潘翁风貌。赠我哥昌米一幅残

荷水鸟：短尾、闭目、缩爪，蹲于一枝无叶残梗之上，仅用黑色，然胜似赭黄、石青，依稀石壶笔致，用笔简练，风格不俗，实属难能可贵。

约在 80 年代初，落实右派政策之后，彼此都忙于工作事业，一个偶然机会，我到过夏子颐的建德路寓所，从室内布置中才见出他的内秀。建德路在西湖边 六公园附近，为很静的一条短街，至多 200 米长度，没有通常里巷宽度，但这里是浙江省文联所在，浙江作家协会等各协会当时都在此处。隔街为龙游路（祇得 100 米长），当代书法大家沙孟海与诗人、教育家郑晓沧寓舍所在。这一带文采华赡，诗礼之家，是个文化气氛极浓之地。夏子颐的寓所在文联隔壁、作协对面、建德路转弯处。一个小小的半圆形独立宅院，在附近新的高楼林立，一家一个“鸽子笼式”套房的状况下，他的小宅院可谓绝无仅有！小院有木板双扉门，进门是一个小小庭院，院中一棵罗汉松老树，翘首院墙之外。左侧一小间为书房兼客室。右侧一小间画室内通卧室，壁上张挂字画多幅，恰到好处。桌上之文房四宝，古色古香，精美之至。南向一律似北京四合院木格纸窗，纤尘不染。想象月夜、树影、纸窗、篆烟，真是神仙邸宅！这是我多年以来首次见到的在杭州最雅致的居所。然此屋外表，粉墙土壁，极不起眼。夏子颐却没有“裘马轻肥”之客，也没有与朋友共豪情之举，所以罕有旧友能窥见他此一世界，因为从未听说他邀请过人到他的小雅舍。小院终年双扉紧闭，何止是冷落！即使如我辈同命运近邻，也祇去过他的雅舍一回！

夏子颐夫人也为温州人，是杭州第八中学教师。她个子矮瘦，大约是经历使然，平时表情严肃。她不喜欢客人，认为闭门谢客，最为安全。自 1957 年以来，慑于政治压力，为免惹是非，她对夏子颐管束甚严。夏子颐惧内，曾向王绍舜先生叹息，说他没有家庭温暖云云。

沈沉

我与沈沉相识甚迟，始于一次偶然的机。先是从一处渡船中，结识了一个男孩，是沈沉的侄儿。1982 年，我首次回到阔别 32 年的乐清大荆镇故里，与兄沧米同行。我们从上海坐海轮抵达温州市，准备访问旧友小住数日后，再转道返里。在温州期间，一日，游瓯江江心寺，在渡船中，我凭舷观景，心驰神往。待我知觉，一个在船尾为我速写肖像的男孩的作品已臻完成。原来渡船中众乘客正都自觉地为他分站两旁，免阻视线，让男孩为我速写。比及离船上岸，我和这男孩一家人都成了朋友，一起游殿观塔。这便是李乃光、胡文茵夫妇和他们的 3 个孩子。嗣后，我访问过他们简陋的居所。胡文茵乃是过去“擒雕牌炼乳”制造商胡某的女儿，属工商资产阶级，未免遭受过一番辛酸的经历。夫妇寄希望于 3 个孩子，尽力培养，大儿、二儿习画，攻书法、篆刻，小女则习提琴，都卓有成绩。相识之后，无

论在雁荡故里或后在杭州，我们都有来往。

两年后乃光举家赴里斯本。在杭话别时，我赠文茵旧洮砚一方、元青花碗一只，以作纪念。在与乃光一家的接触中，知道他有一个敏学然而身世坎坷的同母异父兄长，笔名为“沈沉”者。经乃光介绍，在他出国前后，我和沈沉之间即有了鱼雁往返，由于有共同的右派经历，相似的兴趣，虽未谋面，即成知音。沈沉在反右之前，曾任某京剧团导演，于戏剧史研究、剧本写作、诗词歌赋，都有成就，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敏捷才思。通信中，曾猜度彼此的形象。我猜想他瘦长形，背微驼，穿长大衣，沉默寡言，一脸冷峻，有点像契可夫笔下的“套中人”。他猜想我干瘪，满脸皱纹，一头卷曲烫发，下巴瘦削，声音尖细，有些神经质……事后各寄照片，不料沈沉竟有蒲松龄笔下所说的“风采都雅”！至于我，是否下巴瘦削，声音尖细，且不遑论；但怎么会有“逸兴”上理发店，会有一头烫发呢！

在与沈沉的10多年交往中，我曾因公赴温州，他则不时因公来杭，祇要时间充裕，总在我家小住。某一个夏日，我们在屋顶阳台乘凉，夜空辽远，时花香馥。陈朗也在，沈沉很高兴，作了越剧《碧玉簪》“三盖衣”严兰贞及京剧《打渔杀家》桂英儿等旦角表演，真是摹仿逼真，唱做俱佳。还朗诵了徐志摩《披发的女郎》和戴望舒的《雨巷》，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新诗的美。

沈沉没有进过高等学府，少年时期因家庭变故，很早就独立，他的学养都是靠天资加勤奋自学获得的。前数年，当中国知识份子最关注最敏感的职称评定时，在温州市名额甚少的条件下，他经省社科院评为“研究员”，说明他的功底不浅。

沈沉的右派处分甚严，被关押 10 多年之久，期间一度与林希翎关押一地，他不讳言曾爱慕过她。1980 年前后落实右派政策，沈沉返回温州文化界工作，已过了不惑之年，与一个小学时期的女同学，此时已有了 4 个孩子的妈妈结婚成家，然相处不久离婚了。我认识沈沉时，他已孑然一身。在一次来信中，他希望我能帮助他领养一个女儿。我介绍了我在杭州郊区何家河头结识的一个农民女儿。这家人姓洪，祖父属农民中的知识份子，写得一手好字，多病，当我在这僻乡谋生时，这一家特别善待我而成了朋友。他们家很贫困，一家 7 口（祖父、儿子、媳妇、3 个孙女），常常半饥半饱。儿子名阿权，3 个女儿，虽然破衣烂衫，日晒风吹，却都聪慧，丽质天生，祖父活着时，曾托我有机会时带她们走出僻乡。现在沈沉要一个女儿，从年龄、性格考虑，觉得老二洪英最为合适。我与阿权夫妇商量后，沈沉专程自温州来杭，到何家河头。但是洪英年幼，不谙世事，她也不肯离父母远去。沈沉在乡间阿权家的土屋瓦灶之间盘桓了两天，十分无奈，怏怏而返。

沈沉曾兼任函授新诗之教育任务，深得各地学生爱戴。1987 年左

右，与一位上海女工，比他年轻 20 多岁极平常的函授女生结了婚。我曾经担忧过这二人各方面都不甚相称的结合，是否能够巩固持久。但至今 10 多年过去了，他俩的生活尚属和谐。沈沉在温州已买了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在婚后安定的生活中，他编著了浙江省部分地方戏剧史，创作了数量甚多的剧本、评论、散文、诗歌。他俩没有孩子，沈沉说，他会比她早逝，她应该有再婚的权利，又何必让孩子拖累她哩！

1991 年，沈沉来杭谋事，陈朗有奉和他的《感怀》诗二首，且录于下：

奉和沈沉感怀二首

逢人仰面岂无求，枪打原由鸟出头。
伸臂犹堪看覆辙，扯篷宁不顾沉舟。
莫言四海兄和弟，但惜一廛春及秋。
纵使庄周梦难辨，焉知为蝶抑为牛。

蝶使蜂媒为底忙，一宵风雨撼钱塘。
不从鹏鷃论高下，肯共梧桐说短长。
败叶舞窗堪入画，枯鱼衔索未充肠。

要知珠履三千客，恰有东邻比孟尝。

魏大坚

杭州西溪一带在宋室南渡初，最先曾择为皇宫基址，后经风水师另选了凤凰山南麓。因高宗说过一句“西溪且留下”的话，于是西溪又名“留下”，在东、西木坞之间，杀桥（金兵与南宋官兵曾鏖战于此）之边，逐渐形成一个集镇，即称留下镇。附近有龙驹坞，传为康王（高宗）避难时系马处。留下与松木场之间有 18 华里，沿西山筑有犂道，乃宋室礼余杭洞霄宫所经，至今依稀可辨。

我于 1971 年于西北流离南返，曾在留下一个代销店做工。每日工作时间在 10 小时之上，农忙季节还要下地劳动。在此谋生为时竟达 8 年之久。这期间 我却在早经湮没的西溪胜迹中寻访旧踪，研读一切可能得到的史料。夜间读书没有电灯，我即以寺庙中所剩余的腊烛油，浸以灯捻照明。这期间我还结识了可引为知己的几个朋友，其中有魏大坚（字伟民）先生。1971 年冬季，我在小友姜允斌（从城市下放的“知青”）处见到魏大坚篆刻的一方图章，觉得尚古朴，有汉印味道。小姜介绍说，魏大坚是老右派，全家下放在留下镇附近西木坞村。读书人临老务农，收入至微，生活困苦。说魏大坚能书、善

画、工篆刻，于诗词亦有修养。“里有贤人”，我甚想拜识他，终于在小姜引见下，在西木坞一间简陋的平房里，见到了魏大坚先生。首次相见，又是长者，穷困如我，听说老先生有痰疾，见面礼 仅一瓶半夏露止咳药。魏大坚那时 60 多岁，身材瘦小，然精神矍铄，声音宏亮，言谈风格，令人想起《儒林外史》人物，虽无杜少卿、庄绍光那样风度，却与卷末 四高人中不为财而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而喜下棋的王太等人相仿佛。

魏大坚出身不凡，祖辈中有显宦，封大夫，今杭州湖墅大夫坊，乃其祖辈余荫地址，即为魏大坚故里。他的叔父魏易，与林琴南合译外国文学，在 2、30 年代，名噪一时，是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鼻祖。魏易虽习理工，然精通外文，而林琴南于中国文学修养甚高，然不谙外文，先由魏易将故事情节原文译意宣讲阐明，再由林用古文体演绎成书，虽当时白话文运动波澜壮阔，而林琴南独钟文言，以此翻译《福尔摩斯》、《茶花女》等书，读来别饶风味！

西木坞魏大坚居舍，竹篱泥墙，室内一无长物，唯在其木框窗台上，放有一方旧端砚，厚两寸余，32 开书本大小，上有纹眼若干，砚石红赤如肝，抚之则膩若凝脂。祇这一件，就能推知魏大坚的原来家底了。

魏大坚的岳丈即精通佛法、留学日本的弘道法师，与弘一、弘伞法

师同辈，均为一代名僧。当时相随魏先生在乡间的夫人，也年近 60 岁，受牵连阖家迁往 村僻，虽粗衣、粗食，每日种蔬、拾柴，还在各政治运动中担惊受怕，忍辱负重，但她自有一股书卷气，超逸于常人之上，猪屎牛粪并不能掩盖其光辉。魏氏夫妇除 以躬耕之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外，还由魏大坚承接百年老厂王星记扇厂书画扇面的零活，收入极微（一把扇面，画山水或花卉，报酬仅几分钱）。他的书法有黄庭坚风味，绘画似从芥子园起家，然后杂仿百家。诗宗陆放翁，词法欧阳修。篆刻虽算不上大家，但所刻亦难能可贵。我曾有戏奉大坚先生古风一首，聊作先生乡居写照， 抄录如下：

清溪当门绕，绿竹抱幽窗。

晨兴培茶树，夕攻漆园庄。

顾盼何所乐，言如孟与梁。

自是寰中侣，焉足傲羲皇。

瓦罐煮红薯，野蔬泛青光。

瓮中少佳酿，山果有余香。

叉手成好句，拥鼻踞绳床。

高朋时一至，吐属皆文章。

念彼红楼人，徒教无事忙。

了翁翁未了，数典竞相忘。

魏了翁是南宋著名学人，我想像大坚或许是了翁的后人吧。

1979 年底，落实右派政策，大坚先生年老，除给予退休工资外，仍然乡居。先生有二子，长子自新疆允许返杭，次子原先务农，此时则被安置在留下绸厂做工。我则告别留下代销店，返杭任教职、编辑。多少年来，魏大坚每进城，总来看看我，80 岁了，仍然步履轻捷，声音宏亮，仍说着《儒林外史》式的人物语言：“你为何不去看看内子？她要打你！”或说：“她想死你了！”或说：“没料到能活到 80 岁，真是大大的赚了！”等等。

魏夫人却一直乡居，几乎不进城。我常怀念她，曾发过多次心愿，要专程去乡间看望她，但世事转烛，每日抗尘走俗，竟未能再一睹清韵。

右派情踪（七）

（新西兰）周素子

陆士云

我与陆士云为 50 年代杭州师范学校校友，她是在我毕业离校之后

入学的。我们相识是在 70 年代初，彼此都落魄居于杭州西湖区龙坞乡之时。

我的二姐周素琛也是右派，她的处分甚重，被开除公职，下放农村，起初在杭州郊区一个名叫湖埠的山区劳动改造，其后龙坞乡西湖茶场建成，有关乃集中了散居在杭郊各农村“戴罪”劳动的各类部份政治犯包括右派，到茶场劳动。一方面利用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便于控制、管理。

龙坞在杭州市郊东南山区，离市区约 30 华里，与钱塘江相近，若翻越东边午潮山大龠岭就是郁达夫故里富阳县了。站在龙坞天平山上，能见到名镇转塘。钱塘江在此有一个 90 度的转弯，钱江潮奇观，其潮可以汹涌至该处。杭州东部山脉都为南北走向，到钱塘江边就截然而止，祇有龙山山脉伏江而过，在隔岸萧山县再起，仍称龙山。但在东南山区，祇有一条山脉是东西走向的，故称为横山，称“十里横山”。十里横山包括慈母桥、葛衙庄、上城埭、龙坞等 10 多村庄。横山又是西溪的源头。明、清两代此一带文化灿烂。明季江元祚在横山筑有横山草堂，柳如是曾寄芳踪于此。草堂书楼上能仰见双髻峰。附近有六松社、光明寺等胜迹。登十里琅当岭能达云栖、灵隐。这里又属皖浙通道，为兵家要隘，刘伯温曾与元兵鏖战于此。清兵渡钱塘江时，鲁王监国兵部尚书张国维曾于此一带进行阻击、抵抗。横山中心葛衙庄，为明末葛寅亮（曾任侍郎，又曾在西湖南屏讲学）之

故里，清兵据杭时，为殉明绝食而亡。横山留有美人、志士的可歌可泣往迹。随着盛世的消亡，到了近代，尤其经过日寇的扫荡，焚烧，仅在里桐坞、龙门坎一带还有些残存的深藏的民居古建外，余下的仅为荒山野岭，竹林茅舍。由于附近灵隐、狮峰为龙井名茶产地，而龙坞也产茶，称西湖龙井，比狮峰龙井茶仅次一等。龙坞乡西湖茶场的兴建，意在发展经济，想不到这里竟又集中了一批文化人，祇是不像历史上那般文人的潇洒，他们是一批被流放的劳动罪人。

我的姐姐周素琛和陆士云等，均被集中于此，开荒种茶，栉风沐雨，“脱胎换骨”。这2、30名“阶级敌人”，出奇的竟不分男女，全部挤居在一间泥地、青盖瓦、四面透风，原先可能是工棚的陋室内。监狱尚且有性别之分，无论古今中外均如此，而西湖茶场对待思想犯，据所知（并所闻）为唯一的男女共“监”之所。当时场内有3名女右派：周素琛、郑玉凤、陆士云。一室之内，以蚊帐间隔着彼此视线。初到茶场时，陆士云约25、6岁，她与一位来自山东济南大学的男右派也即是茶场同室男性之一黄永根恋爱、结婚。等我认识他俩时，已有了两个儿子，均住在这间大室内，祇是将两张木床移放在室的西北角落，对面而置，仍以蚊帐遮人眼目，自成一个类似小房间的格局。就在这2、30人的声息相闻当中，他们洞房花烛，繁衍生息。这不禁使我想起了英国女皇维多利亚来，由于皇位之尊，传统继承女皇决定于她所生的孩子的性别，故在伦敦市中心街头搭台，在万众围观、监视下分娩。陆士云又算什么？她非一朝一夕，而是2年、3年，生养

了两个儿子 啊！说起这两个儿子，长名黎歌，次名亦歌，他们从出生时起就得到众多舅舅阿姨的关注。两个孩子日则随父母在茶山泥土里滚，夜则回大室与舅舅阿姨们共眠。他们带着原罪，祇认得这些“二月党人”。孩子们呼唤同室的人，都是连名带姓然后加上舅舅或阿姨的，例如：徐青枝舅舅，郑玉凤阿姨等。成长后的黎歌、亦歌，都一表人才，正如他们的名字一样，清亮光明。他们以后都从大学毕业，在事业上均有出息。

我与陆士云在相识前，均各早知对方之名，并互相倾慕，第一次见面是我在杭州，刚生下三幼不久，她特地进城看我，那年我 30 岁，陆士云 27、8 岁。她穿着白衬衫，手拿一顶草帽，个子中等，结实健美，脸色被阳光晒得红润黝黑，显得清新，有活力，充满青春的朝气，一洗城市女子的娇弱苍白。此后我常去西湖茶场，在龙坞小住，与陆士云夫妇成了朋友。

陆士云的丈夫黄永根，杭州九溪人，他在济南大学化学系读书时被打成为学生右派，处分不轻，原发遣在山东某农村劳动，他不服改造，日夜思想逃出如来佛的掌心，终于在某夜，窥测时机成熟，私自出逃。他不辨方向，不敢向人问讯，凭着年轻的体力，凭着感觉，寻找铁路。他终于听到火车的汽笛声了，于是搭车南下，回到家中。九溪属杭州近郊，不久他即被当地公安机关寻获，“就地消化”送“西湖茶场”右派集中营劳动。“青春是顽强的，那怕带着镣铐”，他与陆士

云终 成眷属。直到“落实”右派政策前夕，1978、79 年间，政治约束松弛多了，他俩才租居离茶场不远处田野中泥墙土壁的一间农舍。黄永根从来不服对他的处分，他常想上北京中南海门口告地状，他要问明白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他的化学专业虽荒废了，但心灵手巧，能编织竹篮等竹器，会做泥水匠活，我姐姐周素琛后来所住之茅舍，原是一个养猪场，泥墙上满是窟窿，是黄永根费几天工夫泥补、粉饰后，大为改观的。

1979 年右派“改正”，陆士云当上了西湖区龙坞乡里桐坞小学校长，成绩卓著，成为一位模范校长。黎歌、亦歌在国内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成为专家学者。至于黄永根则分配在留下中学任化学教师。这是一个自强不息、健康温馨的家庭，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

徐青枝

在杭州郊区龙坞乡西湖茶场的政治犯集中营里，有若干名右派份子，我因常常到那里探访陆士云等，故也都认识这些人，有数位虽与之尚没有机会交谈，但皆留有印象。其中有一位名叫徐青枝。徐青枝为杭州人，家住清波门附近。瘦高个子，黄白脸皮，性格很内向。我到过茶场多次，都没听到他与人交谈。当时他应该还不到 30 岁，

有些书生气，至于原先在什么单位工作，因何政治背景打成右派均不得而知，他也和茶场里其他右派一样，重劳动，低收入（例如陆士云与黄永根二人的工分相加，还没有一个普通茶场工人的工分高），但据说徐青枝父母亲家经济殷实，对其有所资助，所以外表不似别的右派那样显得寒碜。

茶场除这批“阶级异己份子”外，尚有领导干部与工人、知识青年等数十名革命群众，他们除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外，还负有提高警惕，防止这些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的任务。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尤其是逢节，揪斗右派等阶级敌人便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在那个年代非常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一教导！

在众多工人中，有一个名叫延龄的人物，较为特殊。他生得瘦削，为人滑头，绰号“延龄猢猻”。他为杭州西边灵隐人，出身贫农，原来在灵隐一带是个农民干部，不知道干下什么不光彩的事，作为处分，被调到西湖茶场当茶农。共产党对非政治犯罪，都特别宽容，延龄猢猻倚仗其出身贫苦，是共产党依靠对象，所以仍然气焰嚣张跋扈，常欺压那些右派们。他是携家带口住在茶场的，有其妻胡英及子一人（约6、7岁）。胡英身材瘦小，面庞清秀，是个地道的农民，朴实善良，她从不小看这些政治上受歧视的人，对他们倒富有同情心。尤其是对徐青枝，竟不避嫌疑为他缝补洗衣。时日一长，对徐青枝，从同情到以身相许。当其夫延龄确知她身孕是徐青枝的孩子时，气愤

非常强烈，可又舍不得与胡英离婚。他觉得被一个为人民唾弃的右派占了妻子，格外地感到羞辱。据说他曾呼天抢地，要求领导严惩徐青枝，否则决不罢休。若不是胡英的保护，徐青枝肯定会关入牢房，充军发配。平日看来脆弱，似无勇气，谈不上有多少见识的农妇胡英，不但不推卸责任，反而挺身而出，不顾脸面，一口咬定，是她勾引徐青枝，是她欢喜徐青枝的，徐青枝没有责任！

也许由于延龄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舆论反而倾向同情于胡英和徐青枝，况且人总还是有点恻隐之心，结果是徐青枝未受到更重的处分，而胡英则勇敢地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孩。虽然说，好花需要青枝绿叶来扶，但徐青枝终究是个右派，他不敢也没有资格保护胡英并争养这个女孩，一直到落实右派政策他离开茶场时，他仍然独身。

徐青枝值得告慰的是，能有一个善良的女性，给过他那么无私的爱情，他还有一个亲生骨肉，留在这人世中。

1979年落实政策，徐青枝回城去了，落实何处工作不得而知。后来多年中，每当我走过清波门，见到那个石库门时（那个石库门，曾经有人指给我看，说是徐青枝的家），我就会想起徐青枝并会联想起这一切。胡英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但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有否去认这个亲爸爸。

高湘华 张冰如

50 年代初，尚未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年青学子还可以自由报考中学、大学，这使我有机会从温台交界的雁山僻乡，远赴杭州省城报考高中。我的二姐周素琛和哥哥周昌谷、周昌米那时均在杭州就业、读书了。当时交通不便，我跟随两位贩茶商人，水陆兼程，才 400 多公里路，在路上却走了 3 天。初到杭州，对西湖之大，杭城之繁华，大开眼界。

我进了杭州师范音乐科学习。从进校的第一天开始，我即与同班同学张冰如交了朋友，我与冰如的友谊延续至今，已有半个世纪，无论我与之远别，或沦为右派，人们视右派为洪水猛兽，亲戚回避犹恐不及，而冰如一直理解我、帮助我、善待我，真正的情同姐妹，而胜如姐妹。如当 70 年代我在杭郊求生时，乡公社有主管学校权，以“不培养右派子女”为理由，拒绝接受我的孩子入中学，是冰如夫妻将之认为侄女，以此名义，入读于其夫陈效曾任教的杭市第十四中学。她不仅帮助我的一个孩子，而是前后帮助了我的三个孩子入学深造。祇此一件，足见情谊深厚。

张冰如长我两岁，性格温厚。善于歌唱，音色润美，当时有个杭州

中学生合唱团，为演唱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在杭城各校拔萃的歌手手中，她被甄选为演唱其中《黄河怨》女高音一角。她也比较早熟，在校时已有男朋友，是她哥哥同学，浙江大学电机系学生高天一。高天一又是她哥哥中学时同学好友，彼此穿堂入室，与冰如可算是青梅竹马关系。我因是冰如的密友，故常于假日同冰如到浙大学生宿舍，或到高天一家中去玩。高天一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浙江大学法律系教授。共党执政，学法律的都没有好下场，在我认识高天一时，他的父亲已在肃反运动中划为历史反革命而缱绻入狱了，因此我从未见过这位高教授。高天一家中，除了老母，还有两个妹妹，高湘华是小妹妹，当时在初中读书，我去过高天一家几次，祇看到那位神情抑郁、长相极普通的大妹，对小妹湘华，则没有印象，似乎没有碰面。

我和冰如就读的音专，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一位老师在给我班某生上提琴课时，丢失了衣袋中数量不少的钱。学校领导于是大张旗鼓，声言要搜查我班同学宿舍行囊箱子。此言既出，在要搜未搜之际，人心惶惶，尤其张冰如，一反平常天真烂漫的神态，郑重的邀我陪她连夜到高天一家去一趟。原来早些时，高天一的父亲在狱中坦白交代，说出家中曾藏过枪支，他因畏惧，在该上缴时不敢上缴，而偷偷投入浙江大学校园内的水池中去了。这类事对于罪人的家族，该是多么的严重和麻烦！政府勒令高家缴出枪支，高家祇得雇请农民工入池掏摸，同时又深恐抄家，急急转移财产，交由张冰如保管的是一个当时泰康公司出品的金鸡牌饼干铁盒，内装金条、金块、金首饰等。

这个盒，张冰如没有敢藏到自己家中，而放在学生集体宿舍内自己的衣箱内，这大概是冰如平时对我唯一严守的一宗秘密了。而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学生宿舍也将可能查抄，若查出这盒金子，为反革命家庭窝藏财产，那还了得！冰如此生还有什么前途？她让我陪她偷偷连夜将此盒送还高家。我俩趁 寝室中无人之际，于冰如床下箱子中取出这个饼干盒，我们还好奇的打开看了一下。冰如申言，她也是第一次开看，祇见黄澄澄满满一盒金器，捧在手里沉甸甸的， 不知份量。我们俩人轮流捧着，连夜将它送还高家了。高家此时的气氛紧张、阴沉，真难以言语形容。高天一在浙大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石油部工作。他和冰如最终 没有成为眷属，张冰如后来嫁给了陈效曾。至于我则沦落到天涯，不遑安处。有关高家的事，也就逐渐烟消云散了。

20 多年过去，1979 年底落实右派政策，我回到杭城文教界工作。一天，张冰如和我说起，她和高家小妹高湘华联系上了。原来湘华也是右派，20 多 年来，坎坷之极！由于张冰如的介绍，我见到了高家小妹高湘华。她那时 40 多岁，短发、朴素，还保持着一种大学生风度，面目端庄，沉着稳重。从她口中知道高 家以后的种种，先是她的父亲瘐死狱中，接着母亲去世，姐姐得了精神病疯了。她的哥哥高天一从中央石油部下放到安徽某工厂任职。湘华自己，因成绩优异入读杭 州名牌中学二中，但后来获知，她属于“内控”学生，档案上注有“世仇份子，不宜入大学”，光凭这九个字，足可压迫其永世，并祸及子孙。但湘华在二中毕业 后，报考大学时，因其文理俱佳，成绩

殊优，北京大学物理系竟置政治条件不顾而给予破格录取！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人誉为当代的“居里夫人”。谁又料到会有 一天反右派斗争，这斗争又会深入到大学学生中去。档案上的黑脚印，使湘华在劫难逃。高湘华生性稳重，又在少年时期即遭逢家庭变故，更为慎言慎行。右派是以“言论”论罪的，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辞”也可搜出个“词”来。高湘华不是还与个别友人通讯吗？人们窥视湘华投信入邮筒，竟利用职权开锁取信，在这封言辞谨慎的信件中，找出一句什么话，演绎成“扇风点火，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反攻倒算”的反动本质，生生将湘华打成了学生右派。是世仇份子，岂能不是 右派？而且处分从严、从重，她被开除学籍，下放劳动！她后来是如何辗转到杭郊余杭县农村劳动的，不知详情。我见到湘华时，她早结婚，生有一女。问到她丈夫，她含糊其词，说是一个做工的，没有多少文化，其余则讳莫如深。我与湘华见面多次，却始终未见过她的丈夫，好像当时不在杭州。她给我写过信，提示我谨防 一个叫王××的右派，让我千万别同情“这条冻僵了的蛇”，“它苏醒了会咬你的手”云云。这个右派曾经不择手段追求过她，当遭到拒绝时，竟写匿名信给她丈夫。湘华说，“他给我的家庭带来多大的麻烦”。似乎她的丈夫并不宽容、谅解。说明“右派”之中也有败类。她写的信可称三绝：字好、文好、意好！

湘华曾就读的杭州第二中学老校长黄怀仁，在 1957 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为杭州教育界“四大金刚”之一的大右派，1979 年落实右派政

策，黄怀仁 老当益壮，仍被重用，任命为杭州师范学院院长。他向杭州市落实政策办公室指名要了这个当年的尖子学生，为师范学院物理系教师，湘华终于因为学业有成，即使 在 20 多年的荒废后，仍然当上了大学教师。可惜的是，她算是一个具名号的“居里夫人”，而没有一个像居里一样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作为丈夫。

右派情踪（八）

（新西兰）周素子

杜高

杜高原名李小树，湖南长沙人，出身于革命家庭，其父在南京为高级干部，从事马、列哲学研究，其母亦为高干。杜高未受过高等教育，少年时在部队任通讯、文艺工作，后转业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编剧，50年代初“抗美援朝”时，被派赴朝鲜，作战地采访。所写报导，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并写有剧本多种。后由青艺调入中国戏剧家协会，为剧协剧本创作组成员，当时的创作室的领导人为贺敬之（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在“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杜高有所牵连，于1956年与鲁煤、汪明一起作为降级处理，从创作组调出，分别在戏

剧出版社、《戏剧报》、《剧本》月刊任一般编辑。在次年的“反右”斗争中，杜高复被划为 右派份子，且为“极右”，押往北大荒劳动改造。

1957 年暑假，反右斗争尚未深入到我们这些大学生身上，我还到北京度假。时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的反右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大批“丁陈反党集团”、“小家族”、诗人艾青等，举国上下同声响应。此时在剧协出版社任编辑的杜高正以“吴祖光小家族”的“骨干”受到批判、冲击。杜高与汪明被称为“小家族”的“双将”。杜高热爱戏剧，少年得志，与当时戏剧界名流吴祖光、新凤霞夫妇，过从甚密，对吴祖光口称大哥，对新凤霞口称大嫂。当时在批判“小家族”时，还涉及到 40 年代的“二流堂”，那是在抗战晚期的重庆，张光宇、张正宇昆仲与黄苗子、吴祖光一辈艺术界的朋友，自我调侃谓“不希冀上流而甘居二流称二流堂”，此时与“小家族”挂上钩，认为反党本质一脉相承。与吴祖光、新凤霞交往的青年人中，除杜高、汪明诸人外，还有从中央美术学院刚毕业的蔡亮，才 18 岁。对“小家族”的“反动言论”起而揭发，首先反戈一击的却是汪明，在剧协的一次批判会上，面对汪明揭发，杜高以拳击桌，斥为“放屁”。结果不论是汪明、杜高均 被定为极右份子，处分反而比吴祖光、丁玲等更严重。在杜高最受煎熬的时候，我正在北京，陈朗还未受到批判。有一天，陈朗陪我逛东安市场，一路吃北京的久保桃，在王府井车站候车时，杜高正在对面候车。他后来对陈朗说：“你的小爱人真好，看到你们真羡慕极了。”

“反右”斗争延续了大半年时间，在定性、处理前，上报待批的右派份子曾有数月的等待、间歇。这期间杜高与陈朗、胡忌、肖里背地里过从甚密，常在胡同里的川菜馆、前门外僻远的酒楼，陶然共醉，放浪形骸。到了1958年4月18日宣布定性处分那天，杜高、阮文涛、唐湜、戴再民，被戴上手铐由公安部门汽车押走，当夜即被投入自新路北京监狱看守所。包括陈朗在内的其他六位的定性宣布是在那天的下午（分别属“三类”、“四类”不等），暂留原工作岗位以待安置。次日，陈朗奉《戏剧论丛》编辑部之命到陶然亭北京戏校组稿（纪念程砚秋上月逝世，是年杨秋玲在毕业班，请她们几位同学谈谈对程砚秋授教《宝莲灯》“二堂舍子”的表演心得），路过其地（自新路），对着监狱的高墙，感触极深！不久，杜高等即被押往东北黑龙江省北大荒与兴凯湖畔劳动。丁玲、吴祖光也曾遣发北大荒，不过为时较短。杜高等在兴凯湖的艰苦生活和劳动强度，因未身历其境，不得其详，祇是在23年后，1979年在北京再与杜高相见时，他说起在北大荒，有次捉到几只蚱蜢，用火烤食，香美无比，高兴无任。可见当日挨饿情况了。

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处于中苏边境的兴凯湖，不宜作为政治犯服役之所，乃将他们分批转到关内农场或遣送回原籍劳动，唐湜即于此时回浙江温州。汪明回江西后在“文革”中病故。杜高初被安插在京郊大兴县团河三余村农场，直到文革中期再被遣返原籍长沙。他曾在长沙街道幻灯厂做装配工多年。

20 多年来，杜高一直未婚，至 1979 落实政策，与陈朗、张郁等由文化部从各地调回北京，参加建国 30 周年全国戏剧会演工作，共同编辑会演《会刊》。其时文联所属各协会，正在恢复机构，会演办公室并接待外地省、市剧团等，均包租旅馆、招待所。杜高、陈朗、张郁 3 人在北京早已无家，故在长达一年的会演，和后期整顿时间，一直随办公室住过 4 所招待所、旅馆，如崇文门外向阳招待所、东交民巷御河桥南口的六国饭店等。年届 50 的杜高，在会演期间，邂逅了总政歌舞团演员王芝。王芝离过婚，出身于北京平民家庭，那时杜高在《会刊》上发表戏评文章，常署“王芝”作为笔名。二幼、三幼在六国饭店见到王芝，曾称之为“杜妈”。但杜高与王芝的感情并未发展下去。

杜高早负文名，从右派过来尚未结婚，关心他的婚事者大有人在。不久，有人为他介绍了新华社副社长李某之女李欲晓。“欲晓”之名，出于毛泽东“清平乐”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句，盖其出生于 1936 年毛创作该词之年，可见其家庭的革命渊源了。据说李社长与杜高谈过一席话，意思是凭杜高才名，再加上这门亲事，将会锦上添花。人们打趣杜高被招“驸马”了。杜高婚后与老朋友们都疏远了，老朋友们也自然与他疏远了。他俩生有一女，夫人对杜高甚加管束，行动不能越雷池半步。但杜高自此仕途顺利，80 年代初，即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接着进入剧协领导层党组成员五书记之一，主管出版、各编

辑部业务。3 年一届任满 后，又出任新成立的电视协会党组书记，任第一把手。90 年代初又返剧协任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不久又任《中国戏剧》（其前身即《戏剧报》、《人民戏剧》） 主编。杜高的文艺思想偏左，他在陈朗等老友面前，不讳言在他的血液里有遗传的革命“红色”成份。在“反精神污染”的“文艺运动”中，批白桦的电影《苦恋》、解放军总政话剧团的话剧《WM》，他以“哨兵”身份站在保卫毛泽东文艺阵地前沿……。

我虽时闻杜高消息，但甚少会面。1993 年春，我在杭州，忽接杜高自北京来电话，他有一篇写当年“小家族”成员现为浙江美院教师蔡亮的文章，投寄给浙江《江南》杂志，他得知我与《江南》杂志散文编辑楼奕林友好，嘱我打听该稿刊登情况。

1992 年，杜高曾在安定门北河沿寓所，由夫人掌勺，邀饮过陈朗、林锴等。其时他们的女儿已经 12 岁了，正学习钢琴。早在杜高结褵良辰，陈朗曾作有一首“打油”七律奉贺，抄录在此，作为本文之殿：

风流曾记二流堂。一幕荒唐演大荒。

难得齐眉青玉案，无妨袒腹老新郎。

胡须染就思玄德，刀戟列来有尚香。

才子佳人都扮过，更看龙凤与呈祥。

「附」

须眉走出小儿狂——读杜高《又见昨天》

陈 朗

1998年，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出现了一部《杜高档案》，被当作“文物”出卖。结果为一位年轻学者李辉“识宝”而买走。尔后李就“档案”中所涉个别事件撰写过短文发表，引起了国中知识界的广泛注意并震惊。接着，李在征得杜高的同意后，将此《杜高档案》全文加以发表公布。此一情况，我祇是从大陆友人寄我若干就此事有所反映或抒发感想的文章剪报，略悉梗概，对“档案”内容未知其详。相隔多年之后，直到日前，方自大陆友人给我捎来了这本杜高自撰的《又见昨天》一书（200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从该书的叙述中得窥《杜高档案》中的全部底奥，更得悉杜高本人对这个“神秘又令人恐惧”，“20多年来”，“曾像巨石压迫着”，使他“生命窒息”的在今天他的态度。

这本是应付之一炬的《杜高档案》（右派“改正”时宣布运动中的材料均为“不实之词”将于销毁的），如何流落在旧货摊，虽仍是个“谜”，

且不去猜，然作为右派“个案”，它揭示出了一个知识份子如何在“运动”中遭受迫害，经受患难，灵魂被折磨、敲打的全过程，揭示出了在文艺界这个角落（从“反胡风”、“肃反”运动到“反右”运动）那批执行者的脸面。杜高的“昨天”，也是我的昨天（我与杜高同属一个单位，“档案”所呈现的那些脸面，一个个我都熟悉），也即是所有右派的昨天。不管你出自政界、学界或科技界以至属于传媒的报界，凡中“阴谋”之“标”而落难的右派，《杜高档案》无疑地有着代表性或者说是具“典型”意义，因此它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固不待言，它同时又更具有现实意义。

《杜高档案》里，汇集了自1955年5月间开始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中所制造的有关杜高的材料，和1957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反右运动”大批判组编写的《小家族集团右派罪行录》等。又从1958年4月到1969年，整整11年6个月，杜高被囚禁在各劳改农场实行强制改造的全部记录。“档案”中装有大量“反胡风”、“肃反”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对杜高的逼供纪录，他自己的检查、交代，他人的检举，相互“揭发、检举”（包括他的“揭发”他人），以及他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和写过的大字报摘录，各级领导的定罪批示，还包括被迫交出的彼此私人信件。还有，在劳改中历次的检讨、表态、改造体会，对党感恩，向伟大领袖表忠文字等等。可谓“包罗万象”。

杜高的《又见昨天》对“档案”中那些材料多有征引和选录，且加以

叙说，描述当时的情景若何。大有“现身说法”味道。特别描述了在隔离幽禁中本单位（中国戏剧家协会）“专案组”成员在深夜里对他审讯、威逼的现状，与若干的斗争场面。

在今天的年轻一代自无法得悉当年反右的实际情景，即使同时代人，见闻所及，在认知上尚有深浅之别，惟有身历其境，且遭其厄者，才会感念至深，觉得那些执行者的缺乏人性，无理性。

今天媒体报刊中偶尔刊载当年交通部职工“批判”章伯钧的那一场景，有两张照片，章氏皆坐于广座之中，其一右手加额，愁眉深锁；另一两手相掩，双眼 观鼻。广座中人个个右手捏拳高举，坐近章氏一女者左手执本子，右手略举，显然她在呼口号，群众在跟呼。虽也见“声势”，但不激烈。反右时期的斗争会，一般 皆不称“斗争”，而用“批判”二字，表示要与右派“说理”、“辩论”。

且看杜高在《又见昨天》中所描述的那次在团中央礼堂召开的以吴祖光为主角的批判会：“把吴祖光揪到台上，要他站在发言人旁边，拿出笔记本，一面接 受批判一面记录。为了方便拍电影，一束强烈的聚光灯照在他脸上，看到他汗流满面……，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在会前我拒绝了上台发言，剧协的负责人对我的表现 非常愤慨，便派了两个人看着我，要我坐在前排接受批判。汪明上了台，陶冶也上了台，突然听到叫蔡亮的名字，我抬起头，他恰好从我身边走过，我们

的目光相遇了。真没有想到，会把他从西安揪到北京！我看见他拿着发言稿的手在颤抖，还故意用稿纸挡着自己的脸，躲避摄影机镜头。我知道他这时一定很惶恐，至于他说了些什么，我竟一句也没听清楚。”“这天的批判大会，发言的人不少，惟一留在记忆里几十年都忘不掉的，是黄悌的发言。黄悌是剧本创作室的青年剧作家，政治运动的积极份子，在反胡风运动中就对我进行过无情斗争。大概是前几天批判吴祖光的会受到启发——当时有人上台发言，诬蔑吴祖光如何黄色下流，骂吴是当代西门庆，引起群众哗然——于是他尽情把我描绘成一个资产阶级恶少。不需要任何证据，他便信口开河，在上千人面前骂我如何卑劣，是玩弄女性的老手，和我有过友好交往的女青年都变成了我玩弄的对象。他的发言果然引起强烈反响，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全场人都屏息静听，还不时有啧啧惊叹。我听到坐在附近的女青年低声问：‘哪一个杜高？快指给我看！’我深深埋下头，躲避那像在动物园里观赏怪兽的惊奇目光。”

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杜高接着写道：“使我难忘的是批判会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文联大楼边道里遇见陈北鸥先生，他机警地看看四周，然后用神秘的眼神把我引进厕所，异常激动悄悄告诉我：‘周总理救了你！昨晚新闻记录片厂把影片送给周总理审查，总理看了以后说，对这些青年人，还是要以挽救为主，新闻片不要放映了。’北鸥在运动高潮中向一个右派传递政治信息，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杜高书中写到的历次斗争会，大多场合，我皆身历其境，属“阶下囚”而与会，所以读来有“亲切感”。

杜高在《又见昨天》里有大量篇幅叙述发遣北大荒后，11 年劳教中所遭屈辱和身心的摧残，以及饥饿苦况，作为囚徒，处于那个饥荒岁月，这些还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且在有些右派所写的回忆录里也有过详尽的吐露。然而较少见表述如何被打成右派，打者是如何施展其手段的。有了《杜高档案》，杜高凭藉“档案”材料，道出如何产生这些材料，和自己这个“右派”的产生。这是本书最大的特色。那些“打”杜高的“打手”，他们都是“衣冠人物”，是剧协里杜高的同事，剧本创作室中的几个头面人物，剧协秘书长、副秘书长（剧协的上层领导），再上一些的则便是文化部的几个副部长。上面转引杜高所描述在那个“批判会”中那个登台表演的青年剧作家黄悌，祇是小小的一个头目，已略见脸嘴。现在杜高于《又见昨天》中皆一一加以曝光。在大庭广众中，他们可以信口开河地编造淫污的语言加诸要被批判者，在暗室里，还有什么罪恶的语言不可以加诸你的材料中。夜审威逼，加上诱供，种种勾当，无所不用其极。

在“反右”之前的“反胡风”、“肃反”运动中，便对杜高、汪明等有了“小家族”称号，当时被置于胡风“麾下”加以打击（其时当局有意未让吴祖光浮出台面，到了“反右”运动，才归到吴祖光麾下加以再打击的）。当“反胡风”、“肃反”告结束，“曲终人散”，胡风、路翎被捕，“胡风份

子”一一被处置，受 牵连的杜高、汪明等祇被降级处分，从剧本创作室调出，杜高被安插于新成立的戏剧出版社任编辑。这当儿，剧协副秘书长孙福田告诫杜高：“党是你的母亲，肃反 运动斗争你，就像母亲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另一主要头目李之华开导杜高：“在战场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你，那颗子弹不是敌人射过来的，是自己同志的枪走 了火，你受伤了。你是掉过头来打自己的同志呢，还是继续同敌人战斗？”有一次杜高在文联大楼门口遇见剧协的老领导已调到作家协会任《文艺报》主编的张光 年，他热情地说：“对不起啰，黑夜打枪伤了自己人。给《文艺报》写文章吧！”多亲热啊！杜高说他当时确受到了感动，感到了温暖。

这一典型的“母亲打孩子”论，不知起于何时。近年，一位近百龄的所谓“汉学大师”季羨林也说过相类似的话，是说他自己的。好一个老“孩子”！但使 杜高没有料到的，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反右”运动来临，枪弹又射到了自己，执枪射弹的仍是告诫和开导过他的那些曾经“走火”的人。而且火力更为凶猛。也 在这当儿，其中一个小头目，剧本创作室成员，叫贾克，“心有灵犀一点通”，具有“阳谋”的资质，对在“肃反”中受到委屈的杜高，不时表示关怀与同情，当 1957 年春“鸣放”阶段，一再鼓励杜高将“想法和对肃反的意见”，“写一个报告，一个申诉材料”，他可以替他转送中宣部。于是杜高即写了一份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申诉书，交给了贾。贾拿到后，不但未寄出，反而到了适当时候（反右开始）交出来，成了一枚重磅炮弹，作为“攻

击肃反运动，为小家族集团翻案”的 极大罪证（这份申诉信也被摘录并附以气势汹汹的评语，放在“档案”里）。剧协的领导层孙、李，包括剧本创作室的核心人物，最突出的为赵寻、蓝光夫妇，在“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中的最积极份子，也是负责杜高的“专案”，极尽威逼的能事。杜高说，“觉得他们身上充满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 极端狂热”，“热中对于胡风文艺理论的清算”，在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他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他送进监狱。 1957 年，赵寻根据苏联童话《小苍蝇变成大象》改编成一个儿童剧，发表于他主持的《剧本》月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大鸣大放开始， 杜高和唐湜共同拟写了一张大字报《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这可惹怒了赵、蓝。起初稳忍不发。一当“鸣放”转入“反右”，二人起而猛烈反击其为胆敢报复“肃反”积极份子的“凶恶敌人”。杜高和唐湜最后被定性为“极右份子”，陷身于万劫不拔的 23 年牢狱命运，就这样被注定了。

但是，杜高说：“历史的玩笑是残酷的。”原来，在杜高、唐湜等被捕进了劳改农场后，“肃反”和“反右”的功绩未使赵寻飞黄腾达。反右运动结束不久，赵寻下放武汉，第二年“反右倾”运动，烈火烧到他头上，他的剧本《还乡记》受到公开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命运更惨，被当作叛徒、变节份子， 列为江青直接控制的“中央专案组”审查，牛棚、干校，饱尝滋味。那位贾克呢？在“文革”中，1974 年，他任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带领晋剧现代戏《三上桃 峰》进京

演出，被江青打成“反党大毒草”。有人亲见贾克遭受凶猛批斗的那个“可怕场面”。更使杜高想不到的是，在“文革”中，文化部那三位从“肃反”到“反右”一直向“小家族”进行无情斗争的副部长，也都厄运难逃：徐光霄被关进秦城监狱，陈克寒被迫跳楼致残，最不可思议的是刘芝明之死，“据说造反派把他抓起来，逼他交代‘二流堂’、‘小家族’的右派罪行，他交代不出，造反派把他当做我们的忠实包庇者，用皮带毒打他，不停虐待他，折磨他，一直到死”。

上面所说的三位副部长，当日对“小家族”事件与成员的处置定罪恶狠狠的批示，与斗争的总结报告，以及赵、蓝专案负责者对杜高威逼夜审的纪录，桩桩件件都见之于《杜高档案》。故今天杜高对那“历史玩笑”发出了历史的浩叹。

经历了“母亲打孩子”一番、再番（后者最深刻，为时 20 多年的磨难），当右派“改正”前夕，1979 年春，杜高回到北京，在陈刚陪同下他看望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极端狂热”者，负责他的“专案”，今日复成为剧协领导人的赵寻、蓝光夫妇。杜高说：“这是相隔 22 年后的重逢，大家都对那些沉重的往事避而不谈，尽管他们很客气，但多年创痛的阴影还是使彼此都不大自然。祇记得蓝光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啊！““

这是多么有趣的“孩儿话”。那年在北京，我也相遇到不止一位当年

剧协的领导。有次碰到李某（即是“肃反”运动之后对杜高说“自己同志的枪走了火”的那位），他搭讪地说：“当时以为将你们放下去，一年两年过了，会回来的，想不到竟是二十几年……”他话似未说完，欲说还罢。我笑笑，表示“领情”，也不想再听他说什么，走开了。他在“文革”中有否受厄，后来官居何职，我未曾打听。有否以“母亲”自居，我也不知。我与杜高稍有不同的是，从不把自己看成“孩子”，我不配。不过，对这些小头目，我祇是敬而或者说畏而远之。

杜高在《又见昨天》的第五章里专门一节述说“我不再是‘我’”。说他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残酷和浸透了血和泪的思想改造之后，从而失去自己，我不再是“我”，这是出自肺腑的惨痛告白。同一章里对“一个受难者的灵魂”——路翎的悼念文字中，述说路翎在平反出狱，生命临终“最后几年，很少说话，整天伏在桌上拚命写作”，“写下许多篇小说，却都未能发表，不仅因为艺术质量下降，更因为他的整个思维还束缚在他‘监狱时期’那种政治化、教条化的状态中”。从而杜高说到自己“也是许多年都摆脱不了那种囚徒的恐惧”，说他“在80年代初期所写的那些文字，和路翎那些不能发表的小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路翎死于一九九四年二月，杜高先写过悼文。上面征引的“一个受难者的灵魂”，写路翎，兼写到自己，相距已十年，这是2004年，是《杜高档案》在1998年被“挖掘”面世之后，杜高毅然地回顾了“昨天”后的更出自肺腑之言！

杜高曾说过他的血液里有红色的成份。此话固亦不虚。想来绝大多数的右派，也都不是“反党”的，多少也都遵循或企仰“社会主义”道路的。“红色成份”有纯正和邪恶之区别。现在不是许多昔日是“共产党人”的觉醒者，对此一红色政权抱决绝和持批评的态度吗？杜高今日有没有退党，我不知道（吴祖光入了党 又由胡乔木登门向其“劝退”而欣然接受，这我是知道的）。退不退党无关紧要，紧要在于纯正和邪恶之别。以杜高之正，岂能与“小苍蝇”辈同坐一条板凳！

杜高在《又见昨天》第五章里叙到，“12年的监禁虽然越来越远去的岁月”，但仍不时重现在他的噩梦中。说他在1980年春天50岁那年，在他结婚半年之后，“不知说起一件什么事”，他“大笑起来”，妻子忽然对他说“你笑了，我是第一次看见你真正的笑。”杜高说：“而这时，她却哭了……”

当我读到此处，不禁大为动容。相信别的读者尤其遭遇过相类的厄难者，都会为之洒下同声之泪！故而对杜高自说在80年代初期所写的文字（当是指“未摆脱囚徒的恐惧”的那种“政治化、教条化”的文字），也就可以理解的了。

对此，从《又见昨天》的写作和出版面世，他的直面“昨天”，可见他已彻底“摆脱了囚徒的恐惧”，完全回复到“故我”，这便是非常珍贵，值得庆贺的！

杜高原名李传惠，还有别的笔名，在《杜高档案》里记载甚详。但杜高亲口告诉过我，他原名“李小树”，却未见在“档案”里登录，未知其故。我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是在1956年，前一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杜高所经历种种，我皆未亲见。而次年“反右”期间，同难而不同“案”（他是“吴祖光小家族”的“干将”，我是“东郊反党集团”的“二军师”）。“反右”之前，与杜高关系祇是一般认识，相遇点头，未作交谈。我们之间的交往，则在“反右”高潮已过的收尾，右派们在等待“处分”阶段，即在1958年4月18日杜高入狱前的三、四个月的时间，几个右派在一起“买酒浇愁”、“放浪形骸”。一天，相约在西观音寺胡同益康川菜馆聚首，我和杜高前后先到，相约的另二人肖里和胡忌（胡非右派，乃逍遥派）未到。我和杜高遂对饮。交谈中，我说起在国立杭州艺专的同学李伏雨，是长沙人，与杜高同乡。1947、48年，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李伏雨在学生宿舍（西湖“苏白二公祠”）内，常站到桌上，高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歌》，于是李伏雨有了一个“暴风雨”的绰号（用歌中末句词）。杜高听后，竟起立与我紧紧握手。他说，李伏雨是他的启蒙师，那时他在长沙刚喜爱上文艺。并告诉我，他原名叫“李小树”。接着，我们大谈起俄罗斯文学来，谈到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谈别巧林，他又起立，与我紧紧握手。如是好几次。其狂态如此。大概在他平日的心目中我祇是爱好旧戏曲，是个“老古董”，不意竟也喜爱俄罗斯文学，觉得“相见恨晚”。那个阶段我们尚是“自由”之身，当来自上海的俞振飞和言

慧珠在京演出昆曲《牡丹亭》等，杜高也一场不落地前往观赏。祇见他坐在剧场的角落里，痴痴观赏着。他还和胡忌一起到前门外一个旅馆里拜望过俞、言呢！当日的这棵“小树”，尚不知招来之“风”竟如是之“大”，使他万劫不复 20 年！

系诗于后：

老来事业岂荒唐。一片情伤诉北荒。①

赖有爱书留昨日，②终教真话判迷阳。③

献机不比常香玉，④陈义可同吴祖光。⑤

珍重儒生肝胆在，须眉走出小儿狂。

（1）苏轼《初到黄州》诗：“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类，好竹连山觅笋香。”杜高被遣北大荒后的岁月，也大为“口”忙，曾捉来几只蚱蜢，用火烤来，赞为最佳美食。又有“两个窝窝头”事件，自己检讨不止，且被斗争不止。均见之于《又见昨天》描述。

（2）爰书，纪录囚犯口供的文书。见《史记·张汤传》。

（3）《庄子》：“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注》：“荆楚百草丛生修条野人呼迷阳，其肤多刺。”这里同时借喻“迷失”于“阳谋”也。

(4) “抗美援朝”时，豫剧名演员常香玉义演筹资“捐献飞机”一架，享有“爱国艺人”称号。杜高、汪明、路翎等均曾入朝，深入前线采访，写有相关 的剧本和文章。也就在这时，有人诬告杜高在朝行为不端，已作为后日“反胡风”、“肃反”运动被卷入的先声。杜高在《又见昨天》中对此多有叙述。所惜未对此 场“战争”的性质作有正确评论，似尚未脱“孩儿”身份。

(5) 吴祖光的名字，是与杜高“整个青春岁月的政治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杜高自语）的。吴祖光的鲜明性在于，接受“劝退”，后凡参与什么集会（不管是关于国事的社会的和文艺的），他的发言都代表着正义、良知呼声。他语言中凡涉毛皆直称之“毛贼”。

2007 年 7 月 16 日

右派情踪（九）

（新西兰）周素子

俞绂棠

1951 年我入读杭州师范学校音乐科，校舍座落在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旁，原膺白路（现称南山路上），在清波门与闹市口之间。当时校舍还未 扩展，祇有一座二层的“雄狮楼”为主体，教室全部集中于此，此外还有一些附带建筑，作为教师办公及学生宿舍之用。饭厅极为简陋，是个临时性的大竹篷（现整个地区属中国美术学院）。

杭州师范学校历史悠久，与浙江第一中学齐名，是出名师、高徒的所在。在我入学时，教师阵容仍很可观，如历史老师张同光（后死于文革），音乐教育家 顾西林（献身音乐事业，终身未嫁，在“文革”中被迫害惨死），地理教育家劳天恩（右派份子，“文革”初期跳楼自杀），语文教师关非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80 年代初“改正”后任杭州教育学院教授），政治教师潘绍光（共产党员，后任第一中学校长，“文革”中被揪斗，自杀身亡），语文教师宋清如（丈夫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最为优美、传神者），画家周天初（刘海粟老友，侥幸死于“文革”前）……。

我们这个音乐班，是杭州师范空前招收的第一班，原先有学生 26 名，后与萧山湘湖师范合并增至 30 多名学生。音乐专业老师即有俞绂堂、顾西林、黄永、丁兰纫、沈同德等等，都属一代有名望的音乐教育家。

音乐班的班主任为俞绂棠老师，浙江新昌人，从少年时代起，即在上海学习音乐，他的老师刘质平，是李叔同（弘一法师）学生丰子恺的学生，所以俞绂棠是李叔同的传人。少年俞绂棠就曾为李叔同的歌词谱曲、谱和声而得过师公李叔同的表扬。俞绂棠老师任教我们音乐科的音乐史论课、和声学、对位法，并兼授钢琴课、合唱课。那时已40多岁，非常注重仪表，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他性格内向，语气和缓，任教我班3年，从未见严词厉色。杜念杭为其少年时期音乐学校同学（她父亲为国民党要员杜某，还是我父亲在40年代抗战时期在安徽时的上司，并未出走台湾，记得50年代初，我曾随父亲到杭州凤山门火葬场看过他的骨灰盒）。时亦在杭州一所中学任音乐教师。她与俞老师已有四个孩子，全家都住在我校的教师宿舍里。杜夫人与我们班学生并不太熟，大约她一回家就忙于家务了。夫人衣着朴素，其貌不扬，她的音乐修养程度，我们也不得而知。

我在杭州师范音乐科毕业后，再考入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那时称福建音专），继续学习音乐，与中学时代的师友就逐渐阕隔了。特别于57年反右斗争中我被划为右派学生，更与老师们音讯不通。一直等到70年代初期，我自西北南返，则陆续听到中学时代好些师友的悲惨遭遇，如70多岁的顾西林老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仍在关押隔离和卧病中，头发被剃成阴阳头，受尽凌辱。我曾约会沈培堂同学去看她，结果不得相见。至于班主任俞绂棠老师，先被打成“胡风份子”，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份子，处分甚重，开除公职，押送宁

波盐场劳动。晒盐是很苦的活，让一个音乐家去干，而且一干就是7年，真不堪设想！他终因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物质生活，与残酷的政治压力而导致精神失常，由亲属保释回新昌老家养病、务农。夫人杜念杭还带着四个孩子，仍挣扎在杭城教育界，她是如何承受杜家与俞家的双重政治压力，就不得而知了。这一切我祇是听闻。直到20多年以后的80年代初，我才又在杭城见到了俞老师，他苟活到落实右派政策的“改正”，但已到了退休年龄，浙江省音乐家协会聘他任《浙江音乐》编辑，并撰写部分浙江音乐史。此时俞老师年已近70，垂垂老矣，体态龙钟，无复当年神采，本来不善言谈，劫后余生，变得更为沉默了。但他挚爱学生的心，仍然不变。当年杭州师范音乐科的同学，为庆幸俞老师的健在，以俞老师为核心，召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在前后10年内，直到俞老师于1992年去世止，我们共聚会了4次。同学们远从福建、湖南，近从宁波、金华、建德、湖州等处准时来杭，每次聚会都组织周密，占2、3天的时间，安排有序。当年的青年学子，此时也都属50多岁的人了，有的已有孩子的孩子了，但在老师面前，我们还是孩子。每次拍照留念，俞老师、杜夫人都会说“男孩子到这边”，“女孩子去那边”，多少的人生磨难，在这“孩子”的称呼中，都洗刷了、纯净了。每次聚会都有杜念杭夫人参加，陪侍着俞老师，在这一对“白发翁媪”身旁，我们都仿佛回到16、7岁的少年无忧时代，所有的颠沛流离，各人程度不同的遭遇、苦难，都淡化了……。

末次聚会是在 1991 年，地址是母校新校址，结合顾西林先生的逝世纪念日，我们的同学们又从全国各地赶来。俞老师已经不能走路了，他自己为这次聚会特地买了一辆轮椅，由杜夫人推着前来。次年，我们这位少年时代的音乐教师即与世长逝了，杜夫人一直体贴入微的照顾他，在风雨飘摇中伴随他走完人生道路。在我们这 30 多位学生中，有一个东阳人陈崇仁，他对老师的由衷热爱，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校读书时，陈崇仁是个极为平常的学生，俞老师并没有给他过多的关注，但当俞老师罹难发配盐场时，他却一直关注老师，他在自己微薄的工资中节省下一些钱，不时购买食品为老师寄去。他怕老师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淡忘终身爱好的音乐，从而失去精神寄托，时时向老师提出一些音乐理论，向老师请教，老师在困境中仍对他作书面教导。在俞老师因病返新昌老家时，他专程前往看望。祇有乌鸦的反哺精神能与他相比！当杜夫人把这段情节讲给同学们聆听时，大家都哭了。我们的每次同学会，都由林光璇执笔、编纂，都留有详细的记录，其中有关陈崇仁的事迹纪录特为详尽。俞老师磨难一生，可安慰的是有一个安宁的晚年，与夫人为他支撑的可爱的家庭。老师的 4 个孩子，大儿子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吹黑管，小女儿弹钢琴，现在深圳工作。

来纽后，我收到同学吕英的一封信，她说《俞绂棠创作乐曲集》即将问世。我相信，这其中还倾注有杜念杭夫人的心血。

赵德煌

赵德煌老师是我就读杭州音乐师范科时的教育学老师。他那时刚从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在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前，浙大为综合性大学），很年轻，比我们这些中学生年长不了多少。他是道地的杭州人，中等身材，高度近视眼，唇红齿白，服装整洁，还尚未摆脱大学生习气。音乐科的课程，除音乐专科必修课外，尚有史地、语文、教育学等副课。赵老师是我班最年轻的老师，没有老师架子，和学生关系好像同室好友，考试时都给学生高分。他还跟顾西林老师学吹笛子，可他没有一点音乐天赋，吹不响笛子。顾西林对他说，祇要能吹出声音，等于学会了一半！我们在校园里见到他时，他总是满面笑容，手里总拿着一根笛子。

当时的赵老师爱上了我班的钮和珍同学，钮和珍为湖州人，有圆圆红润的苹果脸。我班30多名同学，分4个小组，她是其中一组的组长，我正在她的属下。钮和珍不很聪明，但实心眼，当小组长认真负责，像煞有介事，常常一脸严肃。当时还另有一个她的同乡，也是浙大学生在追求她，而她觉得恋爱不是一个好学生所应该尝试的，她把包括赵老师这两位追求者都拒绝了。此位钮和珍，学校毕业后，要至30年后1986年我们在杭举行的第二次同学会上，我才再见到她。

才知道她的婚姻很不幸，她毕业后分配到嘉兴市工作，被当时一个她的上级领导，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南下干部谋算、占有了。夫妻之间谈不上感情和共同语言，这位干部又在“文革”中受冲击，辗转下放到嘉兴市下属新市镇乡间，她也受牵连举家到乡下，很不得志。在同学会上，各人诉说别后 30 年情况，她曾痛哭失声，悲不自胜。后来听赵老师说，那次她曾私访过赵老师，至于说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她是在留恋过去那段无邪的感情？其实当她在为婚姻、家庭种种遭遇而痛哭流涕的时候，我们私下议论，如果她当时与赵老师结合该多好，尽管也许会受苦，但毕竟会互相爱惜、扶持的。

50 年代，在我们毕业离校后，赵德煌老师接着高升，当上了杭州幼儿师范校长了，春风得意，与一个该校毕业生，校花级的美女结了婚。但好景不长，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赵德煌老师被打成右派份子，处分较重，丢了教职，且很快的，美女与他离了婚，琵琶别抱了。当我于 70 年代初从西北返杭时，听人说起，有人见到赵老师在城内众安桥一家裁缝小铺里踏缝纫机。我和张冰如到众安桥一带寻找过他，没有见到，也不知居住何处。约在 1974 年，我在杭郊留下一家农村代销店谋生，一天在店铺后整理杂物，满手污垢，有人来告诉我说有人找我，跑出去一看，认出是赵老师，他从余杭青山水库打工回杭，曾听别人说我在留下，特于中途下车看我，竟被他找到了。足足有 30 年不见赵老师了。我心目中的赵老师，还留着那个初出浙大，穿着白衬衫，手上拿一根笛子，具大学生风度的白面书生形象；

而眼前这个中年男子，穿着邋遢的工人服，苍老、肮脏、猥琐，胡子拉碴的，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影子，祇是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依然如昔。30 年的风雨飘摇，少年时期的师生两人，如此狼狈的相逢在破烂的小商铺里，真是出乎意料。从这次相见后，我和赵老师有了来往。他住在庆春街上八界巷一个年久失修、住户甚多的木屋楼上，已另组了一个家庭，夫人不知其姓，祇知芳名叫德玲，是一位有高中文化的织布厂女工，她已与赵老师生有一子，名叫赵斌，已有 10 多岁了。德玲是赵老师的同巷邻居，离过婚，她常见到赵老师，肩不能挑而挑，手不能提而提，由同情、怜悯到产生爱心，到毅然不顾政治压力与他结婚，这就很不简单了。我见到德玲时，她已 50 出头年纪，身材略瘦，憔悴中仍能见出当年清俊，面黄略有雀斑，干事精练，能言快语，她相夫教子，还烧得一手好菜。我和冰如不时到她家，每去德玲必留饭。茶余饭后回顾往事，不胜慨叹！3、5 年后，已到 70 年代末落实右派政策时期，赵老师最先获得落实，被安排在杭州师范学院教育系任教，兼图书馆馆长，还侥幸领得一笔补助金（这是极少数的右派所享受到的，后虽有补发薪金之说，但如石沉大海）。赵老师为了庆祝“落实”，邀我和冰如于 1980 年 2 月某日、阴历大年初一先到孤山西冷印社四照阁品茶，然后再到他家便饭。这又是一个终身难忘的大年初一。孤山在西湖中，从西冷桥和白堤与岸上相连接。四照阁建于南向悬崖之上，四面轩窗，能见西湖全景及群山耸翠。那日清晨，赵老师约我和冰如品茗于此，适逢雪后晴天，万山皆白，唯西湖深绿，天寒地冻，山径中唯留我等三人雪痕。再没有一个游人，

四照阁中，三人相对，侍者殷勤，茶后，依前踏雪，经白堤归上八界巷，德玲夫人已设盛宴以待，深巷旧木屋楼上，赵老师夫妻患难之情，劫后余生，师生之情，融融然快慰平生！

接着赵老师一家搬到了沈塘桥白荡海杭州师范学院宿舍，为三居室套房，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德玲慧眼，总算得到了回报。祇要我们前去，德玲总以地道可口之饭菜相款。赵老师书房书香充盈，他俨然教授风度，服装整洁，脸色也滋润了。

关非蒙

关非蒙是我 50 年代初期在杭州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他教语文课，但不教我们班，却教过我们音乐班的打击乐器课，虽不是正课，也算是直接教过我的老师。

他为河南一带中原人士，读的是南方某大学，所以从青年时代起，即在南方工作、生活。当时的杭州师范学校，约有老师 2、30 位，关非蒙还不到 30 岁，属于青年老师。他五官端正、明朗，留有八字胡，甚注重衣着的整齐、入时，文采奕奕，风度潇洒，是个美男子。但生性冷漠，略显傲慢，和学生的关系既不严肃，也不亲善，学生们都

甚惧怕他。杭州师范的单身教师，一般都住在校内，他和我班语文老师桑雅忠同住一个楼，毗邻而居。我在校3年，祇在毕业班时，到过他的宿舍一次。那天，他甚有兴致的教我打桥牌，还说了些桥牌的妙趣，可惜我对此毫无兴趣，过后也没有再染指。

我当时就读的杭州师范音乐科，除音乐专业课、文化课外，还有几门很特殊的课程，例如舞蹈基本课和民俗打击乐器课。打击乐原属民间乐器，纯粹的节奏组合，一般用于戏曲表演，至如昆曲等典雅戏剧，虽以笛为主要伴奏，但鼓板、小锣等亦很重要。我小时候生活在浙江温台乡下，凡婚礼、喜筵就是用打击乐、唢呐等热闹乐器迎送宾客的。每逢节日舞龙灯、迎神等活动，就纯用打击乐器了。

打击乐声音响亮，上课不须用课桌、黑板，课堂就设在学校大礼堂内大讲台兼舞台的南边侧室（有时用作化妆室）内。此处远离教室、办公室，铿锵喧闹之声不致打搅课堂的宁静。教我们学习打击乐器的先是特聘自省京剧团乐队的鼓板师。鼓板师是乐队的领班，具有西洋乐队指挥的地位，在乐队中享有威信，必须技艺精湛，声威并佳。有一则历史故事更提高了鼓板师在乐队中的地位，使鼓板师在乐队、戏院、戏班中具有神祇似的形象——唐朝风流天子唐玄宗，他那位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深谙音乐，能自制“霓裳羽衣曲”，玄宗且喜爱戏曲表演，他是后世专以用来指戏曲的“梨园”的创办人。他在伴奏乐队中亲执鼓板，以九五帝王之尊去作艺人的行当，就被艺人视

为无上恩宠和荣光，因而被梨园尊为保护神了。我小时候在温台乡间，就见到戏班子后台神龛中所供奉的穿戴皇帝冠冕、袈裟的唐玄宗像。当时的省京剧团鼓板师，来教我们这班少年学子，他穿对襟中装，平头，布鞋，中等偏矮个子，略肥，大黑圆脸，门牙略露。这副模样在师范学校师生中显得极为突出，他从不跟人说话，课时径来“教室”，上课时学生对他也没有“起立、敬礼”的尊师形式。他在京剧团乐队中自然颇具威望，但现在面对的这班 17、8 岁年纪，朦朦胧胧、似懂非懂、莫明其妙的一群人，他们崇尚贝多芬、莫扎特，他们向往奏鸣曲、交响乐、提琴、钢琴等等，他们满脑子的崇洋厚古，宗雅排俗，如何欣赏得了粗犷、原始的打击乐器？又如何能听令一个艺人鼓板师的教调？打击乐一周占一个下午，我班 30 多个同学各司其职，或磬，或钹，或鼓，或三角铁不等。我从一开始即被分配为打小锣，以左手中指勾锣边缘，右手执厚竹片，以侧面摆击锣心。大家既对老师不恭，又不用功，学打了半年，竟连一首节奏最简单的起步曲子也没学会。鼓板师背地对别人讲过，他没见过这样不用心的学生，若是京剧团的学徒，他早打人了。他终于愤而辞职了。于是我们这节课竟由本校语文老师关非蒙兼任才得以继续下去！关非蒙平日爱看京剧，且能唱，但还会打鼓板，竟以此执教，却是始料所不及。关老师坐镇课堂，手执鼓板，略申大意，一脸认真。大家不敢怠慢，像关老师这么高尚、深邃的知识份子，尚喜爱打击乐，可见打击乐的不同凡俗了。于是用不了多少时候，这台老生亮相的台步节奏就学会了。关老师轻击鼓板指挥乐队，于是众人齐奏“匡起，台起，匡起，台

起……”，居然铿锵有序，节奏分明，声闻遐迩……。

关非蒙既非中共党员，也非中共地下外围者，但他在 40 年代大学生时代因参加学生运动曾被国民党拘捕过，关过上饶集中营。假释后，曾在杭州教会学校 弘道女中教过书，传说有一段浪漫的师生恋。究竟他在集中营受过什么刑罚，他如何被释放的，女中的美女是谁？由于他沉默内向的性格，倜傥的外表，使他蒙上 传奇的神秘色彩。关非蒙善书法，但在 3 年师生期间，我从没有机会见他临池挥洒，也没有见过他的字体，直到 80 年代后，生还杭州，在他任教杭州大学时，曾主动送我一张直书横幅，写的是一首宋词，字体似《泮泉铭》，署名“穆门”，不知是何出处。

在杭州师范毕业班时，温习毕业考试阶段，关非蒙和我班女生、我的挚友张冰如有过热烈而短暂的爱情。到冰如分配嘉兴任职后，关老师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这段感情就中止了。在我们毕业星散后，关非蒙自杭州师范调到了《当代日报》任编辑。第二年暑假，冰如自嘉兴返杭，一个傍晚，我们偶然走过清吟巷《当代日报》社门前，随即想起应该看看关老师，他居然没有外出，于是相约走上白堤，在锦带桥畔的花亭里，坐看西湖景色，他又对冰如十分热情。但是一宵相聚，分别后，又再无音讯。不久，他从《当代日报》调到浙江师范学院任教职。令人不解的是，冰如对他始终敬仰，一生都无怨怼，在他老迈的退休岁月里，冰如还常约我去 看望他哩，那是后话！

浙江师范学院前身为之江大学，校址座落在杭州钱塘江六和塔畔的月轮山上，之江大学原为教会大学，以外文著名，莎士比亚剧作翻译大家朱生豪在抗战期间即就读该校。50年代中期，改之江大学为浙江师范学院，全国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改为纯粹的工科大学，将原文学院一部份拼入浙师院，一部份拼入新成立的杭州大学中文系。一代名教授夏承焘，先期亦曾居月轮山之江大学、浙师院，著述甚丰，后与陆维钊、姜亮夫最终受聘于道古桥的杭州大学中文系。80年代末夏承焘居北京朝阳门内，曾惠寄《天风阁诗集》与我。我有诗致谢曰：

月轮山色梦非遥。胜景都遗道古桥。

昨夜天风曾我顾，何时随看浙江潮。

诗中月轮山即指之江大学、浙师院，道古桥指杭州大学。接着杭州师范学院成立，于是浙江师范学院遂迁往浙西重镇金华市，各地名家，名教授如后在东北工作的乐清吴天五，在《当代日报》的关非蒙等均云集金华市了。

金华位于钱塘江中游，浙赣铁路线上，北邻李笠翁芥子园旧址兰溪县，扼水陆交通要道，是中原通八闽、两广的重地，明时戚继光、胡宗宪均曾镇守于此，有南朝遗迹八咏楼、双溪、双龙洞等胜处，宋室南迁时，此地为大后方，历城李清照避金兵南下居此，她的“唯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即写于此。岳珂、陈亮、陆游、辛弃疾等，都曾寓迹于此。早在东晋、吴越、南宋时，文化南迁，金华早是名家游弋之地，金华市的文化曾经达到高潮。然近代以来，金华文化渐趋没落，竟无一所高等学府，浙江师范学院的内迁，将为金华市的文化推波助澜！关非蒙受聘于金华市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应该是一生教育生涯的最得意之时！30多岁的壮龄，正可一展怀抱了。他在此时结婚，夫人姓戚，据后来桑雅忠老师告知，她出身名门，为文学世家，并谈及夫人对关非蒙管束甚严，而关非蒙亦一改平日闲云野鹤情性，心甘情愿服其约束。在金华烂柯山下，夜灯隐约，关非蒙漂泊的一生有了归宿，他息交游，准备著述南窗了。可是命运十分调侃人，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了右派！一似月色荷塘中突投以巨石了。打成右派后的具体处分，发配何方劳动改造，吃过何等苦头等，我在北方，均不得而知，仅知脱离了教职。所幸者，戚夫人不但没有离弃他，还含辛茹苦独力教养二子。戚夫人是习外文的，在80年代初，她终于以其自身实力调入杭州大学外文系任教职，然后再奔走努力，将得以右派改正的关非蒙亦调至杭州大学外文系任汉语老师。关非蒙在杭大外语系曾开设戏剧知识讲座，我曾专程去听讲，此时才得亲聆老师授课，可见关非蒙爱戏剧之心始终不变。

关非蒙住杭大道古桥宿舍，与外界甚少交往，杭州的故友旧交，惮于戚夫人家威，亦很少到其府上叙旧。约在 80 年代末，我和张冰如在节日拜师时，曾去过他的道古桥寓舍，书屋甚是光洁明亮，图书插架，字画琳琅。关老师已是头发花白，体态略显福态了。他见到老学生很高兴，说了些今后著述课题，内有关《水浒》的研究。80 年代初，陈朗住北京和平里，执编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论丛》季刊，关非蒙有戏剧理论大作见寄，可见他在待罪的 20 多年中仍然钟情戏剧，笔耕不止。偶然见到过戚夫人，她表情淡漠，没有女主人的热情，能见出即使年轻时也不美丽。约在 1992 年春节，我与冰如去拜师时，关老师曾嘱托请我哥昌米为他画一幅双鹿图，我哥善画牛，未尝画鹿，时至今日尚未完成使命，于心甚为不安。然“双鹿”本意何在，不得而知。

“右派情踪”（十）

（新西兰）周素子

桑雅忠

50 年代初，我在杭州师范音乐科读书时，桑雅忠老师教了我们班 3

年语文课。在一年级的第一学期里，不到半年时间，就曾换过3个语文老师，第3个才是桑雅忠。第一位周老先生，像是从私塾古文教师过来，齿豁牙落，口齿不清，又不会教新书，也驾驭不了这批学音乐的16、7岁调皮学生，大家不听老先生的话，课堂上吵得要命。不久离去，换了一位女教师，乃是《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大家朱生豪的夫人宋清如。宋老师那时才30多岁，但已作寡妇，带着一个男孩子。她身材矮小，面目清丽，自然卷发，病态，说话稍有口吃，讲课也不生动，学生不买她的账，我却私心爱戴她。我读过她为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所写的长序。她在序言中记述与朱生豪在之江大学同学时情况——记述朱生豪的聪慧勤奋，翻译莎氏巨著的艰辛；记述她俩的恋爱、抗日战争中简约的婚礼，以及悲悼朱生豪的肺病与早逝！宋清如老师对我也特别青睐，送过我一套精装的朱生豪翻译的莎氏全集。但她不久也离去。离校后我始终再未见到她，直到70年代文革后期，才听说她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她在结婚时嘉兴的娘家有土地陪嫁，尽管这些土地早在土改时已被充公没收，与她无关了，她却仍被作为“地主”，批斗了一阵。第3位来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便是桑雅忠。桑老师年轻有朝气，既严肃又从容，身材颇长，戴金丝边眼镜。给我们讲叶圣陶《记金华的两个岩洞》、茅盾的《白杨树》、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契诃夫的《给爷爷写信》、巴甫连珂的《桃色的云》、高尔基的《母亲》等。他结合语法，告诉我们“词汇”与“短语”的分别，正确标点的使用，各类文体的写作方法以及文艺理论、文学史等。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热爱桑老师。语文课

是每天都有的，桑老师和我们在一起将近 3 个年头。他让我们每周写一篇作文，篇篇细读精改，还加评语，一丝不苟。桑老师衣着朴实，夏日衬衫西裤，冬日灰色中山装，永远理一个平顶发型。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夫人梅爱文。梅爱文衣着时髦，标新立异，与 50 年代的朴实风尚大异其趣。她细皮白肉，明艳照人。梅爱文在邮电部门任职，虽然桑老师住在校内教师宿舍内，但她并不天天回家，我们不是常常能见到她的。她飘然来去，从不理会我们这些学生。桑老师对她宠爱有加。有一次，是考试的前一天晚自修时，我和张冰如到桑老师宿舍，请教几个问题，推开门，台灯亮着，老师不在，我俩就坐在他案前等候。此时却听见了扣门声，忽见梅爱文从门外跳跃进来，像一只花蝴蝶，看得出她特意修饰过，她是要让桑老师吃一惊的，却不料让两个女学生窥见了秘密。我俩不识趣，不知回避，想直等到桑老师回来。桑老师回来后，一反往常的和蔼情态，竟让我们回教室去，谓有什么问题明日再说。

若干年后，我才在我姐姐周素琛、长辈曹湘渠先生处得知他俩的一些情况：梅爱文浙江温州人，父亲梅某为温州巨富，抗日战争时沦为汉奸，当时的青年学子抗日热情高涨，梅爱文着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打倒汉奸爸爸”，一时被青年学生推为偶像。她离家出走，跟随舅父、温州著名学人、书法家和古琴家马公愚，到了后方山区龙游、开化一带，当时浙江各大专学校以及《东南日报》等文化机构，均避迁于此。桑雅忠就读的英士大学，亦迁于此。此时从桂林前线返回的

曹湘渠先生正任《东南日报》副刊主编，后方的一批文学青年都围绕在曹湘渠身边，他们除撰写抗日的文章外，还探讨托尔斯泰《安娜》、屠格涅夫《罗亭》、《猎人日记》、纪德《窄门》、王尔德《快乐王子》等著作。梅爱文与桑雅忠后来即由曹湘渠作冰人，结为秦晋之好。相逢于患难，情感的诚笃自不在话下。祇是桑雅忠为宁波象山一带平民百姓家的孩子，而梅爱文则出身于书香世家，若不是抗战的烽火，他俩是难能成其夫妇的。

我毕业离校后，直等到 70 年代晚期，才再见到桑老师。他的被打成右派，则在运动告一段落后即听说了的。而梅爱文则在离校两年后偶然地曾见到过她。那是一个夏日，在上海瑞金路上，见她独自坐在三轮车上疾驰而过，头发梳成双髻，像白雪公主一样高贵，即使在上海这个摩登的所在，梅爱文还是显得突出地时髦！

1976 年，我流落在杭郊留下村店做工，得知桑老师住在武林门附近桃花新村宿舍里，就去拜访了他。廿多年相隔，廿多年的右派生涯，桑老师已是两鬓斑白了，他曾下乡若干年，当时正在杭城一个初中任教。至于当年那个风流娇好的梅爱文，却出乎意料的衰老了，头发花白，满脸皱纹，完全是个小老太婆样子，穿着也甚朴素，几乎辨别不出当年翩若惊鸿的影子。这廿多年的折磨、烦心，极其深刻的镌刻在她的容貌上。她能够几十年如一日，跟随着桑老师在风雨如磐当中度过了精神、物质双重压力的日子，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他俩

没有孩子，领养了一个孩子，起名“桑子”，多好听，多有意义的名字！桑子高中毕业后，未能考入大学，就在他妈妈的邮电部门当了一名邮递员。那日我到他家，他妈妈正为他做饭，说桑子送信非常劳累！

1979 年落实右派政策，桑雅忠受聘为杭州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当时各机关业余大学应运而生，桑老师被各大专院校争聘，讲授文学概论，写作等课，以条理清晰著称，成为一代名教师。在我将去国来纽前夕，曾见过桑老师，满头白发，仍然平顶发型，与梅爱文仍然形影不离。

王绍舜、曹湘渠

约在 1974 年与曹湘渠先生相识，我刚入住杭州武林村阁楼不久，他是我阁楼紧邻、乡前辈、初中时老师王绍舜的常客。

这类带阁楼的房子是杭州市 30 年代很富时代特色的民居建筑，由成排成片风格一致的一些房子组成“里”、“弄”；若干“里弄”合称“村”，如“未央村”、“慧宜村”。最初整个“村”或即属一个主人。当时我所住称“武林村 2 弄 6 号”，一个单元一个号，前后大门框，都是以条石砌成，俗称“墙门”（即在上海称为“石库门”者）。砖墙、瓦顶、木结构，

一般都是二层楼，其上带有存放什物的阁楼。前有大天井，栽花种树，经前厅可上楼梯。但习惯都走后门，进门即厨房，边旁有供厨房应用装有水龙头的后天井。后厅暗间为楼梯所在，盘旋先经亭子间（厨房顶部），然后二楼（主间），再上去便为阁楼存杂物处。阁楼有窗取光，开于屋顶坡面，称“老虎窗”。阁楼内大部分空间，人不能直立，匍匐而行，而且冬寒冷、夏酷热。原先一个墙门祇一户人家，随着人口增多，城市“贱民”也剧增，此类阁楼方充为住室，若能获住还是大幸的！

1974 年前后，我尚在杭郊谋生，为了孩子入学，经过一些周折，幸而入住阁楼。我所住的“武林村 2 弄 6 号”，一个“墙门”里，竟住有 7 户人家，计 23 人。苏联画家库克雷尼克赛画有“猎人的手套”一幅，手套大指内还住一只兔子，还开有“老虎窗”哩！我和 3 个孩子在这个阁楼里，整整住了 15 年，她们在这里“匍匐”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光以用水而言，老水管年久失修，一线如丝，7 户共用，我们要在后半夜二时方能接水，接一小桶水要费 10 分钟时间，再提上阁楼。前天井有一棵梓树，枝叶丰茂，展放至老虎窗外，夜来听雨，颇饶风趣。不少名家先后作过我阁楼的客人，如当代书法家沙孟海；戏剧理论家胡忌、洛地、徐步奎；画家金冶、吴山明；来自北京的昆曲家周铨庵和杭州的曲友；更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也为曲家）。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诗人王翼奇君，他还为一次阁楼雅集利用亭子间顶部大阳台（居然有琴、诗、画、曲雅集）写过古风长篇以歌咏之，

是日到会嘉宾竟有 310 余人，真正为“螺蛳壳里做道场”。这些雅聚，大多在右派“改正”前后数年间。

阁楼分左右两间，东边一间住王绍舜先生。我所住西边一间，通楼梯，又隔去一个通向东边一间的过道，成拐角形，能置一床、一桌。我和王绍舜先生都属 阶级敌人范畴，除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有时来人寻事外，来者都是朋友。我每周从杭郊回阁楼一次，3 个女儿皆幼小，忍受着蒸暑严寒与人为的歧视，饱暖无常。在 那无风三尺浪的年月里，每当我走上阁楼，临近房门时，王绍舜先生听见了，会用微弱的声音道：“你上了阁楼，就安全了！”

王绍舜，又名文清，浙江温岭人，早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与陈朗为同乡并同学），后任教故里。50 年代他因为写有《晴雯之死》、《柜台》等剧本，由省文化局调他到杭州省城专事修改，因剧本演出成功，曾风光过一段时间，但接着 1957 年反右，他虽没被打成右派，但在 195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清出了文 化局。从此病卧阁楼，没有生活来源，由他的亲妹在家乡以当保姆收入接济他每月若干元生活费，他自己则在街道再做些糊火柴盒、纸袋等活，每月可收入 4、5 元 人民币，以贴补生活，勉强挣扎于社会最底层。早先我曾在温岭简师读过书，他还是我的音乐老师，那时他即患肺病，消瘦、苍白，曾让我在《黄河大合唱》中担任 朗诵角色：“朋友，你记得黄河吗？你到过黄河吗？”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廿多年后，我和绍舜先生竟然落魄

同住一个阁楼上，声息相闻，患难与共！先生时时咳血，凡不得已须下楼，则喘息、停顿再三；遇病危，我奉侍之；数次病危就医，均由我背负下楼。1982年先生垂危归里前夕，对我说：10年相依，素子待我如此，死而无恨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谁能得知阁楼之上，竟有人潦倒如此！绍舜先生精于七弦琴，与琴棋相依，终身未有室家。每当夜深，焚炉抚弦（古琴为室内乐，声不达于户外）。他于琴曲有独到见解，曾将胡笳10八拍辞，以10年之功，配入古琴胡笳10八拍曲。一日，雪满杭城，夜阑人静，我曾依辞为之试唱，正是“几遍胡笳声欲裂，人间始信有真情”。先生虽落魄，却时有高人来访。“文革”前，北京古琴家查阜西曾与之鱼雁往返。在杭城，有曾与鲁迅为朋友，其时亦衰病的许钦文，和当年《语丝》编辑，其时亦以糊纸袋为生的苇丛芜等常相往来。但对他帮助最大，时时接济他的则是曹湘渠先生。

曹湘渠时来阁楼。他是老右派，自然的他同情我这个小右派，我与他亦成了忘年之交。

曹湘渠，浙江黄岩人，幼年丧父，由寡母以针黹收入抚养成人，少年时期即被送往临海海门某商号为学徒，少年老成，克勤克俭，账房先生怜其幼年失学，教以习字、珠算。数年后，抗日烽火升起，曹湘渠所事东家有二位在学小姐，思想激烈，投笔从戎，并鼓动家中学徒曹湘渠参与抗战，于是同赴桂林。二位小姐不堪战地艰苦，半途

而废，而曹湘渠则始终如一，在前线结识了邵荃麟，并得其栽培，加上自身的勤勉，终于成为一名称职的战地记者。不料故乡老母思儿心切，谎称病危。曹湘渠既返故里，奉母命与幼年订婚的福英女士结婚，遂任教于台州各中学。他以思想进步，博学多闻著称，温台一带青年学子奉为偶像。王绍舜当时正属青年，曾步行数10华里往谒曹先生。两年之后，福英病死，曹先生有《哭福英》长诗载于报章，一时读者争相传抄，洛阳纸贵。接着先生受聘于《东南日报》副刊主编，因避寇，报社迁社址于浙东南龙泉山区，当时多所大专院校亦均避寇在此一带，先生遂为青年所敬仰，在当地形成新文艺新思潮中心。曹湘渠此时与小学教师林女士结婚，夫妇双双加入了地下共产党，故50年代共产党执政后，曹氏因其出身并经历，得以被重用，擢升为浙江省工会主席。反右运动开始，即受数10年交往的邵荃麟右派案牵连，遂被划为右派，于是上山下乡，降级降薪。“文革”中林夫人又受党内审查，因她曾与组织失去过联系，有一段说不清的历史，大受折磨。曹氏长子因家庭变故，虽成绩优秀亦不能入大学，当他参加宝石山修建防空洞之役，因山体塌方被压而死。虽然曹湘渠一家有诸多不幸，但他仍然热诚待人，到落实右派政策时，曹湘渠已年过60，被任命为省政协秘书长，属下有省文史馆，他即以王绍舜的古琴成就，聘之为文史馆员，既有固定工薪，复有医疗保障，使王绍舜脱离苦难，免于冻馁之虑，可全心致力于古琴的探讨。祇是可惜，绍舜先生次年即病死故里。但此前中央电台曾派人来杭录制了他的古琴曲“胡笳10八拍”演奏，作为保留节目，曹湘渠使王绍舜成为死后的方干。

湘渠先生在我落实政策时，亦曾得其谆谆教导，关怀备至，使我得以不失时机，尽快走上工作岗位。当省文史馆征集史料时，他让我撰写黄宾虹、陈伯衡、钱士菁等学者的材料，藉见其对后进的鼓励。他的办事精神是深思熟虑，但谨小慎微；他的为人作风是救厄扶危，真诚相助。我来组前数年，曹氏夫妇均已退休在家，我时往探访。林夫人和蔼亲切，善良温厚。湘渠先生赞她：在丈夫当官时她毫无骄色；在丈夫落难时，她亦一如既往。

“右派情踪”（十一）

（新西兰）周素子

金怀德

金怀德是我所住阁楼紧邻王绍舜先生的同乡并少年同学，1957年反右前在温岭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被打成右派，送金华劳改营劳动教养，时间长达15年之久。释放时已50岁出头了，由他在杭哥哥的多方设法，得以在杭州安身，被安排在庆春街一个小工厂做工，踏三轮送货。虽然体力消耗甚大，但是他身体壮实，饭量颇大，能胜任工作。他五短身材，高度近视眼，天性乐观。在杭结交了一批右派

朋友，消息灵通，喜酒、善棋、能诗，从未见有愁容。

他是王绍舜常客，且定时为王先生购米盐和柴煤。王绍舜多病，又无厨房即在阁楼里生火做饭，浓烟经久不散，呛人泪下。他又是王绍舜的围棋友，每周约定二、四、六晚下棋。金怀德若输了，算数，各有胜负嘛，显得爽朗；至于王绍舜若输了，会长时间捉摸棋局，据说会通宵失眠，他是以琴棋相依为命，显得认真。金怀德每来下棋，要自带晚饭，馒头或大饼等。同时提了王绍舜的空热水瓶到街上“老虎灶”冲来二瓶开水，自备茶水。他俩也偶而一起做晚饭，祇需烧好一锅米饭，菜肴则到饭肆里买些大肠、猪头肉等热食，不用盆碟，打开纸包，蘸些酱醋即可就饭。我住紧隔壁，常和他俩在一起。有一次，见他二人同进晚餐，以几角钱买的猪头肉佐饭，王绍舜先生一反往常省吃俭用、慢条斯理习惯，食时速度大增，牙落齿豁，吃相难看，甚为失态。但金怀德似浑然不觉，照常风扫残叶。事后我以此笑问王绍舜先生。他不好意思地说：“你看出来了？真难为情啊！我若不快吃，就要被他吃光了。”金怀德喜带朋友到王绍舜处，都是些“政治”上有问题、在低层做苦力的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王绍舜喜静，不喜欢这些朋友，两人常为此口角。

我曾介绍金怀德在邻居靳家任家庭教师，教靳家独子文史和数理，一周二次。凡去上课，金怀德则必衣履整洁，连衬衫领扣也扣上。靳家给他的报酬是在任教该日请吃一顿晚饭，并无酬金。他埋怨靳家

无酒，菜肴量少。所以若逢我假日自留下带回荤腥时，必请他到我家便饭，他最为欢喜。阁楼无饭桌，就席地而坐。有一天嚼 7 市斤重一个鱼头，因未备姜葱，也无油，祇用水清煮，入盐而已。我全家大小数口加上金怀德，放怀大嚼，竟未吃尽，名符其实的“食有余（鱼）”。

我在留下村店谋生时，蒙 3、5 知识青年推重，在工余求教于我，号为导师，我即以当时新华书店公开发行的《史记》、《资治通鉴》为教本。此外还设书法课、诗词课，俨然稷门绛帐。这是 1976 年，属“文革”晚期了，但到底还是以“教唆青年读‘黄色’书籍罪”，被留下公社召开大会挨批斗。这些事，均可归入“新二十年之怪现状”里。这期间，我还介绍了我的 3、5 学生向金怀德学习古文并诗词格律，每周一个晚上，在我的阁楼进行。金怀德教授他们读司马迁《报任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韩愈《祭十二郎文》等。所授诗词格律，别出心裁，以绘图法授之，效果甚佳。当时的这几位学子，本祇具初中水平，后来有了入学机会时，均得入大学深造，成绩都极优异。如姜允斌所写《落英考》，有专家水平；又如滕锡强，他先在留下跟我读《史记》、读诗词，然后随金怀德读古文，做诗填词，数年后我又引见吾师采翁，为入室弟子，在吾师指点下互校《论语》7 种，记录《资治通鉴》通假字，他均利用工余时间，手不释卷，孜孜不倦。吾师谓锡强所著述多种，均有学术价值。后受吾师推荐任省级报刊编辑。在这些青年的成长道路上，有金怀德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

金怀德年过 50，尚未成家，在落实右派政策前夕，有许多于右派有利的传闻，此时与金怀德在同一街道工厂的一位女工对他甚为有意，迅速的发展成恋爱 关系.先是这位女工的丈夫患病多年，后不治而亡。在这段时期内，金怀德是厂里踏三轮车的，热心乐助，常常为其夫送医院，帮忙家中打杂，女者心存感激。金怀 德既未婚，又是读书人，自为女者再婚的最佳选择，何况落实政策将成事实，今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都会提高。至于金怀德，一直是个专政对象，独居到此时，未 受过女子青睐，现今真有人愿意嫁给他，当然感到高兴，且感激她的慧眼识英雄了。没有多少时间的缠绵，就议论婚事了。金怀德将此事就商于我，我诚恳奉劝，认 为他俩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毕竟时代不同了，不是老式婚配，一旦落实政策，他谋个中学教师位置并不难，到那时自可找个寡居的知识妇女组织家庭，希望他能郑重考虑此番婚事。

这位女工已有 3 个成年的儿子，都是社会底层氓流，曾被轮番关押、劳教，为患无穷.据说女工向他作了保证，今后会与 3 个儿子断绝往来。1979 年年 底，金怀德双喜临门了，一面落实政策，任教于下城区教师进修学校；一面结婚成家。我则在一家杂志社任编辑，因而常约金怀德撰稿，让他写些史事，他落笔迅 疾，而且认真负责。我曾请他撰写关于 30 年代在杭州举办的全国博览会史事，配合图片算得上图文并茂。他还参与诗社编辑。身为老师的老师，与过去算是天壤之 别了。但是金怀德的婚姻、家庭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烦恼，他反而

留恋起过去贫贱时的单身日子了。他与几乎属于文盲的妻子，成了真正的柴米夫妻，无话可谈。令他最无法忍受的是 3 个流氓儿子：若某个在押，愚蠢的母亲不断往监狱送菜送肉；若某个释放在家，则偷鸡摸狗，坐吃山空。金怀德的家庭生活、经济情况都极受影响。他还不能理解这个母亲为何如此顽愚不化！金怀德迅速的衰老下来，神情忧伤，与过去判若两人。他不复作为右派时的潇洒了，每次来访或路遇我，他都连连叹息。看来他不可能有愉快的晚年了。

赵志钧

因为地理、人文的渊源，“老徽州”从发生、发展、繁华、衰落至今，千百年过去了，它深厚的积淀，10 几年前才被人们所重视、研究，以至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课题，谓之“徽学”。它的建筑学、戏曲、画派、经史、医学、风水地理学以至文房四宝等等，都被专家作为重要的探讨题材和研究对象。我个人对徽学也特别醉心，曾翻越皖浙交界险峻的大昱岭 10 次之多，深入徽州 6 县的村村落落，为徽州的建筑、村落规划，与徽剧等方面的精美绝伦而慨叹中华文化的辉煌！因为对“徽学”的热爱，我才有机会结识赵志钧先生。赵志钧是中国当代国画大师、黄山画派传人和发扬者，徽州歙县人黄宾虹的女婿，尽管赵志钧自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后有近乎廿年的“牢狱”之灾，

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黄宾虹学术的研究，他对“徽学”的贡献甚大。但他甚少出头露面，可谓“一片冰心在玉壶”。

徽州与杭州同饮一条水，古时以水路交通为主的年代，杭州是徽州第一停靠站，所以“徽学研究会”成立伊始，祇有徽州和杭州两处。我的中学同学方满棠，原是浙皖交界淳安人，后故里沉入千岛湖底，迁入安徽境内休宁县。他后来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是徽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刊发《徽学》、《徽学通讯》等书籍、杂志。承他器重，一开始就约我同主其事，以至 10 多年来游弋其间，遂“山深不知时”了。当代凡涉足于建筑学、地理学、戏曲源流、画派等学者，若不到徽州探源，就会使其学说感到欠缺，有难臻完美之弊。

其实我在 50 年代少年时期就认识黄宾虹老先生，那时他年近 90，住杭州岳坟旁栖霞岭（该处现辟为“黄宾虹纪念馆”），我尚在杭州师范音乐专科读书，寒暑假寄寓先大伯父同僚、金石书画鉴藏家陈伯衡家。伯衡先生淮阴人，蔚然大家，交游广泛，收藏丰富，凡一时名家，都出入他的“石墨楼”，如王福厂、余绍宋、钟毓龙、马一浮、沙孟海、徐映璞、潘天寿、黄宾虹等学人。伯衡先生亲自督教我习篆字，并命师事钱士青先生学篆刻。为让我仰见高贤，熏陶书香，时时携我出入于学人之门庭，因此我常随伯衡先生访黄宾虹于栖霞岭画室。那时在黄老处，除时时得见夫人宋若婴外，却从未见过他的儿女，更不知道有赵志钧其人了。

我认识赵志钧，是杭州徽学会成立后之 80 年代晚期。黄宾虹的学术及籍贯均属徽学范围，而赵志钧是研究黄宾虹的专家。他有关黄宾虹的著作，包括黄的《年谱》、黄的绘画理论暨题画《画语录》与黄的《黄宾虹诗集》汇编等，均交由香港方面出版。这些著作或汇编，较之比他早出的各家所著或画论的汇编，更为丰富和翔实。他独居于环城西路一所简陋旧宅，年近耄耋，患高血压、气管炎，以病弱之身自理生活，且著述不止。他与黄宾虹之女黄映家，于 57 年反右派斗争后不久迫于政治压力，已经离婚。曾有子女，因与赵志钧有 20 年的间隔，似无甚来往。而黄映家也早已另组家庭，与一个工人结婚。徽学会及黄宾虹学术研究会成立时，作为黄宾虹之亲生女，黄映家被邀入会，与赵志钧同时任该会理事。她非常关注父亲学术的宏扬，及纪念馆年久失修，一年一度扫墓等事。她虽然与赵志钧每次都与会，相聚一堂，但彼此从不交谈，可也不回避这种场合。黄映家比赵志钧年少近 20 岁，她当时已在任教的一所小学退休，住翠苑新村。黄映家粗眉大眼，阔口方脸，中等身材，不善言谈，读书不多。与其父的学问、风度全然不肖。

赵志钧并不学画，原先为政府职员，但在成为黄宾虹女婿后，对岳父敬仰备至，故岳母宋氏将家中大小事务全委托于他。1955 年黄宾虹逝世，夫人宋若婴慑于政治形势，将黄宾虹全部藏品并遗作无偿捐与政府，由官方文物部门及浙江美院教师多人参与接收，代表家族

方面移交的即为赵志钧.黄宾虹遗作多达数千 件，而移交手续极为疏忽、简便。据说其中漏洞、“弊端”甚大，赵志钧敢怒不敢言。又据说他胸中自有一本细账，若一旦披露，会使某某一些人不堪云。也有人说，赵志钧之所以“充军发配”，就是因为他知道内情太多而被人谋算的。照此说来，他一生的坎坷就是受黄宾虹的信託以及他自身对黄宾虹学术的热爱所致了。时 人对于黄女，出于种种原因，讳莫如深，很少有人论及；而对赵志钧的为人、学问，则众口皆碑，赞扬备至。他近乎木讷而寡言，对人则唯恭唯谨。他并不在意他今 日的身份是否为黄宾虹的女婿，他也并未自封为学者、专家，他无家无眷，祇将其余生完全交给了对黄宾虹的学术研究工作。他走访可以访问的人，搜集可以搜集到 的有关资料，详加考核。出于对黄宾虹的崇敬，出于一种责任感，既无人捧场和鼓励，也无人赞助（是香港方面见到成果后给以支持出版，以出书后赠书若干为条 件，无所谓稿酬）。他是一名真正的黄宾虹学术研究者和徽学研究者，他是真正的黄宾虹的好学生和“好女婿”。

吴亮

在 1979 年底的冬春之交，络续进行了一年有余的“落实右派政策”，基本告一段落。那批被磨难了 20 多年的“右派份子”们，大多先后均

被安排了工作。当年那些“右派学生”，其时也都进入了中年！

我被安排到一所新开办的理工科学校——“杭州市机械工业学校”，任全校的语文教师。我能到这所学校任教，有一段小小的奇遇，非常偶然。在落实右派政策前夕，我在杭州近郊留下镇供销社下属何家河头村店当店员。何家河头是西溪的一个旧码头，西溪隔岸属余杭县，那时到余杭蒋村等处，尚未通汽车，或在此过桥步行，或在此乘舟而往。此外凡外地人到老东岳进香，秋天文士游客到西溪赏芦花，河头是弃舟登陆之处。河头在明清两代及到民国时期，它都是繁华去处。在一条短短的石子街上，原有当铺、豆腐店、香烛店，光是茶馆就有3座之多。人们回忆说，那时过客嗑下的瓜子壳、菱壳，一天能扫2、3担之多。当地几10户人家不用耕种，都吃的是宗教、旅游饭。但随着公路的开发，更由于50年代后对宗教迷信的取缔与各类政治运动对知识份子的摧残，人们不再礼佛赏芦花，河头就彻底没落冷清了，此时祇剩下一间卖些油盐酱醋的小店，然街上尚有10几户农家，凡隔岸余杭县农民也到此间小店购物。我是在1976年从留下镇代销店再次贬到河头村店的。村店的开门时间特别长，尤其在7月份水稻抢种的“双抢”期间，从早晨5点开门，一直到下午农民摸黑收工后才能打烊关门。河头村店是一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订有一份《杭州日报》，整个村包括余杭桥头、蒋村等村的邮件都投存在店中，再彼此带口信，让收者来取。码头上还有2、3只载货、载客篷船，如村店的酒缸、盐包等都是从留下循西溪载运而至的。划船者

均为船娘，她们都逗留在村店等货、等客。下雨或下雪天，冬日农闲时，农民也都在店中柜台外，议论些远近的新闻、村中的掌故历史。村店可以喝柜台酒，花坞果园的工人贾长沙，早已赋闲的农民金根伯，与久病的洪老爹等，都时来光顾、闲坐。我在村店的日子颇受村人尊敬，比在留下动辄挨批斗的日子畅快多了。我代人家写信。夏日晚上轮到我值班，乘凉时，在店门口为人讲《三国》、《水浒》，俨然书场！船娘也曾载我游过古镇蒋村，篷窗喁喁，溪中藻荇、菱花，两岸夏木荫荫，燕子掠波点水，大有倪元璐“叫破鸬鹚梦，粗吟与细呼。柔风扶病橹，瘦影点酸湖……”的诗意！

一日，秋雨滂沱，黑云倒坎，人们闭户难出，我独处在店中，自蒋村方向来了一位中年女人，浑身湿透，前来避雨买伞，阻于大雨，竟在店中盘桓了1、2个小时之久，得以与之长谈。她先是惊讶荒村野店中竟有如我一位人物，知道我的遭遇后，又深表同情。这一特殊的会面，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乃是后来筹组杭州市机械工业学校校长孙检的夫人尹静波，当时为杭市西湖区商业局的领导。等到孙检办学、招兵买马之际，她推荐了我。孙检就到我的陋室，决意聘我为该校教师。当时我正在同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联系任教，由于感激孙检知遇之恩，及迫切求职的心情，就很快的受聘于杭市机械工业学校了。我还写了一首七绝给孙检，用了“吴市吹箫”、“郭隗市骨”的典故。

孙检是山东南下的老干部，崇尚知识，看重名牌大学毕业生。学校新办，师资短缺，他不忌讳政治历史，竟向落实政策办公室联系聘用了8名“政治犯”，其中除曾是华盛顿大学航空专业大专生、坐了24年监狱的汤桢祥（所谓“历史反革命”者）外，其余都曾都是右派身份。他们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曾就职中央机电部的张恩忠，毕业于杭州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吴亮，毕业于武汉水利学院的沈锭珠（女），学管理的俞伟明（忘了毕业于何校），毕业于交通大学的王其煌，还有一位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系的陆某（忘其大名）。

吴亮当时40多岁了，长身白面，令人联想起“皎如玉树临风前”的崔宗之。他出身于家学渊源的高级知识份子家庭，家住杭州清波门勾山里，这一带住宅都擅庭园之胜，清前期长篇弹词《再生缘》作者陈端生（1751——1796），受陈寅恪、郭沫若诸家推仰、激赏的才女，即原住此处。吴亮的舅舅是当时中央政协知名人士胡厥文，朝中有人，加之家中财力殷实，吴亮的右派生涯虽从未听他说起，似乎并不很悲惨。吴亮曾经结婚生子，“文革”风暴来临之际，他那位任中学教师的妻子，迫于形势，想立功赎罪以自拔，竟带红卫兵来抄自己的家，并和吴亮离了婚。我和吴亮同事时，常常结伴同行返城。他对家庭变故讳莫如深，对再度择偶也非常谨慎。据别人讲，他的发妻在吴落实政策后，有意破镜重圆，但遭吴亮拒绝。我曾提出为他介绍女友，也被婉拒了。但他自在我的阁楼认识了我的女友金怡后，双方却都有好感。他们接触频繁，人们也常在山水间见他俩的双影，但他俩又

彼此否认为恋爱关系.金怡是个雅致的美女，为小学音乐教师，是一个国民党的 军医的女儿，其父亦划为右派，她原先的婚姻不满意，早经离婚。她与吴亮本也可算门当户对、金玉伴侣，但后来金怡和我说起吴亮的性格，很难与他共同生活。她 举例说，吴亮家有热水瓶若干个，吴亮每日要用温度计测瓶中热水温度，细致琐碎如此，遑论其他。这是 10 多年前的事。但在我离国来纽前夕，听人说吴亮终于结婚了。

“右派情踪”（十二）

（新西兰）周素子

张恩忠

10 年“文革”，生产、教育都荒废，人才断层。原杭州市机械局下属 100 多所工厂，都准备重整旗鼓，开始生产。1979 年，市机械局筹办学校（杭 州市机械工业学校），自聘教师，招收学子，将为下属各厂培训技术人才，并由市机械局资深干部孙检任校长。孙检是 1949 年时的山东南下干部，虽行伍出身， 但他珍惜人才，尊重学问，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尤其喜爱南宋诗人陆游的字。杭州是座名城，一时

向全国各地调聘到数十位优秀教师，并向当时专为落实右派而设的“落实政策办公室”，在数百名经 20 多年磨难后等待分配落实的右派中，根据他们的档案资料从中挑选了 7 名右派（另加一名反革命份子），我和张恩忠、吴亮 等，都是被孙检青睐而被聘为该校教师的。

市机械工业学校，没有校舍，暂借用灵隐上天竺庙宇，一时外地的教师并其眷属，及数百名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学生，充溢了上天竺庙宇的角角落落。地处 僻静四面环山的胜地上天竺，顿时热闹了起来。杭州素称佛地，自吴越以来，何止四百八十寺？虽历代均有兴废，但自 50 年代以来，红色政权提倡无神论，毁庙逐 僧，庙庵所存无几，尤其在 10 年“文革”中，千年古寺、大小庵庙被封闭，佛像毁弃涤荡殆尽，除灵隐寺受封闭，大致得到保护外，其他寺院均仅余空壳，均充 公，或辟作他用。西山灵峰寺在 50 年代大炼钢铁时，殿宇拆作燃料，夷为平地。南屏净寺则派作屯兵之处。上、中、下 3 天竺均辟为工厂，其余小寺庙作为办公室 或为办学，或为仓库不等。所有寺庙，均仅有躯壳，内容全无了。

当时市机械工业学校建校于天竺寺，原大殿放生池等处，仍为高压电器厂占用。学校仅利用原依山而建的寺庙厢房，改建成教室若干间。原香积厨内的泉 水，以方池蓄之，终年汨汨不息，仍作为厨房饮水。上天竺寺占地于西山最高处，所以广大师生都能饮到全杭州市的第一口水！老师办公室与校长室则在寺庙建筑最 高处（可能是原方丈室），

为二层木结构屋，可以俯瞰山门内外诸景，远眺狮峰，10里琅铛岭诸山。原寺外右侧山凹丛林处之僧舍，则为师生宿舍。一所初具规模，充满活力的学校即相安于此了。上天竺寺原即具万千形胜，学校背后翻小岭通9曲岭、石人岭、灵隐法玄弄苦庵等所在。学校虽无现代化建筑，但它的“校园”山水之美，四季山色的变化，乃为其他学府所无！这大批学生亦都是10年文革中的学业荒废者，一经入学，均勤奋向上。我辈教师尤其原右派与原反革命者感于孙检的知遇之恩，感于有机会重执教鞭，敬业精神特好，一时千年古庙中，丛山苍翠间，如初春之万木，欣欣向荣。古寺中传出非诵经声、念佛声，而是书声、笑声。

在政治的高压政策稍定之后，初春，桑叶尚未爆芽，蚕花未孵，杭嘉湖一带蚕农，又依照千年习惯，到天竺寺祈求蚕花平安。她们成群结队，或戴印花布头巾，腰系百褶短围裙，自带干粮，前来礼佛。天竺寺原供有蚕花娘娘，她们在寺院附近摘些草木，带回挂在蚕室门框上，即能辟邪。于是市机械工业学校的门外，每日香烟缭绕，跪拜者何止千百人！她们临走之时，将一年辛苦所积之粮米、菜油置于我们的校门口，本来是捐与僧人的，现在就被天竺附近生产大队收去！我们这些教师在办公室中踞高临下，见人群川流不息，还接受着信徒们的礼拜，享受人间烟火，真不可思议！在数10名教师中的8名右派、反革命，大约出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共同经历吧！虽然素昧平生，偶然相聚，自然都格外亲近，我尤与吴亮、张恩忠、汤桢

祥数位更为要好些、接近些。

当时学校无交通工具，大家必须在灵隐寺外“咫尺西天”砖石屏风前，等待公共汽车。从上天竺到灵隐须快步行走 40 分钟山路，上下班时，我们常常结伴同行。经过半年的相处，人人认为，张恩忠是个最为耿直，即使在九死无一生时也绝不苟且的人，他与圆滑、耍手腕、貌合神离、口是心非等辈绝然无缘，是个正人君子。

张恩忠杭州人氏，家住吴山脚下清河坊 4 条巷，与吴亮的住址勾山里相近。他父亲是铁路老职员，早经退休，那时已 80 多岁了，还每日一卷在手，坐在藤椅上，看的都是英语书。张恩忠高中毕业于杭州第一流名牌中学一中，毕业成绩为全市第一，获得省教育厅颁赠的金杯，被保送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简直为神童，令所有为父母者所艳羡！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电部任职。不久，反右斗争开始，在鸣放阶段，他一介书生，个人并没有甚么意见可提。运动后期秋后算账，部里给一些曾提意见的人扣了右派帽子。张恩忠不解了，不满了。他说：“不是让大家向党提意见吗？”“不是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堂堂党中央不是向全国老百姓保证决不秋后算账吗？”“如果这么不讲信用，还能当执政党？今后还能取信于民吗？”他这样一打抱不平，使他也成为右派，而属后期处分最重的右派。因为他不认错，绝不低头认罪，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罪，仍继续提意见，于是他的罪状逐步上升，不时受到体罚，结果以“顽

抗到底，拒不改造，反动透顶”罪名，送往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后又被辗转送往北京市南郊团河劳改农场管教。张恩忠 1.80 米的高个子，剑眉凤眼，方脸，宽口，坚毅中寓有书卷气。但仅 40 多岁即秃顶，头盖骨显现凹凸不平，从此处即能见出他所受的折磨。原来他当日不肯认罪，不肯下跪，且还据理力争，指出弊端，“左派”就用铁棍击其头部，几度昏死，他就是不跪！……曾听他说起，与他同时在团河关押的有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小家族”干将杜高，与后来闻名全国的作家丛维熙，张恩忠却鄙夷他们，说他们奉上欺下，卖友求荣，自私、圆滑。约在 1965 年，张恩忠在劳教农场患了胃溃疡病，严重到生命危在旦夕地步，需要进行手术，因而被保外就医，得以回杭州老家养病。张恩忠是独生子，还有两个姐姐早已出嫁。1966 年“文革”开始，各派互斗，打、砸、抢、抄家，大字报上街，一时黑云压城，种种怪诞、不合情理之事，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张恩忠在家养病，良心使他不得安宁。他针对报纸谬论，提出己见，也把所写大字报贴到了街上……这里暂且不提这一举动的后果，祇说张恩忠的母亲，自从儿子打成右派、坐牢、劳动教养，已够使她心碎了，不料这个儿子竟在保外就医的时刻，又生事招灾。这位慈祥的母亲终因负荷不起深重的精神桎梏而忧虑、焦急、恐惧而死。

张恩忠可以忍受牢狱之灾、皮肉之苦，母亲的死则令他痛不欲生，深受刺激，新旧磨难导致精神分裂。其实在落实政策到机械学校任教时，他已经患有精神分裂症，祇是孙检校长不谙内情，仅尊重他的

清华大学毕业学历，实则他是不能再工作的了。上了几个月的课，学生反映他祇在课堂上大谈政治，分析国内外形势，预测种种政治运动的可能，表现多疑敏感。不久他就赋闲，干领工资了。他不满学校这一处理，要求上课，他仍然日日来上班，所有谈话内容，均为滔滔不绝地分析国内外形势，预测下一个政治运动倾向。杯弓蛇影，且还大段引证“毛选”及《资本论》等著作，原来他 10 年的牢狱生涯，能阅读的文字，就是马、恩、列、斯及“毛选”等著作，辩论起来，学校的政治老师也不是他的对手，同辈中罕有像他那样潜心研究过这些著作的。他常常到原是右派的同仁家，当然也常常到我家，他一进门，就长时间的讲述目前形势，分析起来，都无非要我们提高警惕，谨防当局的再加害。我和吴亮与他家相隔很近，故所受的打扰也最多。

约在 1983 年间，他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他父亲老友的女儿，30 多岁尚未出嫁，俩家原为通家之好，故愿结亲家。显然女方对于他的不同于常人处并未深知。第二年他有了一个儿子，但夫妻俩感情不好。他常向我抱怨说他老婆骂他精神病，要和他离婚云云。他曾问我：“你看我有精神病吗？”我能说他有病，应该治疗吗？至于离婚，他表现得甚具大男子风度——谓悉听尊便。94 年秋他曾到过我家，以后再无见面。现我来纽西兰已经多年了，不知张的家庭生活有无起变化。目前国内外形势变幻莫测，日新月异，未知他的分析、预测能跟得上时代否？

何悟春

何悟春是我中学时代杭州师范音乐科的同学。在中共执政中国多难的数十年中，几乎每个政治运动，都会有我们的亲朋好友被打成敌人，归入“百分之几”的“一小撮”反动行列。在 57 年这场汹涌的反右斗争中，我们这个音乐班老同学中，就我和何悟春分别在各人后来就读的大学里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我们这个音乐班，在 1951 年入学时，男女生祇有 26 名，到第 2 年二年级时与萧山湘湖师范音乐科合并后才增至 30 多名。这班少年同学，融融一堂，前后产生过 3 个班长：第一年原杭师音乐班的正副班长为陈良森、何悟春；第二年并入湘师后，副班长即是湘师来的张希圣。这 3 个同学都不是那种“少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一类，他们后来都卓有成就，名满浙江教育界、音乐界。陈良森在杭师音乐班毕业后，升入上海华东师大艺术系深造，毕业后在沈阳音乐学院任教，文革时期调回浙江，在杭州歌舞团任男高音歌手，任职期间，忽然以“流氓罪”被捕，蹲囹圄年余，受尽体罚并屈辱，待到水落石出，原来是毫无根据，连捕风捉影都谈不上的莫须有罪名。释放时，他已是身心受伤留下了终生的心脏病。到 80 年代初，杭州师范学院甫成立艺术系，他始荣任为该系系主任，直到退休。他的心脏病亦于两

年前开刀做了“搭桥”手术。张希圣于杭州师范音乐科毕业后，虽未入大学深造，但他在宁波效实中学，执教终身，成绩卓著。效实中学是浙江名校，他锦上添花，为效实中学组织了合唱团、管弦乐团，名闻遐迩，使他获得浙江有数的特级教师称号。至于3名班长中的另一名何梧春，他的经历则坎坷得多！

1953年何梧春在杭师音乐班毕业后继续升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深造，1957年暑期即将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已作留校任教打算，而且春风得意，与同班女同学、该学院教授之女恋爱，并将赴苏联参加一个音乐节，任男低音歌手。该年暑假，北京的中国文联等单位已开始反右斗争，尚未扩大到各大学学生中。暑假我在北京时曾到北京艺术学院去看望过何梧春，和另一名也原是杭州师范音乐班的程振幅同学，相见之下，非常高兴，大家都以为前途无量而意气风发，我还向何梧春借了一把二胡回芳草地，以作为漫长暑假中的消遣哩！我那时拉刘天华10支二胡曲，刘天华使二胡这个民间乐器借鉴西洋小提琴的换把、泛音，使它列入了雅乐。就在那年与何梧春相见后，待暑假期满返校各自都被打成了右派。直到20多年后，我得以返城工作，惊魂甫定，才得知何梧春的一些情况。

何梧春打成右派后，处分很重，发配回浙江原籍东阳县农村务农，受监督，戴罪劳动。后期，因为他能拉得一手好二胡，被东阳县婺剧团招为乐师，于是随团演出，辗转于各村落间，免不了睡戏台、挑

行囊，沦为乡村艺人范畴。等到 70 年代末落实右派政策时，他则久久未被落实，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又不幸 卷入错综复杂、人鬼难分的派性斗争之中，受报复、被关押，直到 80 年代初才被恢复工作，安排在金华市的浙江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至 80 年代中期，毕竟他的 艺术素养、音乐功力不同凡响，而终究担任了该校艺术系主任。

我和何梧春的再度会面，是在 1989 年在杭州召开的杭师音乐班的第二次同学会上。此次聚会由吕英、黄敏如召集，外地同学都集中居住在黄敏如任校长 的邮电路小学内，聚会地点则是由我安排在里西湖镜湖厅。此处 在葛岭、西泠桥之间，附近原有清代书法名家梁同书墓及当代学者马一浮讲学的复性书院旧址，从镜 湖厅引领远眺，能见长堤如带，十里荷花。我们班同学大多数从 1953 年毕业后还未曾谋面，均经历了漫长的 36 个年头，都已从青少年进入 50 多岁的中年以后，无论各人遭受过何种磨难，无论各人在这大浪淘沙中怎样淘洗、冲击与沉浮，即使头发斑白，颜面纹生，但少年同学的再聚使我们均似回复到天真烂漫的心地， 真是难能可贵！同学中有身居学者教授的如陈良森、程振幅等，有沦为酱园店踏三轮车和手工艺者如徐养性、程效曾辈，但老同学相聚不分“贵贱、尊卑”……我和 何梧春的相见自有一份遭际相同的感情。他此时已任浙江师范大学艺术系系主任，在其任职间，将极有音乐素养的程振幅与夫人吴一斐（亦是音乐班同学）自甘肃兰 州师范大学调至浙江师大。程振幅是何梧春

在杭州及北京艺术师大的前后同窗，后来接替何梧春成为第二任系主任。接着，何梧春又将胡树人并其全家自福建三明师范学校调至该校任教。胡树人在杭师音师班毕业后曾与我同时升入福建师大艺术系。他俩都是浙江人，能回浙江任教，从外省调回，在那个年代并非易事。何梧春对同窗之情可谓深厚，功绩不小，也于其中可见他的办事能力。此次同学会中程振幅、胡树人亦都与他相偕自金华同来。当我们再同声合唱“今日我们是桃李芬芳，明天是国家的栋梁；今日我们欢聚在一堂，明天要兴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时，不禁热泪盈眶。

与他的名字仿佛，何梧春身材魁伟，嗓音宏亮，粗眉大眼，面色黑紫。在学校时，同学送他的绰号是“水牛”，316年以后，同学相见仍以雅号相称，倍感亲切。在何梧春坎坷动荡的半生中，为鱼、为龙，最终能够再从事音乐事业，任系主任，应该是宽慰平生了。但是他最值得庆幸、最可贵的应该是他的妻子，我虽不知道她的芳名，但程振幅多次与我谈起她：作为一个从小住在京城，大学教授的娇女，一旦嫁给了心仪的夫婿，竟然至死不渝相伴终身，同时流放到僻乡，忍受着生活、政治的双重压迫，当许多家庭、感情都在这双重压迫下遭到粉碎时，他俩却在风雨飘摇中坚如磐石！程振幅说，何梧春再度成为大学老师时，也未见她喜形于色。伴着何梧春3起3落，默默承受何梧春被动的“36变”，做到自我牺牲，真正的荣辱不惊，超然象外，让人敬重。

楼百层

在我平生交往的人物中，有非今雨、旧雨，而祇是偶然相逢，受其关切、帮助，虽时过数 10 年，仍时时念及、未忘恩波的，有两位医生。

一位是杭州九溪屏风山疗养的牙医师某（据说亦为右派），因为当时大幼摔断一颗下门牙，才由此结识了他。那是 1968 年春，我携带孩子，从陕西富平辗转东下，到杭州郊区龙坞投靠亦是右派的二姐周素琛。离开富平那天，北方早春，天寒地冻，村民白玉欣、白广地送我们到离白村 10 几里路外的阎良上火车，将趁廉价的夜车赴西安。孩子则坐在白玉欣手推的独轮车上。我们一行人行进在“富平不平”黄土地的高坡、深沟中，曾驻足在枯干的河床深处。仰望天宇，月明星稀。白玉欣对我说：“你们到南方，若生存不下去，还是回白村罢，我一定每天供给你一担水。”黄土高原的水何止贵如油啊！此情此景，在我今后的漂泊生涯中，是艰难中的希望和动力！那晚我们在西安最便宜的小旅馆楼梯下瑟缩了一夜。次日，我与孩子在火车上，我想在锅炉房为孩子将湿鞋烘干，不料这仅有的鞋被锅炉工人扔到了车窗外。在上海转车时，孩子们红肿的赤脚，行走在寒风

中……。

在杭州浙江美院任教的我哥周昌谷，他正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人身份关押在该校“牛棚”中。老母原与我哥同住在涌金门韶华巷 55 号，此时因土改时所划的地主身份，又遭第二次驱逐出杭州市区，住到了龙坞僻乡。二姐家原有 5 口人，加上老母，与我们母女 4 人，总共 10 口，同住在村中原先养猪的茅屋里，泥墙土壁被猪拱得坑坑洼洼（后来由右派好友黄永根修补好），幸茅屋加厚，未被秋风所破。这 4 代同堂，忧虑的是 3 餐，惶恐的是村中头目的欺凌。全家团聚的融融之乐，竟未能享受！

从龙坞乡到杭州市区，须先步行 7 华里路到转塘（浙江下游之江，在此一个大转弯），才有公车可乘，到九溪后再转车，可达杭城。就在这样地僻无车的山乡，大幼不幸摔断了下门牙，因未及时治疗，致使牙床灌脓，下颚红肿，在万不得已下，祇得赴杭城就医。连日阴雨，孩子又无雨鞋，我背负大幼，在泥泞的田埂路上先得走 7 华里，然后乘车、转车赴杭诊治。因恐亲友嫌弃，故不在杭停留、借宿，都是当天赶回龙坞的。辛辛苦苦往返多次，断牙要补，必须再往……。

有一次在九溪转车时，一个农民告诉我，就在九溪屏风山疗养院内有牙科诊室，可能会接待外人医治，若接待，不必老远往返杭州城了。遵循指点，我找到屏风山疗养院，这是供单位职工及官员度假、疗养之所在，环境优雅、清静，在茂林修竹间。牙科祇一个医生，约

60 岁模样，面目清秀，服装整洁，有留洋学者风度，跛一足，态度和蔼、慈祥。我说明情况后，他立刻同意为大幼治疗。他的治疗方法与城内牙医迥异，决断地拔去了大幼的断牙根，说孩子的断牙不用补，在成长发育过程中，会自动排列整齐，不会让人觉得少了一颗牙的，若补上，将后患无穷！他还让我看他的下门牙，原先也是少一颗的，看不出吧？我至今为大幼庆幸能得到他的医治！到屏 风山疗养院祇二次，比到城里路途、时间都省略了一大半，而且不用排队、等候。在那个到处白眼、受欺凌的日子里，遇到如此善待我们的牙医，反令我十分惊讶！ 我本就衣衫褴褛，来自乡间，他大概在我的言谈、举止中察觉到我的处境和遭遇罢！他不收我们一分钱的诊疗费，一律免费……。多年以后，右派“改正”，恢复工 作，我想面谢他，打听他的下落。人们告知，他在“文革”继续深入阶段再遭批斗、抄家、游街示众，大概在给大幼诊牙后不久，即不堪屈辱而自杀了。我没能效仿韩信报漂母，一饭千金，但令我刻骨铭心！

比大幼治牙更早几年，“文革”前夕，约 1964 年春，二幼得病后留有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时老母暂住涌金门韶华巷我哥周昌谷寓所，三幼即将降生时。 经我二姐老同学吴克敏的介绍，到浙江中医研究所请名医楼百层医师给二幼诊治。吴克敏的母亲是产科医生，与楼百层是朋友。吴克敏说，楼百层出身中医世家，专 攻针治疑难病症如不育症等，在同行中享有盛名，然不幸于 1957 年打成右派，遭压制，不让出头露面，但他的高明医术与宝贵经验，则需他笔录留世，故留

在省 中医研究所，所谓“春蚕到死丝方尽”吧！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与省中医学院同在原浙江大学旧址内，是否相属不得而知。老浙大旧址在庆春门大学路，中医研究所虽有门诊，似乎未对外营业，受诊治者的疾病当与研究者专题有关，病人不多，环境清静。

庆春门在杭城偏东北向，为明清杭州十城门之一。民谚有云：“候潮门外盐担儿，庆春门外菜担儿。”庆春门外是菜农聚居之所，门内有菜市桥，为蔬菜集散地，从宋代起，地名至今犹存。早在宋代，直至明清，乃至民国之际，庆春门一带又是文人乐居之地，盐桥、众安桥一带原有多家藏书楼，后毁于太平军与日寇侵华。附近岳家湾，为南宋岳飞家属世居处。左近大学路有浙江最高学府浙江大学（于 50 年代中期迁新址至老和山文化区），与寓有教化的弼教坊、大方伯、浙江图书馆邻近。近人许宝騄、钱学森故居即在此一带，当代文豪郁达夫亦于庆春门内柴木巷筑“风雨茅庐”，但祇与王映霞在此居住仅 3 个月。菜市桥近处还有一段壮丽的历史：明末清初抗清义士魏耕雪窦，和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苍水先后就义于此，二者均由甬上义士万斯大等收葬于清波门外（魏后又被移葬于石人峰下）。但在 30 年代后，人们开始崇尚滨湖居住，纷纷筑庐西湖之畔，加之 50 年代浙大迁校后，庆春门一带则祇留织锦机房与一般市井居民的聚居处了。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即座落其间。

楼百层医师，当时 50 多岁，身材颇长，面色黄黑，令人想起《水浒传》中的“病关索”。他不假言笑，态度严肃。二幼经大病后，左手不能举，左边面部 瘫痪，左眼不能闭等后遗症。左脚虽能行走，但姿态倾斜、不稳。楼医生经仔细观察后，言简意赅，说二幼的手足他能治疗至恢复，至于面部，他无力回天；但在发育过程中，能恢复一部份功能。后来经楼医师仅针灸了 2、3 次，二幼的左手即能上举取物了。时当冬令，楼医生认为若是盛夏，效果会更好些。

往返多次了，二幼已认得从韶华巷到老浙大中医研究所的路程，上车，下车，转弯抹角。我分娩三幼后，不是外婆陪二幼诊治，而是二幼引外婆到诊所的。外婆对二幼的记忆力非常吃惊，但又感奇怪的说，二幼一路上都是自愿而往，但一经扎针，就大哭不止，口眼都歪斜了。楼医师说，孩子面部瘫痪不易针治，就与啼哭时口眼歪斜与扎针的要求相悖有关。至此，楼医生认为他的力量到此为止。老外婆则认为，祇要手脚麻利，脸部瘫痪并不重要。后来在二幼 6 岁时，杭州海军疗养院开设有小儿麻痹后遗症专科治疗，我与老母亲陪二幼去就诊过一次，终因下关穴针刺太深，老外婆舍不得孙女吃苦，极力反对而作罢。

在楼百层医师处，经过从冬到春的一段治疗后，二幼的恢复令人满意，面部稍有恢复，左眼已能随意开闭。大约是楼医师知道我们的困

顿处境罢，他免收全部治疗和医药费用。这不仅仅是多少钱的问题，这里包涵着谅解、真情，在当时的环境中，尤其值得珍贵。

几年之后，我二姐之子小鲁，忽然患了摇头症，听人说针灸有效，我母信赖楼医生，特意寻访他。不料，楼医师竟病故了！惊惜之余，别人介绍说，楼医师夫人也是一位针灸师，且得其真传。于是我们找到了楼夫人，她家住官巷口青年路青年里，是一所 30 年代砖木结构老式墙门，有多家合住，厨房合用，楼家住楼上厢房，光线阴暗，家俱均甚老旧。楼夫人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女人，脸色紫膛色，瓜子脸，大眼炯炯有光，侃侃而谈，一付精明能干模样。她为小鲁祇针灸两次，症状全消，我母叹为神针。

戴荫远、沈奇年

80 年代初“文革”结束，纠正冤案错案，右派“改正”，所谓“百废待兴”，各处用人又重视学历，而文化、人才断层，正规大学毕业生不敷需求，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成人大学应运而生，接着诞生了通过电视教学的电视大学。除中央、省、市正式电视大学外，各大工厂、大单位都利用电大教材，聘任辅导教师，为培养职工成立电大分校，连平日作为瓶花毫无独立政见的各民主党派，也纷纷效法，开办成人

夜大。夜大学大多租用各大专院校以至中小学的课堂，并聘请各大专院校教师以电大教材讲课，学生都是些 30 岁左右受文革潮流冲击而致失学者、在职者。一时遍地芳草，稷门、绛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弦歌不绝，有教无类！民主党派如九三学社（以科技工作者为主），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以大学教授、社会学者为主），农工民主党（简称“民革”，以残留大陆之尚有利用价值的老国民党党员为主）等。杭州市民革不落人后，力争上流，亦在 1980 年创办了民联夜大学，称“民联业余学校”。

当时我已落实在杭州市机械工业学校任语文教师，并在浙江省艺术学校兼语文课。民联夜校兴建伊始，设有诗词格律班，并招收了 40 多名学生（其中年龄最长的学生是前国民党师长，经“战犯”关押释放后被委任为浙江省对台广播站站长方耀，时已 70 多岁），已聘诗词家 80 多岁的盛配（右派）为教师，未及开学，盛配子女虑其夜间外出 不便，再请省文史馆馆员章士严为教师，不久又请辞。开学在即，而急待教师。一日，民联教导主任徐衡亲莅武林路阁楼，说是省文史馆向他推荐了我，虽然我当时才 40 多岁，且脱离了学界 20 多年，但为文史馆学者所倚重，无从推辞，勉力赴任。于是从 1980 年开始，我即在民联夜大学担任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与诗词格律等课。1982 年民联成立电大分校，我继续任电大古代文学、古汉语课，直至 1985 年我至杂志社任编辑为止，前后凡 5 年。在这 5 年中，教学相长，使我增进了学问，而且在民联的同仁中、学生中结识了许多可贵的好

友！

学校的员工，除兼课老师外，都是些吃过苦头但有学历的老国民党员，如校长王某（忘其大名，身世不详），教导主任徐衡等。我与徐接触较多，他毕业于老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报界多年，共党执政后，在囹圄 20 多年，“落实”政策后得有机会致力于教育事业，于是废寝忘食，摩顶放踵，不黔突，不暖席，最后在其陋室中死去，当夜大学生陈一江发现时，在床下已毙数日矣！在火葬场遗体告别会上，虽经整容，我还见他指间犹有泥土，大约是临终之时尚在挣扎吧！？

员工中任刻钢板、印刷者沈奇年，在 1958 年支援宁夏的乌托邦大迁徙中，作为高中生他去了沙漠边陲，等到发现这是一场变相的无期徒刑时，他带头请愿要求返杭，结果以“反革命首脑”判刑，服苦役竟达 19 年之久。他手带镣铐尚以《辞源》自习，饥饿时吃过粪桶里的瓜皮。历经苦难，不改其乐。已 40 有余，尚无配偶。平日于文物搜藏，抱残守缺，如醉如痴，比之居陋巷的颜回，节操犹有过之。后与我同在周采泉门下，有师姐弟之情，甫稍安定，不幸死于车祸。

奇年之死，与我抱同样沉痛、久久未能去怀者是民联夜大学的组织者之一戴荫远先生。戴先生江苏淮阴人，退休中学老师。抗战时期，避寇浙江，就读严州碧湖师范，50 年代初，曾在杭州师范所开设的小学教师培训班就读一年，在校时，我们并不相识，但在一个锅里搅

过勺，算是忘年同学。所以他见到我时，用苏北口音称我为“劳同谢”（“老同学”）。他在早年任教于高银巷小学时，被打成右派，于是上山下乡，劳动、发配无复宁日。直至80年代“落实”后民联兴办夜大学，他被难友徐衡相邀出山，已是他退休多年以后了。戴先生高度近视眼，白内障，在闹市行走，靠边而走，随时都怕撞着人。他办事一丝不苟，任劳任怨，早到迟退，即使在假期中还运筹不息。他为民联夜大创办过音乐班、手风琴班、绘画班、书法班。并兼任聘请教师的重任。在同仁中他挚爱沈奇年，即使后期奇年离校他就，彼此亦来往频繁。戴荫远间时特购大蹄膀，由夫人烹饪，一半红烧，一半白烧，为奇年补身、解馋。

戴荫远夫人是先生在碧湖师范时同学，他俩相识于日寇侵华的国难之际，共度过避寇的8年艰苦日子。1957年戴荫远划为右派，风风雨雨，携老带小又是苦难深重的20年。这是一对名符其实的患难夫妻！夫人身材矮小，从事会计工作，退休之后仍在“民革”某技术处任职。无论严寒酷暑，午休时间都要乘公车赶回家为丈夫备饭。非常凑巧的是，自1986年以后，他俩成为我杂志社所在地的近邻，从此我也享受到了夫人的许多好处。原杭州古城在民国16年前，市内尚有浣纱河、中河、东河、新开河、小河等等7河，左绕右绕，是处有宿舟、河房、拱桥、小巷，是一个“东方威尼斯”，近人戴望舒的新诗《雨巷》，即是杭州深巷的优美写照。我在1985年以后任职的《风景名胜》杂志社，即坐落在马市街小营巷酱园弄12号，大门开处正

对着酱园弄垂直成丁字形的银枪巷，东河万安桥下。 这些小巷窄窄长长的，非常安静，还保持有昔日风貌。戴荫远一家于 1986 年初搬迁到银枪巷一号，与杂志社“一巷带缘”，步行毋需 2 分钟。夏日午休时间较长，夫人回家做饭，邀我同食，我在他家午餐午休，为期不短。夫人和悦以待。

1987 年 9 月 7 日，大雨倾盆，我所居武林路阁楼，因楼梯屋顶漏水，似花果山水帘洞。下午 4 时左右，我自外回家，见门上有戴荫远留言，谓：闻奇年 车祸，住杭州红十字医院，约我同往看视。待我急奔医院，得知奇年已于中午在宝善桥车祸当场毙命，医生抢救无效。呜呼奇年，平生受尽折磨，此乃最后一击！次日，我在酱园弄遇戴荫远，他双手紧握我手，以足顿地，老泪纵横，放声大哭！方得知奇年是在他家吃过夫人所备中餐后，因天雨骤寒，回宝善桥寓处添衣途中遇难的。戴先生说：“若知道他是去送死，我必扯住不放！”，几年以后，每次相聚，总要谈到奇年，谈他孜孜为学的精神，谈他对文物的沉醉，谈他对朋友的一片赤子之心……。每次，戴先生必黯然喟叹。奇年一生，戴先生夫妇因为共同的患难经历，成为知己。尤其，对他死前一天，他临时工作的地名志办公室收到上级对他 20 年冤狱“平反”的通知书，领导准备在他晚间到办公室住宿时告诉他，让他高兴一番，不想是日因雨他回自己的寓所住宿，他竟不及知了。戴先生感叹不置！原来杭州市政协内定，待他落实政策（指“平反”）后，委任他以正式工作，命其撰写《南山公墓墓志》（因早先入葬者甚多

名人)，他自己亦已着手搜集，考证这方面的材料。不料自己却成墓中人！

“右派情踪”

（十三）

（新西兰）周素子

江天蔚

80年代初，我在右派获得“改正”后，落实在杭州市机械工业学校任教职，同时在浙江省艺术学校及杭州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兴办的“民联业余学校”兼任古代文学课教师。

我在“民联”兼课达4年之久。这所业余学校的上课时间都在晚上，学生则是因10年“文革”而失学的年轻人。办学者是“民革”中一批在10年文化萧条后，于事业仍抱孜孜不倦精神的老学者，教师则全部向正规学校聘任兼课。办学两年后，“民联”曾评过数名优秀教师，我即是其中之一。在此其间我还差点当上了“民革”杭州市委的宣传部长，一个不小的官哩！因此我也结识了赏识我的元老、杭州市“民

革”领导层人物江天蔚老先生。

当时各“民主党派”都想重振旗鼓，纷纷扩展有限的势力，招纳知识份子入围，原先如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等本来就是知识份子结集之处，但如“民革”这类民主党派，却并不受知识份子的青睐，而我因在该属下学校教书，近水楼台，不免沾边。其时算得上大知识份子的杭大中文系教授蔡义江，他即在此时被直接提名，担任了北京中央“民革”宣传部长的。他的父亲蔡竹屏为 40 年代国民党治下的县长，据蔡义江和我说，他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一头衔，还有为他父亲申诉未了冤案的一层含意。反正他是弃文从政，俨然为京官了。我则因老母、哥哥极力反对，加上自身的清高思想，没有当成官。当时的杭州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需要一位合适的人接任宣传部长，据我后来得知，他们希望这位部长是一位女性，40 多岁，大学文化，善于言辞，有气度，而且必须是国民党世家。据说他们经过周密的观察、调查，最后选中了我，而我确实是具备了别的 40 多岁女性所没有的“国民党世家”身份：我的大伯父周六介是孙中山时期的同盟会、光复会会员，参与过光复南京壮举，在光复军中任敢死队队长，光复后任首任杭州知事，接着任上海道台。我的父亲周云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工作。我的大哥周昌澍在中共建国前夕 1949 年，毕业于蒋介石亲任校长的南京警官学校！我的身世何止是国民党世家，简直是国民党功臣世家哩！加以我所具备的其他种种条件，成为物色目标就在情理之中。所以一个人成为学者、教授并不是偶然的事，

必须有环境和自身的专注、勤奋，而从政、当官，往往非常偶然，有其意想不到的因素。

尽管当时“民革”杭州市委对我若愿意当宣传部长给予许多承诺，包括可以让我长驻北京，以便与中央民革多项联系。还说，2年后即可进入政治协商会议当政协委员，至于物质上的住房改善等当然不在话下了。但是我不愿意当官，尤其不愿当任何与国民党有关的官，中共建国以来，我们这个家庭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算得上家破人亡，吃尽苦头，我小小年纪即被戴上了“右派”这顶桂冠，即与国民党世家有密切相关，所以说到“反动”历史，还心有余悸！还有想到我那身为小儿科医生、出身贫寒的祖父莲波先生瞑目之时的遗训，因为他的长子周六介一生戎马生涯，出生入死，最后虽然做了官，但是在36岁的英年即弃他而早逝了，他伤心地说过：“这就是做官的报应！”因而他教训子孙：“祖祖辈辈，耕读传家，不要做官，不要远离祖宗的坟莹”。不要做官，我是做到了，可是现在远涉重洋，祖宗的坟莹已经久不祭扫了。

国民党杭州市委的上层领导人物江天蔚先生当时在平海街办公室召见我，有民联业余学校教务长徐衡在座陪同，向我申明大意，劝我从政，在我婉转说明自己的想法后，江老先生毫不勉强我，并爽朗的放声而笑。这是我初见江天蔚的神情，而且从此以后，我和江天蔚竟成了忘年之交。10多年来，时时过从，他成为我值得信赖的良师

益友，他对我时时有所教益、警策！

江天蔚浙江松阳人，当时已 80 多岁了，他满头银发，肤色红润，双目炯炯，有学者风度，真正的“鹤发童颜”！江天蔚早年任职松阳某中学，抗日战争年代，从事抗日运动，不知道他是属于何党派，反正曾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经坐老虎凳等酷刑。他所受的刑罚后果，可谓终生受用不尽。据他夫人吴凤仪说，他长年浑身关节疼痛，不能安眠，入睡，每晚都是靠床倚枕，坐待天明，睡眠对江老来讲极其痛苦，骨节疼痛的程度，简直是一场战斗、挣扎，也可见睡眠与长命、精力、思维无关，江天蔚几乎日日精神饱满，交际、著述，未见星毫萎靡，直至目前 90 多岁了，仍一如既往！

江天蔚在 80 年代初，还住在杭州平海街附近贯巷，居室为木结构老式大院，显然属“文革”中遭受降格待遇，居处狭隘，厨房就设在室外宽大走廊里，临近天井。我常去他家拜访。夫人吴凤仪原是杭州师范第一届毕业生，那时是抗日期间，学校已迁址碧湖，我也是杭州师范 50 年代的毕业生，虽相隔数 10 年，但属校友，故分外亲切。夫人小江老 9 岁，为高银巷小学退休教师，他俩已是耄耋伴侣了。吴凤仪原为江老的学生，在白发翁媼的日常生活里仍能见出师长的威望与关怀。夫人性格乐观，随和。我们常常谈及杭州师范故事，如在几十年中，共同教过我俩的顾西林老师逸事。

江天蔚后为民革领导，退休后，进入政治协商会议，“文革”10年后，百废待兴，机构重整，新旧之间未曾衔接，故江老仍兼顾民革工作，有决策之权。他们除创办“民联业余学校”振兴教育外，还网罗社会上的文艺书画家成立了“钱塘书画社”，每年有一次书画展，并将优秀作品结集出版，装帧精美。10几年来 从无间断。书画社社友，有国画家吴静初、施祖铨，书法家王漱居、唐诗祝，古琴家徐晓英等，我的诗作也常滥竽其间，以文会友，时有切磋。

江天蔚能诗，善书法，字宗黄山谷，各地求墨宝者甚众。他的书法，凡绍兴兰亭、富春江严子陵钓鱼台的碑林及外省诸胜地等均有其碑刻。江老极喜诵我诗作，毫不掩饰其赞赏之情，尤其对我70年代所作的古风《虞庠》篇很欣赏。江老于百忙之中，还写有80万言巨著《两汉与匈奴关系史》专着行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极有史料价值。江老珍惜时间，安石碎金，时时掇集，1983年他曾亲自为我制订了休息时间表，希望我在教课备课的百忙空隙，抓紧时机，勤于笔耕。他主张持之以恒，每日写作半小时约200字即足矣，一日200字，一月即有6000字，一年即有6万6千字，3、5年以后岂非巨著？他主张锻炼身体，他自己在80多岁的高龄，还每日清晨至湖畔断桥、西湖长跑。他说跑到跑不了就不跑了。他给我的作息表是：清晨6点至7点写作，7点至8点是散步、锻炼，8点半早饭，然后一日紧张、充沛的工作、学习。许多年来，我虽然未能很严谨的执行江老安排的作息时间表，但它使我养成清晨写作的习惯，后来我在《风

景名胜》杂志社任编辑，记者，所有的文字，几乎都在清晨完成，果然，白天整日的繁琐工作，就不至于影响清晰的文思了。

江老还帮过我女儿二幼的大忙。1989年二幼将出国来纽，她于198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于浙江美术学院史论系任教职，已有3年，有关规定大学毕业后工作未到5年不予审批出国，但又有另外规定，若有海外亲属关系则可放行。我的堂姐夫方正，早于49年去台湾，在台湾居卫戍司令高位，没有料到原先甚遭中共忌讳，籍以加害的海外关系，这时却大派用场！方正是台湾国民党官员，大陆“民革”机构有台湾官员名录，因此要由杭州市民革出具证明，证实方正的存在。二幼有了这层关系方始准予出国。因而二幼在办理出国手续时，得到江老的帮助，顺利解决了问题，为此她到过江老家多次。有一次，适逢夫人腹疼难忍，而江老坐于窗下看书，像贾迎春观《太上感应篇》似的，若无其事，毫不着急，是由二幼送夫人去医院的，结果证明是阑尾炎，住院开刀，大约夫人平日往往无病呻吟，江老司空见惯之故吧！

江天蔚从中学教师，以民族之深情，加入到抗日阵线，被关押上饶集中营，严受酷刑，他是国民党员，中共建国后，又以国民党的“革命者”，一直在民主党派中工作，他如何被划为右派的，有否服过苦役，在何地劳动，中共有否对这样的人物网开一面？均不得而知，也从未听他说起过。

约 80 年代末，杭州市在旧城改建中，江老一家从贯巷搬到朝晖新屋，从市区跨过运河的施家桥即可抵达。江老曲折艰辛的一生，于此安度晚年，我每去看望他俩，夫人必留饭，席间谈些养生之道。在江老的谈吐中，时时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感。

吕以春

1979 年，右派“改正”后，我先在杭州的大专院校任古代文学教师，20 多年的流离颠沛，阶下之囚居然上讲台为人师表了。久长的学业荒疏，祇得废寝忘餐的阅读、钻研，几年的教书生涯，居然能够教学相长。

到 1984 年 12 月底，《风景名胜》杂志社创办，人手甚缺，在友人王翼奇的推荐下，我遂进入杂志社任编辑、记者。这使我从“读万卷书”，转到了“行万里路”的境界。“风景名胜”内容涵盖甚广，包括已开发又再度荒寂的名山大川，即将开发的深山老林、边陲、沙漠，涉及建筑学、宗教、绘画、音乐、书法、规划、设计、旅游、历史、地理，乃至游记、名作、风俗、人情等等。我在杂志社工作了 10 多年，直到退休。我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尤其是

那些人迹罕至之处，如内蒙古草原，广西、云南边界少数民族区，山东龙须岛“天尽头”，至于五岳名川那更是必修的课程了。我还有自己的兴趣所在，为探求徽州文化，皖南的徽州6县我就访问了10次，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一地我到达5次。在这10多年中，采访、考察，参与各种学术会议，于是接触了各界的学术权威人士，进而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这10多年的实地考察，广泛接触，使我知识大进。这10多年中的另一收获，是我参与了多部正宗辞书的编纂工作，在编纂《浙江省地名志》一书时，我结识了杭州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吕以春，此书编辑时间达3年之久，我得以与他时常见面，互相切磋。1986年5月，我和吕以春共同参与了在浙江舟山沈家门召开的有关浙江省地名志会议，一起在沈家门开会，到朱家尖、普陀山浏览，因此，交谊更深入了一步。在沈家门的3天会议中，吕以春作了“浙江历史、地理沿革”的讲座，将浙江省的地理、历史沿革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论说，使我对他的学问、修养更为敬佩，叹服。他不用讲稿，娓娓而谈，说到地名沿革时，他说中国数千年来的地名变化，区域划分，最频繁、变化最多的是中共建国以后，他认为变化频繁对地名学造成的难度无法估量，他提议要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地名。地名学是一门西方学问，近几10年来才在中国普遍展开。地名学的研究，以杭州大学地理系教授陈桥驿为最先开创者之一，他是全国地名学会的领导，浙江省各县的地名志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多年以来致力颇勤。1986年秋《海盐县地名志》出版，我曾随陈桥驿到海盐县参加评审此书，陈朗也受邀请。陈桥驿的记忆力甚强，他引证史

书、年月，不用查书，随口而谈，他说海盐方志的撰写，在明代以来一直首屈一指，而当时这本地名志也非常精采，他希望能保持这种优秀传统。那次在海盐，我们游历了明末南京名伎董小宛随冒辟疆曾经芳踪及此的南北湖，登临了能观海景“日月同升”的云轴庵，并参观了历经荒废新近修复的蒋氏西涧草堂和海盐传统名园绮园等。吕以春在 50 年代毕业于杭州大学地理系，是陈桥驿的高足，得力助手，1957 年打成右派后，发配到原籍浙江诸暨农村劳动改造，20 多年的苦难，一直待到 70 年代底右派“改正”。落实政策时期，凡为教授威信较高者，可以指名提拔学人，陈桥驿遂指名调吕以春回杭大地理系，作为陈桥驿得力助手，凡陈桥驿的学术研究均离不开吕以春的协助。尤其是对于地名志的涉腊。

1986 年的沈家门会议，陈桥驿主持，吕以春宣讲，众人恭听。会议期间，陈桥驿带领与会者若干人浏览了朱家尖岛，在岛上住了一夜，吃了石斑鱼，又去了普陀山佛国。佛寺均遭“文革”破坏，正在修复中，整个普陀山呈一片大兴土木景象。此次会议前后，赴沈家门路经宁波市，我遇到两件意想不到的事；一是能在阿育王寺通一法师的盛情接待中，有幸看到了秘置于该寺藏经楼的佛骨。藏经楼又是坐关和尚闭关诵经之所在，我在通一法师带领下，扣关、入楼，亲见其启锁、取骨，正值楼外 4 季桂飘香，观看佛骨，崇高之感，油然而生。二是在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竟能登阁观书！天一阁是明范钦私家藏书楼，历经数百年，立下的家规是“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而且“妇女

不得登楼”。在书楼哀怨的传说中，说到一位女子，因慕天一阁防蛀芸草，久闻而不得一见，遂改名绣芸，托媒嫁至范家后，始知妇女不得登楼，抑郁而亡，遗言葬于书楼之旁……。我曾在艺校任教时的学生邬向东，此时正担任天一阁藏书楼馆长，他爱师心切，破例让我登上历代登楼者寥寥数人的天一阁藏书楼，我之侥幸愉悦心情，可以想见。

会议期间所游历的朱家尖，是舟山地区的一个大岛，比普陀山大3倍。早在会议之前，有关方面已决定将朱家尖开发为旅游区，人称“南戴河”。有舟山地名志办公室徐静波携带朱家尖材料，专程到杭州请专家为其若干风景点定名，当时受徐静波敦请的有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正秋，杭大地理系副教授侯慧林与《风景名胜》任编辑的我。我等数人就在徐静波下榻的松木场、八字桥旅社内为朱家尖名胜商讨定名。我对朱家尖该是早已相熟了。

在沈家门会议期间，唯一携带家眷同行的是吕以春，大约是沈家门地近普陀，夫人籍此浏览吧！吕以春在诸暨农村待罪劳动20多年，结婚甚迟，夫人为一农妇，生有二子。在吕以春右派“改正”返城时，她随行抵杭，住杭州体育场路杭大宿舍内。我在沈家门见到的吕夫人，已是年近50岁了，她不幸患高血压、心脏病诸症，脸色苍白，浮肿，她五官端正，一副忠厚相，沉默寡言，怕见生人，与会数日未见她与别人交谈。在抵沈家门3日后，会议中人赴普陀游览驱车赴渡口，车

上座位拥挤，夫人不敢就座，当我为她让座时，杭大侯慧林甚表不屑、不解！回杭后吕以春几番说起，夫人要请我到她家作客，说起夫人曾见我将吃剩的早餐咸菜留存至中饭再吃一事，回家后还谆谆教训孩子，学习我的节俭，可见彼此印象的深刻了。

沈家门会议后，我只身赴温州，路经定海博物馆，瞻仰建于西晋的祖印寺。定海尚有石板路老街，6座避火石拱门，定海老城是明末义士节妇为抗清者的殉难之处，有陈妃投井处（舟山宫井）、李昌达殉难处（留芳路）、刘世勋自刎处、张肯堂殉节处（雪交亭），还有同时死难的将士臣民万余人合葬处（同归域），我一一凭吊……。

从1989年开始，我与吕以春同时编纂《浙江省地名志》，此书由陈桥驿任主编，吕以春任副主编，编委若干人，我为其中之一，吕以春负责全书集稿通稿，从格式、文风，查证实地，统一汇编，要求准确，精密……。全省各地他几乎一一亲临，我则在全书中，负责汇编、撰写园林、文物方面的地名演绎、变动。我相信这一部《浙江地名志》将富有权威性。因为一般辞书的弊病，如《全国名胜辞典》，往往足不出门，纯粹摘录他书，古语说“信书，不如无书”，而吕以春为核实条目，几年以来实地调查，逐条考证。我所编写的条目，也是大都亲临其地，搜集有资料的。

全书经3年努力后，方始于1990年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付梓印行，

此书荣获浙江出版界的出版奖。此书远涉重洋，在地球的角落纽西兰奥克兰市，在奥 大图书馆，在时代文化中心等处书架上竟赫然存在。见到吕以春和我们共同为之辛苦、努力得以出版的《浙江地名志》，见书如见人，倍感亲切！

吕以春在完成《浙江地名志》巨著后，即接着编写《钱塘江志》。钱塘江为浙江最大河流，自西南向东北流向杭州湾入东海，全长 410 公里，流域面积 4.2 万平方公里。钱塘江支流繁多，干流各段名称各异，上流婺源、休宁境内称横江；绩溪境内称扬之江；歙县至淳安、建德（今千岛湖所在），称新安江；衢县 至兰溪称衢江；兰溪至建德称兰江；建德经桐庐至萧山称富春江；其间桐庐段称桐江；萧山至入海口称钱塘江；其间萧山闻家堰至杭州闸口段别称“之江”。全河流 向曲折，故称“浙江”，浙江省名亦由此而来。钱塘江上、中游地势起伏，变化极大，由丛山峻岭山地而经丘陵，钱江入海处，口广内狭，巨流滔天，万马奔腾，形 成中外闻名的“钱江潮”。吕以春为撰写《钱塘江志》，他走遍了 4 万 2000 平方公里的流域区，他一直到达婺源钱江滥觞处及绩溪丛林密布的三太子都。他曾对 我不无感慨地说，越考察水文，越对酈道元的《水经注》佩服得五体投地，浙江千百条支流，《水经注》竟明白无误地指出它的最初发源地（三太子都）！

吕以春孜孜不倦于学术之研究，实实在在，不为名利，他非常珍惜右派“改正”后不多的工作机会，他的身影出没在山山水水之间，他的

背后，有一位沉默寡言，节俭勤劳的夫人，她不一定能理解他的学术价值，但她用病弱之身支撑了全部家务，吕以春得以全心全意沉浸于工作。我去国来纽已经 3 年，未知他的巨著完成否？未知夫人病体再能支撑家务，默默奉献否？

李衍德 小赖

70 年代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告结束，至 80 年代间，知识份子惊魂甫定，又逐渐恢复了文化生活，各类学术会议在全国各地相继得到开展。开会的时间，常常是定在天气温和的春秋两季，有时会议多了，若不事先适当安排，就会重叠、冲突，则感到应接不暇。这类会议除研讨学术外，也是中国穷知识份子借此获得公假、公款而达到“以文会友”的机会，不亦乐乎！

1986 年春，我在《风景名胜》杂志社任编辑，5 月份有两个会议需要参加：一为在浙江镇海召开，以地理学家、《水经注》研究权威陈桥驿教授为主编的《浙江地名志》编纂会议；二为在温州市召开的全国园林会议。两会时间挨得很紧，交通又不便，我以最经济的时间与最合理的路线作了安排，得以先后参加了这两个会议。在镇海会议期间，与会者大都是地理学家、测绘学家，除陈桥驿教授外，还有

《钱塘江流域志》的作者吕以春，杭州大学地理学副教授侯慧璘等人。

与会期间，对《浙江地名志》撰写作了分工，我担任了编委，负责撰写浙江省文物、园林、名胜古迹条目。并安排时间，一起考察了舟山佛地，及准备开发的处女岛朱家尖为其各风景点命名。会后，我在独自赴温州之前，考察了定海明一代的抗倭遗址，与南明鲁王监国时期的多处遗迹，凭吊了死于殉明国难的万人冢，与陈皇后殉节的死难井。可惜限于时间，竟未能一吊张苍水兵败后栖止遭捕的悬壘岛！紧接着赴温州，参加了全国园林会议。这次与会的专家学者有百人之多，来自全国各地，如北京陈俊瑜，上海丁文魁，广州刘管平，南京朱有玠等。朱有玠所设计的济南趵突泉、李清照纪念馆建筑群，使他获得建设部授予的唯一的园林建筑大师之称。

在会期间各家题字赠东道主留念时，我作的雁荡山花诗，因朱有玠擅书法，由他书写，诗中有“静处岩阿岂逞奇，托根白石抱幽姿”句，甚得朱有玠赞赏！及会议结束，我们即成了忘年交，保持以后通讯若干年之久。此次会议为期计6天，前3天在温州市，听取了多次学术交流报告，并集体游历了开发不久的永嘉楠溪江。我还忙中偷闲，访问了温州友人沈沉，探望了重病中的吴鹭山先生（此次竟成永诀）。后3天会议继续在我老家乐清雁荡山召开，住灵峰饭店，众人游历了灵岩、灵峰、大小龙湫，及不亚于四川剑门的显圣门与南合明章纶公故第、牌坊、墓园。我还与上海《园林》杂志总编柏梁真，湖南园林学院沙教授等3人，登上龙湫背东侧道松洞。这是我母出阁前故

居，我父曾偕新娘回门，祖父莲波先生、三伯父一鸣均曾登临。可惜经过“文革”的洗礼，凡屋宇楼阁等已涤荡殆尽，如今祇是洞内泉水依然清冽，站在洞口仍能远眺瑞鹿峰及 39 盘芙蓉岭耳！

会议圆满结束，皆大欢喜。这类会议有一个特色，要经过数日的盘桓、接触，到会议结束时，来自各地的新友方才开始熟悉，分离时均感依依，而且一次会议总能结识一、二个终生好友。就在那顿最后的告别晚餐上，不知是谁在饭桌上对我说，苏州园林局李衍德也是右派过来的，过去也吃尽了苦头。我立即离席找他，李衍德与我同样的激动，我俩紧紧握手，竟一言不能发，当时喝下的酒都成了泪，模糊了眼睛。大家建议为我们摄影留念。华灯已上，然暮色苍茫，我俩就在饭厅外 灵鹫峰下，握着手，留了影。李衍德身材高挑，人物轩昂，热情洋溢！从此分别以后，若干年来，通讯不绝，他几乎在每封信中都邀请我去苏州，说他将安排一切，不作泛泛之游历，每封信上都有他夫人对我的问候。他说，他把我俩的友谊讲述给夫人听，夫人也极希望能见到我。他说他的夫人贤淑、体贴，最可贵的是不但在患难时没有离开他，而给予他支持、鼓励，陪伴他走过那段辛酸屈辱的日子。他赞誉说，他有一位最好的夫人。此外，说夫人还能烧一手苏式佳肴……。苏州离杭州太近了，以前曾去过多次，竟一直未能践约，也没机会尝到李夫人的脍炙。

约在 1993 年秋一个周末，大雨倾盆，我独在杭州见仁里家中，敲

门进来了一个陌生青年，衣衫褴褛，浑身湿透，祇带一个小包，他向我鞠躬，递上老友 李衍德一封介绍信。他是从苏州坐了 12 个小时的夜航船来杭州的。我让他洗澡，换上陈朗的旧衣，吃饭。综合李衍德的信与他的口述，得知他是四川人，毕业于四川某地区师范学院，学历史的，曾任中学教师 2 年，在“64”学运中参与其事，后期遭到开除公职处分，并且妻子与他离了婚。他一无牵挂，响往苏杭的文化，于是像李白一样，仗剑去国，听着两岸啼不住的猿声，顺流而东！他先到了苏州，觉得并非如想像中的天堂，他祇能在农民的菜地里劳动，参与最繁重吃力的搪瓷厂劳动，糊口。当在铁路上打工时受伤，遂失业，几乎路毙。此时偶然遇到了李衍德，李衍德为他解囊相助，介绍工作，而且在得知他很想转到杭州谋生时，为他买了船票，给我写了请求帮助新友的介绍信。四川青年姓赖，身材矮壮，五官粗犷而端正，毫无书卷气。小赖说，他身边祇有两角钱，若到杭州找不到我，他想在岳坟自杀！他之所以响往杭州是因为它有岳飞、秋瑾、沙孟海等伟人（从古人到今人）。他说他休整一段时期后，准备报考研究生。但是他却不考虑，当夜住哪里？将在哪里吃饭？他还在小包中掏出数张揉皱了的写着新潮的、无章法的字画，说在四川某地他的书法曾得过奖！我无法留宿他，但是有李衍德的介绍信，我也不能不管他，我得考虑安置他一个妥善的地方，有睡、有吃，无户籍之忧！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去处：杭州玉皇山后山，南星桥近处的栖云山，那里有一个栖云古寺，近人徐映璞所著《杭州地理志》中有篇《栖云山志》，记述其历史甚详，此处为元代曲家贯云石酸斋所居地，其

地与南宋故宫御花园一墙之隔，寺边残余宋代宫墙遗址。因其地偏僻，寺名不显，我和我哥昌米嫌憎灵隐寺、净慈寺已成闹市，而无栖云山之幽静，寺内泉水甘冽堪可冲茶，能避俗尘，能取一日之清静。且主持广忍法师，松江老衲，慈眉善目，有古风，通佛学，待我兄妹如佛印之待东坡居士，每到寺中，必待以素斋、果浆，且于大殿圆桌铺以纸笔，任我哥淋漓挥洒。那年陈朗从北京来，曾到寺，也为他题诗、写字（有“为问酸斋今曷在，人间戏剧正纷纭”句），并在那里享素斋。我戏谑说，和尚持钵，口吃四方，我们吃和尚的，可谓吃八方了。眼前这个四川小赖，我祇能效仿《水浒》赵员外剃度鲁达将其送往五台山那样，送到栖云山广忍法师处了。不料小赖得知可进寺院，暂度难关，说很愿意，说进寺院就是他多年的心愿。

杭州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褚树青，青年有为，也是广忍法师的文字交并忘年交。我打电话请他与我一道将此人护送上山。我为小赖打点了些四季衣裤，不同于赵员外的是没有重礼，而赠与小赖《杜诗释读》二册，纸笔若干。大雨仍然如注，我们3人几度转车，然后跋涉在野草没径、林木幽深的山径上……。广忍法师碍于我俩情面，慈悲为怀，收留了小赖，让他在西厢房下榻。栖云寺尚未按装电灯，是以蜡烛照明的。小赖终于能在当夜有了吃住的地方。

小赖在寺中，种菜，接待香客，还算勤勉。我和树青也常常探视他，他对我俩口称“恩人”。他没有吃狗肉、打小和尚，我们放了心。广忍

法师甚善待他，凡他工作必给报酬，而膳宿是供给的。半年以后，他终于得到一位香客的帮助，进了浙江大学图书馆工作，假日仍回栖云寺。他将栖云山看成娘家了。

至于李衍德，我在诸事安排就绪后，给他打了电话。他不胜感激，不胜抱歉，不胜抱愧，说他也并不了解小赖其人，祇是出于同情，说给我这个老友添麻烦了，再次抱歉！

我若回中国度假，一定要到苏州看看李衍德，尝尝贤夫人的佳肴。四川小赖历经磨难，应该成熟些了，未知他念上研究生否？

大洋远隔，遥致祝福。

“右派情踪”（十四）

（新西兰）周素子

叶知秋

叶知秋是一位资深的内科西医，1957年反右前夕，在杭州市第一

医院任职，他是我杭州师范同学张冰如家的房客。50 年代初，我和冰如都是 10 几岁 的青年学子，而叶知秋已有 30 多岁了，已有家室，有子女。在我们眼里，他是个中年人，为我们长辈。张冰如的家那时住在南山路东侧南城脚下荷花池头 24 号。而我们就读的杭州师范就在南山路上（1956 年迁址到杭州文 3 街），从学校到她家，步行祇须 5、6 分钟。当时的杭州师范学校学生一律住校，家在杭州的学生 祇能在星期六晚上方可回家睡觉，外地学生夜间则不得离校。平时在晚饭后自修前，可出校门在附近散步，我随冰如常在傍晚散步时间内到荷花池头她家玩玩。

在冰如家里偶而见到叶医师的一家人。叶医师中等个子，面色黝黑，性格外向，健谈。他虽与冰如年龄悬殊，但彼此具有很好的友谊。后来他两家都先后搬离了荷花池头，虽彼此生活变迁较大，但一直互通音问，有来往。

我自被打成右派以后，生活一直动荡，流离颠沛，不遑安处，然祇要有机会回杭州，我总能够与老同学张冰如会面。在怀孕三幼时，有一段时间，我还居住 过她家。在冰如口中我得知叶医师的情况：他也被打成右派了！不知受何等处分，祇知离开了市第一医院，曾否下乡吃苦，未听冰如说起。60 年代中期，我自兰州 回杭，曾随冰如到闹市口看望过叶医师，他在闹市口租有一间简陋的门面室，开设小儿科诊所，这所小诊所属于街道办事处，总之不可能自由自在，叶医师

已经沦落 在市井糊口了。好在他有医术，不然也得务农劳作。闹市口在清代旗下营的营门口外，南城墙根，为小市民聚居的陋巷所在，民居建筑简陋，都是木板房黑瓦二层（下层作小生意用），东倒西歪的。叶医师全家蜗居在此。不复有大医院医生的风范了。据说有些原市医院的老病号仍然愿到这陋巷里找他诊治。在闹市口再见到叶 医师，黝黑的脸上透出灰色，神情忧郁，无复当年舒展，当他得知我亦被打成右派自西北暂归时，相对黯然。他没有谈自己的经历，倒是谈了市第一医院反右斗争时 的一位女医师打成右派的啼笑皆非之事。说当时内科某室有 10 多位医师，按照产生右派比例指标，必须在此 10 多人中“揪”出一个右派，但大家平日都兢兢业 业，未见有反动言行，出身阶级成份则相差无几，彼此关系也极融洽，谁是右派？商量结果决定以抽签、抓阄方式来定夺，谁抓到了祇能自认晦气，不怨别人。结果 一位姓王的女医师抽抓到了，这一个小小的纸团就无情的注定了她的一生命运，并使她永世不得翻身，且殃及子孙。等到 80 年代后期，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友人 戴大勇任院长的湖滨医院里见到了这位吃尽苦头、鬓发斑白、侥幸存活、长相忠厚的女王大夫，感慨系之，那是后话。在闹市口与叶医师匆匆一面之后，再要等到 80 年代中期，彼此都恢复工作几年后，才再见到他，而且与他成为忘年交，比起冰如与他的关系更进了一步，因为我们不仅是旧相识、同命运，还都是诗友。90 年代后，他还荣任杭州民间成立最早的西湖诗社社长，我则附骥任诗社常务理事，西湖诗社社刊《西湖吟草》编审。在一年之中，我们有几次会议、活动，出刊时一 起选诗、编诗、校

对、出版，还为设计封面运筹，请名家品题，煞有介事。每次活动，社长都备有茶点招待。西湖诗社成立已有很多年了，该社几乎包容了杭州新老 诗词爱好者百十人，还与台湾某诗社结为姐妹社，互相交流切磋，常在寺院、湖山胜处集体遨游、聚餐。1992 年初春，诗社有灵峰探梅之举，灵峰在灵隐北边青 芝坞中，灵峰古寺始建于五代，盛于明清，最终毁于 1958 年大炼钢铁运动，旧寺院大殿等夷为平地，建筑木材一律拆为炼钢燃料。到 90 年代初才在废墟上新建 茶室，恢复部份楼阁。我有《花心动》词记此次活动：

辛未初春与诗友探梅灵峰

一径青芝，初雪霁，迎来恁多诗侣。

掬月泉（泉名）开， 笼月楼（楼名）新，都是昔时幽处。

孤山招得冰魂在，问瘦影、可还如故？尽先后、分题拈韵，相寻佳句。

耐得霜寒若许。

想此日山间，垂锄荒圃。

公子情多（清季灵峰最初植梅者莲溪公子），衲子缘深（灵峰寺住持墨真法师），曾使蕊芳先吐。

兵戎过也余无几，尚须仗、词人修补（清末湖州周庆云曾补种梅花）。

沉吟久，难摩眼前万树。

此词甚得叶知秋诗人激赏。可惜的是，叶知秋的诗作在我的行囊中未曾携带，否则可抄录一、二首于此。

叶知秋除诗社逸事外，在退休以后，主要精力是创办前进医学学校，他荣任校长，这是一所专门提高各在职医师的业务水平，为业余学校，敦聘当代名医名教授来校讲课，因叶知秋与当代医学界名医、名教授都有交谊。以他的名望，有请必应。因此前进医学学校办得极为出色，闻名国际。叶知秋不但是医生，又是诗人，所以他广交文人学士，又是多家名教授专家的家庭“御医”，如一代书法家沙孟海、包稚颐夫妇，一代词宗夏承焘、吴无闻夫妇，病无大小，均请叶知秋诊治。再如杭大教授郑晓沧先生，亦专请叶医师诊治。郑晓沧为名教育家，诗词高手，喜读历代奇女子传，平日最关注者为北宋李师师及明崇祯帝田贵妃的事迹。老年以轮椅代步，喜与我辈交谈……

按理在右派“改正”后，叶医师该学有所用，老而弥笃，可与诗友遨游，可与学者交流，心情欢畅，但是叶医师有其家庭苦衷。叶医师夫人，原是他早年任教于护士学校时的学生，美而淑，生有子女多人，在叶知秋打成右派的20多年中，她不但没有离开他，而且含辛茹苦，操持家务，相将扶持，是位贤妻良母。她年轻时住在冰如家中，我们见面并不多，1952年，张冰如父亲去世，当时寻常百姓家尚无电话装置，乃由叶夫人承担代张母通知其亲朋的任务。叶夫人雇了黄包车，到处奔波。那日我在湖滨见到她刚从黄包车上下来，穿一袭蓝布

旗袍，面色洁白如玉，身材修短合度，和我匆匆交谈了两句，但给我的印象至深。她在 45 岁以后的妇女更年期中，大约是平生所受刺激过多，忧虑过甚之故吧，精神变态失常、多疑，处处防范、管制叶医师，怀疑这个与她朝夕相处、年届 70 岁的丈夫有外遇，捕风捉影，到处追踪，使双方的精神都极为痛苦，而且无药可疗。许多女士有事也不敢往叶医师府上，怕惹来是非。

在我来纽前夕，叶医师与我另一友人金怡至我家话别，坐不多时，夫人即来电话催他回家，接着每几分钟就一个电话，令叶医师坐不安席。但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叶医师不喜夫人管束，又为什么向夫人告知去向，并告以友人的电话号码呢？不是咎由自取吗？我把这话问了叶医师，他不能回答。

刘炼虹

刘炼虹是一个创作丰富、号召力甚强的新诗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后方一带即负盛名。当时西南联大一批大学生，对他都很崇拜。我们在兰州时的右派朋友高天白抗战时在西南联大读书，即是他的崇拜者之一，而且他们的友谊也始于那时，至今达半个世纪之久了。当时为激励士气，刘炼虹辗转于大后方，以诗歌朗诵的形式作不懈

的宣传。他忧国忧民，写作不息，热情奔放，如果不是 1957 年反右斗争，使他历尽磨难，煎熬 20 多年，从此在文坛上消失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大诗人的。

刘炼虹是浙江诸暨人，1957 年反右整风时，在杭州文化界被打成的右派，我于 1968 年因陈朗往青海边陲待罪，只得携带 3 孩自兰州回杭郊谋生，我与刘炼虹虽同住杭州范围内，可是从无机缘结识。直到 1980 年，即右派“改正”的次年，高天白获得右派“改正”后，在甘肃京剧团任编剧，因公差至京、沪、杭一带，在京探访了陈朗，在杭州访问他 40 年代的战友、诗友刘炼虹时，再约同刘炼虹到武林路阁楼我的居处访问于我。非常遗憾的是我适公差赴外地，竟与阔隔 10 多年的患难朋友，失之交臂，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至于刘炼虹在高天白返兰州后，他仍然到阁楼来访我。他在高天白口中，得知我的性格与爱好，并知道我在兰州“文革”期间所遭遇的非人折磨，深为同情，还有我们共同的右派命运，以及刘炼虹长者的关切风度，使我俩成为好友、忘年交。刘炼虹比我年长 10 几岁，初见我时，已经退休，但在他身上的那股创作热情，连年轻人也往往不及，创作就是他的生命源泉。他每来我家，不但谈他自己的新作，总还是鼓励我、鞭策我，让我不要虚度年华，务必珍惜时间，弥补失去的岁月。刘炼虹的鼓励正如他的朗诵诗一般有力，使人有一种紧迫感，我常有愧对刘炼虹的诚意之感。他很欣赏我的旧体诗，曾带给

北京大右派诗人草明看过，据他说草明对我的诗词非常赞赏，刘炼虹在我面前不止一次提到草明对我的赞许，似乎比我自己还要看重，他于是又希望我写出更多更好的诗作来，如此关切别人的成就，确实是我朋友中唯一的一个。

刘炼虹的诗属于朗诵诗流派，在 80 年代后期，他在各地纷纷举行“刘炼虹诗歌朗诵会”，他还是热情澎湃，与台下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年龄的隔阂。有些县城会场上临时停电，即由汽油灯替代，继续朗诵，会后，由他签名的诗集，很是畅销。

1986 年左右，陈朗自北京来，我们曾到刘炼虹居处拜访过他，他外出未归，夫人接待了我们，即使年近 60，还犹存当年西南联大校花的风韵，夫人不断向我们诉说居住窄狭潮湿、身体有病，还不无羡慕地说到艾青夫人居然也写诗，稿酬还颇丰哩……。刘炼虹自 50 年代打成右派以来，居处一直简陋，当时我们造访的黄龙洞左近陋居，在西湖北山北麓，与省昆剧团宿舍毗邻，是一座水泥二层楼建筑，刘炼虹家在底层，此屋中间一条走廊，两边各为房间，房门隔走廊相对而开，走廊上堆满破旧杂物及炊具煤炉等，拥挤不堪、光线阴暗，二层楼居住有 10 多户人家。刘炼虹夫妇的卧室也即是书房，室内一无长物，祇有粗糙简单的木桌木床而已。但是他们这座楼房的四周环境却是杭州这个风景城市中的精华所在，左近为道教名观，深藏于茂林修竹间的黄龙洞，观内建筑凡曲廊、亭台，都古朴轩敞，其中

更有珍贵的百年方竹林，且远离闹市，游人稀少。黄龙洞附近有金鼓、银鼓双洞，登山栖霞岭可达紫云洞，在山顶放眼南天可见苏白二堤，湖中 3 岛，西湖全景尽收眼底，顺南坡而下，经黄宾虹纪念馆就是苏堤口的岳武穆庙墓所在了，如此环境，对于刘炼虹的陋居似也可弥补于万一。80 年代中期，他才搬往花园新村新居。

从 80 年代末始，我与刘炼虹常有机会相聚，因我俩都是西湖诗社的常务理事，一年也有若干次雅集、会议等，常常在灵峰喝茶，在静寺吃斋饭。杭州不愧为钱镠吴越、赵构南宋都城的所在，连挑粪荷锄者也有几分书卷气。西湖胜景，历经文人吟咏、结社，极富文化内涵。至近代尚有西泠印社、湖畔诗社等民间社团，即使经过中共“文革”的洗礼，杭州的文人社团还不断涌现，光旧体诗社，即有西湖诗社、之江诗社、钱塘诗社等等。西湖诗社成立于 80 年代初，较诸诗社为早，并最具代表性者，几乎囊括了杭城一地的诸多学者诗人。如周采泉、洛地、吴双连、刘炼虹、张慕槎、张雪风、蒋杏沾等，后期阵营逐渐扩大，加入了王冀奇、徐晓英、方春阳等人。各诗社都印有诗讯、吟草，刊载诗社成员的新作。之江诗社有《之江诗讯》由王漱居题签，32 开本。刘炼虹是新诗作者，晚年才旁及旧体诗的创作。西湖曾与台湾某民间诗社结为姐妹社，90 年代初，在西湖诗社 10 周年庆祝时，于端午节邀台湾诗友同庆，那日假宝俣塔某礼堂同乐，会

中，还由徐晓英女士 弹奏古琴，随后到乐天酒家共进晚餐，宾主都很愉快。

刘炼虹每次来参加会议，见到我仍然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写作，他常带来一些在外地朗诵诗会的照片，或刊登他诗作、宣传他活动的报刊给我看。他仍然活耀、热情、乐观，他还有很多的创作计划及种种行踪安排……。

1993 年秋西湖诗社假省政府 5 号楼农工民主党会议室召开理事会，征询前往台湾旅行一事，让众理事自愿报名，然后申办出境手续，这是台湾姐妹诗社 对西湖诗社的回请。刘炼虹非常高兴，他对宝岛之行向往已久，他表示一定应邀前去。谁能料到这一次聚会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一周以后，消息传来，刘炼虹猝 亡于脑溢血。刘炼虹的生活习惯是每晚看电视后开始写作，那一晚夫人早睡，一觉醒来，瞥见客厅中灯火尚明，原来是电视荧屏的闪光，刘炼虹此时已溘然逝于洗手间了，一个充满热情，永不知生命将止正在施展抱负的诗人，就这样在憧憬中，在期望中离我们而去了。

徐规 林正秋

徐规是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宋史的专家，平生著述甚丰，且桃李满天下，虽然在划为右派后，生活坎坷曲折，但人们对他的尊重，并没有因为政治遭遇而稍减。

我认识他时，已是 1990 年左右，在他 60 多岁的晚年时，那是在一次研讨宋代《梦溪笔谈》作者沈括的会议上，参加会议的各部门专家、学者约有 2、30 人，祇有徐规留给我的印象最深。我当时在杭州《风景名胜》杂志社任编辑，有幸被邀出席此会。当时在余杭安溪附近发掘沈括家族墓园，为研究沈括生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然墓园规模宏大，似与沈括的贫寒身世相去甚远，有许多疑点。历史上记载沈括故里为钱塘人，晚年居江苏镇江洴溪，他的“梦溪”应该是梦的洴溪，可能也有梦安溪的成份吧！安溪在古运河边上，古人在以舟楫为交通的年代里，安溪应该是繁华的所在，沈括后来的活动，都是在江浙一带水网上。他的成就不 仅在于文学，最主要的是在于科学。研讨会上的有关沈括资料中，附有发掘墓园复原图、安溪位置图、沈括年谱及其行踪考证等等，会上通过反复的论证、阐明，对 沈括的一生成就、行迹等确实有了系统的认识。

参加会议的学者中有宋史专家林正秋，他即是徐规在杭州大学的高足，毕业后亦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侧重于南宋史的研究。我早于 1986 年即结识于 他，是为给浙江舟山普陀区的朱家尖岛上诸多景点命名，我和他同时为定海地名办公室所邀请，参与定名者。我当时反

对“开放”风景点的观点，甚受林正秋的重视，我以为野蛮的“开发”，往往杀鸡取卵，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在我国人口众多的土地上，已留有不多的处女地了，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保留这些地方……，那时的林正秋尚未成名，他的《南宋临安考》草稿刚刚脱稿，就在那次的小型会议上，他送我一册 16 开本的打印手稿本，征求意见，态度很诚恳，他恳切的希望我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谆谆说明著书的重要，后来我常有机会碰到林正秋，他的珍惜时间，著述不止的精神，很令我敬佩。我家住杭州市图书馆古籍部隔壁，古籍部的若干工作人员都是我的熟人，我到古籍部以访友为多，而林正秋前去，总是兢兢业业的查找资料。他的《南宋临安考》正式出版，洋洋 7、80 万言，成为最完整、最系统的临安在南宋时期最翔实史料，可谓锱铢不漏，蔚然大成，遂使林正秋成为南宋临安史专家，后来凡涉及临安宫廷、寺院遗址，至老字号商号、饮食菜谱等，为配合杭州这所旅游城市，都必须找林正秋考证，他频频在电视上露面，连与南宋风景有关的公司、餐馆均聘其为顾问，一时成为风云人物，竟不能稳坐书斋了。虽然有其师必有其徒，但徐规的扎实学问，因为他的生不逢时远不如其徒林正秋的风光。

这一次关于沈括故里之谜的会议，是在杭州西湖北山街杭州饭店礼堂举行的。杭州饭店位于岳坟与西泠桥之间，苏堤口附近，原凤林寺遗址上，此寺早毁于 50 年代前，原寺门前西湖边苍松翠柏下有武松墓、秋瑾墓，西泠桥堍还有宋诗妓苏小小墓，西湖周围及群山中，经

历代经营，无论是真有侠骨或象征性的墓园等何止千百处，如栖霞岭上牛皋墓，孤山东边宋隐伦、诗人林和靖墓，湖西三台山于谦墓，孤山北坡诗妓冯小青墓，近代诗僧苏曼殊墓，西湖南屏山北坡明末张煌言墓，近代革命家、学者章太炎墓，以及辛亥革命志士陶成章等6人墓等等，当然最彪炳历史的是岳武穆岳飞墓。然所有墓园，都因为毛泽东在50年代以来，据西湖南屏汪庄为已有，他不耐烦西湖有那么多历史名人，说了一句“西湖边要那么多死人干什么”，于是一夜之间所有墓园夷为平地，待至文革期间，连民族英雄岳飞，革命志士如章太炎，秋瑾等墓都在所不免，或挖尸迁葬，或弃骨平墓了。至于西湖边的“众多寺院”则早于50年代或被占为军营，或作为仓库、工厂，或经捣毁殆尽了。迨至80年代，百废俱兴，经周恩来总理关怀西湖文化，恢复了部份寺院及墓园，如岳坟、章太炎墓等。《左传》有云“狐爬狐埋”，果然如此！至于杭州饭店前的秋瑾墓则移建于西泠桥东南侧、西泠印社西坡，原墓园废址前侧、湖边则建纪念性“风雨亭”，亭内张挂沙孟海所书秋瑾于绍兴轩亭口临刑前口占“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

此次假杭州饭店礼堂作沈括故里之研究，饭店已改名为“香格里拉”，歌舞升平，与“风雨亭”风貌已极不相称，诸学者在时髦大厅里谈论沈括种种，此情此景令我难忘！林正秋是主要发言人，诸家亦纷纷陈言，众说纷纭，气氛热烈。那日徐规的发言，简短有力，声音宏亮，态度从容，具说服力，极受诸家重视，他必竟是宋史的权威，

但非常可惜的是我手头未有保存他的讲稿。

1995 年初春，我移居纽西兰，每忆及国内学者，常会想起徐规在会议上的风度。非常凑巧的是，我的女儿们有小友名赵旦者，是杭州大学外语系教授赵士钧的女儿，此次她携母来纽，毗邻而居，谈及往事，竟说到在杭州时她家与徐规不但是近邻，而且是多年交往，感情非同一般，他们同住杭大校内宿舍一幢二楼。徐规是浙江温州平阳人，与 40 年代浙大校长竺可桢有师生之谊，以此推测徐规可能毕业于浙江大学（40 年代有文学院）。1957 年他在杭大历史系么史革命份吧？安溪在古运河边上，古人在以舟楫为交通的年代里，安溪任教时被打成右派，30 多岁时才得以与老家平阳县的一个农妇结婚，生有二子一女，由于当时对城市户口的严格控制，徐规家属未能迁居杭城，他与家人始终分居两地，因此作为多年相交的近邻如赵旦一家人，也从未见过徐规夫人，祇知道她不识字，从事最费体力的拉大车苦活。杭州市离平阳县不过数百公里之遥，从杭州去一趟平阳，舟车劳顿得 2、3 天时间，徐规平日在杭任教，祇在寒暑假回平阳故里作家庭团聚，并帮助夫人拉大车，夫人在前面拉，他在后面推，一个大学教授，能如此吃苦，没有架子，于是备受乡人尊重云。

徐规在杭大任教时，所住单身宿舍，祇 12 平方米，室内有一床一桌（三屉课桌），与一个书架。他不自起伙，吃的是食堂饭，总是一

瓯饭一盘菜清苦度日，大有颜回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的风范。他给人的印象是终日手不释卷，他的三屉桌上总放着一支红色圆珠笔，在不停的阅读中笔录中，一发现内容文字错误他即作改正，不论是报纸、教科书，以及名家著述等。赵旦母亲庄赓娟，任教于杭师院附中，连她所用的教科书，徐规发现了书中错误，也以红笔改之，他是怕错误的教材贻误后人吧！

我相信在“文革”中学校停课时，徐规肯定历经下放、改造等体力劳动，能居于 12 平方米的斗室读书，亦应该是后期的事了。徐规穷困，在 7、80 年代 每月工资祇有 50 多元人民币，一部份寄到平阳养家糊口，他自己祇能剩下极少的生活费。赵旦说，杭州夏日大汗淋漓，徐规所穿汗衫，破烂不堪。当他的的大儿子在乡间结婚时，儿媳方面索要衣物，徐规拿不出钱为之购买。在 60 年代物资极为匮乏，赵旦母亲庄赓娟曾往苏州探亲，她有亲戚在苏州皂厂工作，她于是通过关系购回 40 条洗衣皂，背回杭州后，分赠亲友，也给了徐规一条，说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徐规喜爱孩子，即使在专心阅读、写作时亦不厌烦孩子的打扰，从不呵责孩子。赵旦小时，常进到他房内玩，他顾自读书，一任孩子自由玩耍，对赵旦提出的“十万个为什么”，也总是耐心回答。赵旦回忆说，他的耐心真不可思议！他在暇时，常在走廊里看赵旦跳舞，也带赵旦出校门散步，杭大校舍处于南宋时期自宫廷往余杭洞霄宫的

辇道旁，沿途西溪有 108 坞 108 桥，杭大校门正对着西溪第一桥——道古桥。他俩徘徊桥畔，徐爷爷为赵旦讲述南宋西溪史，一起观赏夕照。在赵旦的记忆中，徐爷爷慈祥、博学，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右派情踪”（十五）

（新西兰）周素子

李峰

自 1985 年以来，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是考察全国风景区资源，其间两次赴山海关外的东北。第一次是在 1988 年 4 月，从杭州经北京出山海关到鞍山市 千山风景区；第二次是在 1992 年 8 月，到本溪考察我国最长、流量最大的地下长河本溪水洞，然后经旅大，渡越渤海抵山东蓬莱，绕行山东半岛从济南而南 返。这两次都是独行，漂洋过海，涉水登山，对大好河山充满了赞叹和期许，与杜甫那种“万里悲秋常作客”的情调，毫不相干。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无论从军事防御上，从旅游地理上都不可分隔，而有内在的联系。至于山东一地，几年之内我一共到过 3 次，除饱览海景，登泰山，参观蒲松龄纪念馆、临淄齐景公殉 马坑、孔子闻韶处、荀子稷门讲学处、管

仲墓等胜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外。在这两个半岛间的盘桓，走访了老友，结识了新友，在这些新老相知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千山管理局的办公室主任李峰。

千山在辽宁鞍山市近郊，开发于辽金时代，历经明清，原有香岩寺、祖越寺等古寺院 3108 座，经过抗日战争与土地改革的摧毁，尚余有 10 多座，大小古塔也已所剩无几。千山的植被，在工业发达的鞍山废气烟雾中，尚算保存完好，难能可贵的一块绿洲。森林茂密，茅草丛生，树木以古松为主，其次是椴、柞、楸、核桃、梨、稠李、皂角等。此外，千山有奇峰多座，有海拔 770 公尺的仙人台、玉佛顶及秀丽的五老峰。沟壑深深，湖泊处处，千山的历史、建筑、自然风光，使其成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区，与我国具有传统文化的 5 岳、峨嵋、雁荡、武夷山等属同一珍视范畴！国人在历经“文革”等政治动乱以后，极思有山水之乐，所有风景区都在百废待兴，创造接待游人的条件，但风景区的建设资金却捉襟见肘，国家每年向这些评有级别的风景区拨给不多的款项。当时，千山有一套租建花房、承包饭店等经验，可以自负盈亏不向国家要钱，我的千山之行就是要实地调查，然后将这套经验向全国各地其他风景区介绍、推广。

我抵达千山的时间是 4 月份，在南方早已是莺飞草长的暮春之时了，而东北一带，大地刚刚苏醒，田间祇有早生的青草和稀疏的庄稼。至于千山的这片绿洲，倒是嫩绿新黄，杜鹃遍山了。千山的风景管

理局的职工，领导，几乎全部居住于相距 10 多公里之外的鞍山市，每日趁专车上下班，傍晚下班后，千山除散落的寺院内僧尼外，别无他人，归于宁静。我由于工作关系，主动要求住千山风景区招待所。招待所坐落在山门内右侧，水泥结构，外表结实庄严。大约是一冬未经有人入住了，显得冷落颓败。最令人难堪的是整幢楼房缺水，厕所的粪便都堆积着，无水冲洗，臭气熏人。而我在千山的调查工作，由于千山尚处于混乱中，未能顺利展开，因为千山的寺庙受佛教协会的支持，景区内 10 多座寺院都提出独立经营，脱离千山风景区的领导，包括寺院的门票收入。这本来不是大事，南方雁荡山等处早已实现了，但当时千山管理局刘局长却如临大敌，一脸严肃，他无暇顾及我的采访工作……。其实据我后来得知，所谓成功的千山经验，是建筑在破坏山林、糟蹋文物上的，并不值得介绍，如将停车场建在景区山门内，砍伐了百年老树刺槐、核桃树、稠李，皂角等数百棵；为开发香岩寺，沿途装电线杆砍伐古树如松、楸、柞、核桃等二百多棵；出租地皮，在景区内设立商业点，使千山环境污染严重，山林野蛮砍伐等种种赚钱方式，实在是大大损坏千山的资源，窒息千山的生机的……，但管理局还是指派了一位退休人员、原《千山志》编写者李士杰陪我游历千山，使我得以有机会走遍了千山繁华之处。千山的古松林，其繁茂不下黄山，而高耸过之。千山五老峰比之匡庐五老峰更感突兀、秀丽，主峰仙人台，比我见过的泰山仙人桥，朱家尖仙女跳等都更具洪荒悠远。据李士杰说，千山管理局的历届局长，几乎无一人曾经至后山攀登过此台，连专业导游也找错了地方。这

固然能见出官僚的庸碌，也同时可见仙人台的僻远和陡峭了。

千山的寺庙，一般并不高敞，但都结实而牢固，灰瓦、白墙点缀在丛林之中，另有多处隐伦苦修静坐者的岩阿，显得神秘莫测。

在千山约过了 3、4 天即逢周末，职工均都回鞍山市了。东北的 4 月份，尚不是旅游旺季，我所在的招待所亦空无一人，我计划着下一步的南返行程。百无聊赖中，在山门口碰到了千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李峰，在前几日的与管理局领导层接触中，早已认得李峰。局长“办公室”其实是专为局长服务的机构，下有车队、旅馆等凡送往迎来、派车、买各类机票车票、安排住宿等，都是办公室的事，主任一职，必须是上下圆通，人际关系良好，机灵、精明、略具文采者。听李士杰说起李峰原是沈阳市某文艺单位的干部，1957 年被打成右派后，受尽磨难，下放千山农村务农，阖家迁此，已经多年了。1980 年左右，右派改正，落实政策，他被就地安排工作。李峰灵活，能干，至于如何被安排至千山管理局并当上办公室主任一职就不得而知了，大约是近水楼台吧！李士杰说千山事务千头万绪，除开李峰还无人能胜任哩！

李峰瘦削，黝黑，应该有 50 多岁了，因为是“日理万机”吧！他显得疲劳，周末别的干部都休息了，他还在工作。千山山门外是成片的小商店、点心店，他似乎在巡视，见到了我，遂热情地邀我到他家

做客，我欣然同意，遂随行。在千山山门外向右绕行，过田塍和干涸的小溪，在千山西侧，田野中，有一个孤独、整齐的院落，即是李峰一家生活了多年的农舍。院落围墙由黄土夯成，院门开在正南，大院种满蔬菜，中间是条宽宽的通道，通道两旁是由细竹、细木搭成的葡萄架，葡萄苗秧都一、二尺高了。住屋是3间土房，屋前是大天井，天井与菜圃之间又是葡萄架，天井左侧是井台，用手压机取水……。住屋中间是客厅，有一个大坑，该是冬日延客上座的最舒适处，屋内装有土暖气。这是一个农家，但一望而知不是地道农家，略显有书卷气，与主人精心料理的菜圃，它使人想起陶渊明与隐逸避世的知识份子。我对他的庭园非常钦羡，那一顿晚饭，不是我一个人，而有多位男女客人，有帮他扶持绑扎葡萄架的，有参与做晚饭的。饭前李夫人回来了，她戴一顶草帽，骑着自行车，像鹰一样穿过院子天井直到门前下车。人们说，东北的女人不是很丑就是很美，但美的极少数。李夫人不但很美，而且健康，乡居那么多年，仍然风度优美。李夫人原是文艺单位的舞蹈演员，现在某单位任会计之类职务。右派处理阶段，随李峰下乡务农，在她的眉宇间透露着热情、随和、乐观。李峰将与夫人偕老于此中，但是他的为5斗米折腰的办公室主任一职，与“督邮”并无两样，显得与他的隐居生活极不协调。他俩有一个孔武有力豪爽的儿子，计算年龄应该出生在乡间，据说曾因他与人拔拳相向，使李峰受累不浅哩！

在李峰家这顿晚餐，赛过任何珍馐，也是令我一生难忘的。吃的是

韭菜油饼，将饼浸入菜油中熬煎微黄，趁热狂嚼。至于佐菜，即是刚从院中菜畦里选拔来的青菜幼苗，祇得一、二寸高，据说长高了就不鲜美了，将嫩绿的青菜幼苗，用井水冲洗干净后盛入大盆，蓬松地像座小山丘，蘸以面酱生食之，这么简单，这么可口。宾主融洽欢乐，大家都盘坐厅内坑上，夫人频频添菜、添饼。令我相信，任何地方都有它的美食，即便是没有市井的僻壤。

1992年8月，我第2次到达东北，去本溪考察水洞，这个水洞不论从水量，从长度，以及所生产的无目鱼类，在世界上都称得上奇异，独特。因为行程匆匆未及去千山拜访李峰一家，接着南下抵旅大，渡渤海海峡，登蓬莱阁观田横五百壮士蹈海处，然后绕行山东半岛，游历了威海卫，到荣成天尽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与观赏石岛嵯峨的、充满道教色彩的槎山。无论是蓬莱的仙气、威海的建筑、槎山的神奇。一路行来，最撩人胸臆的还是3年多前千山李峰家的朴素庭园，与那一大盘碧绿的菜苗和香气四溢的油饼的美味。与李峰夫妇邂逅相遇至今已经整整10余年了，别来无恙否？

洛地

洛地是浙江诸暨人，“洛地”是他的笔名，至于他的本姓，连极好的

朋友也不知道，而且他的两个儿子也以“洛”为姓，他对“洛”字，情有独钟。我认识洛地是在80年代初，已落实右派政策，各自有了谋生的工作。陈朗与他同为“戏剧圈子”里的人，故比我早即相熟，他又是我哥昌米的熟人，他的小儿子洛齐跟我哥学习中国画，后来师徒两人曾到过闽浙交界的天姥山写生，感情非同一般。80年代初洛地一家住在杭州吴山南麓南宋皇朝的宋城遗址察院前小巷。一个秋日，我哥约我同访洛地。一次陈朗从北京来，也特与我一起看望过他。吴山南麓一带原是杭州的风水宝地，宋高宗在多位风水师的踏勘后，才定为宫廷大内、皇朝各机构及贵族府邸所在处。背依栖云山、凤凰山、桃花山、将军山、云居山、紫阳山、吴山，面对钱塘江，背山面水。虽历经8、900年，而诸山之南麓处处留有断碑、残碣、花园遗址、假山、雕刻。然自南宋没落至今，凤山门、江干一带的昔日帝皇州、歌舞地，却沦落为杭州最破烂贫困的贫民窟，王气一蹶不振。这不像皖北亳州、涡水流域一带，当你行进在一望无际满地白色的芍药花、紫色的桐花间，会令人感觉到王气未尽，其中或许弥漫着曹操的霸气与老庄的智慧！尽管吴山南麓仍留有苏东坡感化岩、米芾所书“第一山”刻石，以及宝成寺元代密宗麻葛喇佛龕等，但总是透着破败衰落的气象……。那天我随我哥从中山南路转入旧察院前一带时就觉得肮脏得无插足之地。这里是江干区最大的农贸市场，从清晨5、6点钟开始，各路行贩聚集于此，无论水产、蔬菜，千百摊位，万头攒动，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争吵声、寻儿觅女声，此起彼落。早市散后，地上泥泞难堪，随处能见菜皮、鱼肠，垃圾成堆，气味难闻……。洛

地就住在菜场边上一个水泥结构的 3 层楼里，一个狭 窄的套房内。这是江干区群众艺术馆的职工宿舍，因洛地夫人林颖宁在群艺馆工作，是公家分配的住房。这幢楼房，从上楼过通道，至进入洛地的卧房兼书房，整个 感觉就是杂物堵塞、拥挤、窄小，人们须在杂物中侧身而行……。

洛地当时约 50 多岁，青年时代曾毕业于上海音专，终生从事音乐理论工作，后期专攻戏剧及戏剧音乐，1957 年被打成右派，历经下放农村等体力折 磨，后期的具体工作任省昆剧团编剧及音乐创作，协助周传铮、王传淞等整理昆曲唱腔、剧本等。由于洛地的文学基础扎实，博览群书，聪明智慧，他在戏剧界、学 术界颇具声望。

我和我哥昌米不但是昆曲迷，而且自 80 年代以来，一直在为渐趋没落的昆曲事业奔走呼吁，几年来为谋求成立杭州民间的昆曲研究会一事，在陈朗与昆曲界朋友柳以真的参与下，和洛地有了频繁的接触，由昆曲的优美艺术促进了我们的友谊。

昆腔与浙江余姚腔、海盐腔并江西弋阳腔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尚有安徽青阳腔，同属最古老的唱腔，它与后来的秦、川、汉、徽、粤、婺等剧种都属于我国 最典雅古朴的剧种。昆曲艺术是古戏曲的集大成者，它类孕育了京剧并其他剧种，稍有影响的剧种也都多少吸收了昆曲的“养分”。

昆曲盛行于明清时期，乾隆时达到全盛阶段，是全国性的剧种（乾隆时期，徽班逐渐盛行）。此后由于太平天国等农民战争及后来频繁的战乱，以及文化的衰退，阻碍了昆曲艺人的传授，使昆曲断层，渐趋没落。尤其到了近代，昆曲的细腻与典雅渐不为人所重视、欣赏，到了 50 年代初各地的昆曲团体几乎绝迹了。由于浙江昆苏剧团的《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落地正好参与了这出戏的改编，然好景不长，回生乏术，于是乎一批知识份子中的昆曲爱好者们都想保存这些精萃，想使昆曲能像日本歌舞伎、雅乐那样得到国家的保护、重视，不至于消失，绝种，乃在民间组织了昆曲研究社团，定时演出，出刊撰文，如北京曲社（最早的社长为俞平伯）、上海曲社（最早的社长为赵景深），还有天津、南京、苏州等处都有曲社的成立。而杭州、永嘉和长沙等当时都付缺如。自 50 年代晚期以后在全国尚有正式昆剧院团，有北京（北昆）、南京、上海、浙江、永嘉和湖南（湘昆），“文革”以后，80 年代中期，北京方面有以中国剧协柳以真牵头成立的昆曲研究会，柳以真到香港活动，得到许家屯的帮助，募集了数目不少的款项（我哥昌米还为许家屯作画致意），柳以真并邀请北京老诗人卞之琳，戏剧家曹禺等作为顾问，柳以真自任秘书长，我则受柳以真青睐，邀聘为该会副秘书长，这是民间最完整有实力的昆曲研究会了。接着我和我哥昌米为成立杭州曲社开始奔走。初期一起努力筹备的有杭大中文系教授徐朔方、浙江剧协李尧坤、杭州工艺美术学校教务长戈宝栋（翻译家戈宝权胞弟）等人，北京柳以

真则解囊（所募款项）相助，于 1986 年成立，在整个过程中，得到洛地的参与并很多的帮助，我并于 1985 年代表洛地参加上海曲社的成立大会，柳以真亦从北京飞来，胡忌则从南京专程赴沪，该会由上海昆曲院蔡正仁主持，华文漪报幕，堪称盛会。洛地在协助我和我哥的积极筹办中，是真人不露相，起初他还劝阻我兄妹不必化费精力，他虽然热爱昆曲，但他讨厌活跃杭州乃至浙江戏剧界的某个“红人”，他认为我们辛苦了，努力了，但最后必让“红人”摘了“桃子”。我和我哥却认为，祇要成功了，使昆曲能得到发展，我们功成身退，有人摘桃子又何妨？后来事实的结果一如洛地所料，我们也拱手相让了。其实昆曲的衰败与整个时代的文化素质有关，个人的因素又何补于事？至于洛地的正直耿介，他嫉恶如仇，他看不惯、看不起这些投机“红人”，他无法容忍此类作风。

早在 1982 年秋，胡忌自南京到杭州阁楼访我，我设酒洗尘，因洛地与胡忌均为戏剧理论同行，互相知名而未谋面，我遂招洛地同饮。席间，洛地恭问胡忌最近有何创作计划，胡忌打趣道：“小弟久已封笔，祇想玩耍，至于计划是想娶一名扬州瘦马式的小妾！”洛地是一个自爱、勤奋、拘谨的“洛君子”，他从不和玩世不恭的人接触，而胡忌在治史学外，却性格浪漫，平日喜故弄玄虚。这个“见面礼”使洛地非常惊讶而深刻难忘，他俩后来成为好友、密友又当别论。

1989 年春，《徽学通讯》主编方满棠邀请各戏剧史论专家前往屯溪，

观赏屯溪徽剧团的一次特殊演出；这是年前由我介绍，让中央艺术研究院戏剧所的李愚、刘沪生等到屯溪摄录、即将消失的徽剧古调。徽剧团在名演员章其祥安排下，排练了《水淹》、《出猎回猎》（《白兔记》）、《乌盆记》、《打龙棚》等6出戏。方满棠委托我邀请各方人士，苦于时间仓促，我召将飞符，邀请胡忌自南京来，陈朗、三幼（当时她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习）自北京来，杭州方面我则邀请浙江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吴双连与研究员洛地，此外我还带同已在浙江美院任教的二幼前去，让她顺便能到婺源博物馆观摹马远、袁江、郑板桥等画迹的机会。李愚、刘沪生、吴小刚从北京专程赶来录制。我和洛地等从杭州出发，经由临安翻越大昱岭抵达皖南。当新朋旧友相聚于黄山脚下，欢乐可知。我们观徽剧，至祁门渚口考察古建筑居宅号为“一府六县”者，并同上休宁齐云山，所谓“邀游于黄山、白岳间”的白岳，即是齐云山。齐云山为丹霞地貌，道教圣地，历代文人咏齐云山诗者甚多。洛地跛其右腿，居然登上700公尺高的齐云山，虽大呼上当，然心情极为舒畅，这是见到洛地最快乐放松的一次旅游。他对徽剧团提了许多精辟意见，徽剧团演员们认为三生有幸！

因为徽剧中尚包含青阳腔遗响并昆腔成份，而此番演出中，饰演《出猎回猎》中的李三娘、咬脐郎的两位女演员为新秀，大受胡忌、洛地、陈朗等的激赏。

落实右派政策不久，洛地即调浙江省艺术研究所工作，居文三街教

场路艺研所宿舍一幢楼的第4层，3居室。“红学”家周汝昌赠诗有句云：“洛（落）地也能上四楼。”教场路地近马塍路为宋皇室养马所在，同时又为种花所在，南宋词人姜白石墓葬于此。文三街一带原为西溪河渚的起点。西溪、河渚为明清隐伦所居并寺院所在，洛地至此可谓所居非俗了。林夫人颖宁，福州人，为林则徐第六世孙，家藏林氏宝砚、印章。1997年香港回归，国家社科院特访问于她。她的外曾祖父即是溥仪逊帝的老师陈宝琛，可谓出身贵胄了。夫人平生习音乐，于江干区群艺馆从事音乐事业至退休。夫人气度飘逸、高贵，身材娇小玲珑，退休后从事服装设计，曾出版《中老年服装设计》一书，一版再版，并于松木场开设“林家铺子”服装店，给家庭带来丰厚的经济基础。长子洛秦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留学美国。次子洛齐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书法有成。洛地则著书立说，在落实政策后10余年内，所著戏剧史论、音乐史论及词曲专论、小说、文字学等400余万言，而洛地的书房环境为夫人的裁缝工作场，书房内书架、案头上都挂满了布匹衣料。他的电脑就置于缝纫机旁。这并不影响他的著述丰赡。

1993年我的《周素子诗词钞》终于结集出版，由杭州戴维璞老先生毛笔手录，凡各家序跋，书画均由各家亲自毛笔书写，计有南浔吴藕汀，北京林锴、陈朗、南京胡忌、杭州王翼奇、周沧米、洛地等等。洛地所写长序，叙述我右派经历，遭遇甚详，情真意切。所书毛笔字则铁骨苍劲，别具风格。序言中有如“束背带而为行李，望落日

而指征程，手携长女，怀抱幼婴……乞食于市，饮露于野，鬻胼胝以慰嗷嗷；晴披星月，阴栖苍藿，叩毡幕求避雪霜。辞江南之烟霞，历塞北之平沙。暴烈日于料峭，啸北风于草莽。行行重行行，竟然陇西涯……。”后有多位读者来函探询洛地为人者，足见感人至深！洛地长期专致于戏剧史的研究，为戏剧史浙江卷的负责人，去岁我返国探亲，短短的两年分别，洛地即有关于词曲的新着问世，他赠我新书一册。

洛地是我的畏友，我极想将他的身世作一详尽阐述，我曾多次越洋电话，让他提供简历，但洛地顾虑重重，我甚为感慨，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竟还怕谈过去，怕有人“抓辫子”，岂不悲哉！

吴鹭山

吴天五鹭山先生于 1986 年病逝于浙江温州，1986 年的 5 月间，我曾到温州谢池巷先生的寓舍看望过他，想不到当年的 9 月间他即溘逝了。

由于各种因缘，我结识不少的学者，并受过他们的教诲，如陈伯衡、黄宾虹、沙孟海、周采泉、周振甫诸先生。但是与吴先生，总觉得有

一层更深厚的关系。鹭山先生是乐清虹桥人，我们同属一个海隅小县，故里相距祇有 30 公里，还有姻亲关系，他的夫人蒋东帆，与我祖母蒋氏孺人同是一个娘家，他称蒋家蒋叔南 为伯舅，我则称表叔。最感知相同的，我们都是反右运动的受害者。

虽然如此，我得知有鹭山先生，还是要到 1974 年。1950 年后，我在乐清大荆的家属，几乎分散各处，我和谷哥到杭州依二姐，后一直在外地求学，家乡的人事就甚为隔阂了。1960 年，随陈朗谪居西北，70 年代后辗转南返，此时的我哥昌谷，遭文革的厄难，且病体缠身，虽挂职浙江美院，但在家养病韬 晦，祇是私下与许多文友联络，互赠习作。由夏承焘先生及远亲蒋小龙引介，与鹭山先生取得了联系，先生遭丁酉之难后，先是从杭州浙师院免职返里门，后调赴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 3 年，到 1964 即辞归。

多年以来，先生住乐清虹桥埭下，隐居乡曲，这期间，亲自酿酒，籍以自娱。埭下原是先生祖居地，有祖传老屋，在抗战时期先生为了等待夏承焘瞿禅先生 来往，建有“来禅楼”以期待（楼额“来禅楼”三字为请马一浮先生书写）。但是上世纪的 60 年代先生以“待罪”之身已不可能入住老屋，老屋亦应早被没收归为 公有。先生晚年所著的《停云集》，其子思雷在前言中记述此时先生住“埭下渔屋中”，渔屋应是借栖之处，或是他的侄辈为之经营者，现思雷亦于三年前去世，此事无从查问。祇知所居渔屋决非来禅楼，先生在此酿酒、作诗、习字。

东北文史研究所时同事好友西蜀萧湄女士寄赠《南歌子》词有句云：“人生何处不逢辰，底事 鉴湖先自乞闲身。”先生获咎赋闲，凡作诗寄友，均自署“匏老”，即此二字饱含了多少的自谦自嘲之情！“匏”乃匏瓜，即葫芦，葫芦系而不食，就是徒悬。出自《论语 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后人以匏瓜比喻求官不得或不被重用之人。魏王粲的《登楼赋》中也有句“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井渫”是指水井浚治后洁净清彻而饮者无人，与匏瓜之徒悬意义相似，历代失意文人亦常常引用。先生此时以匏老自署，用意非常显然了。

谷哥为我所求先生的手迹，在 1974 年，是其自作的西湖诗之一（署名即为“匏老”）。我特别喜爱其中“珍重埋藏花底藕，明年须汝作芳菲”句。那时 我住杭州武林村阁楼，我将先生字装入镜框，悬于东阁之西壁，日日相对，如对“敬亭山”。先生字体似马一浮，然更具妍秀，数十年的功力，腕底可见。

对鹭山先生心仪 10 余年，于 1985 年夏秋间，始在北京见到了他。先生妹吴闻与夏承焘先生于 1975 年在杭州道古桥结婚，于 80 年代初移居北京朝 内大街，后在团结湖买屋而居，适与我们在团结湖的寓舍相近，我们两家时有来往，常常在饭后信步而往。先生历年体弱多病，不堪南方盛暑，于 1985 年夏到北京其妹家中养病调治。我那时尚在杭州某杂志社任编辑，暑间亦在京度假，自然的和先生兄妹交往

甚为频繁了。那时的夏承焘先生患老年痴呆症，已很深重，既不认得人，连字也不认得了，日日枯坐在南屋书房内一把特为他制作的木椅上，习惯性的手执一卷，但常是倒拿的。吴闻则坐南窗下，为夏先生整理文稿，也算是陪夏先生消此永昼吧！鹭山先生住北屋大房中，一张大书桌置于屋子中间，大约是为了书写方便。客中清闲，常以写字自娱。那年暑期我们请他写了多幅字并整本册页，此册页为散页，回杭州后请西冷印社王金龙师傅精工裱装，这是先生晚年的精品。写的皆属他自作的诗词，所以特别值得珍重。在京期间，先生也时来我们的团结湖寓舍回访。先生面目清秀，神态安祥，谈吐典雅，穿中式对襟布衣，着布鞋，风神闲远，似不食人间烟火，与他交谈真是如沐春风！先生对雁荡有特殊的向往，在京时我们就相约，明年（1986年）同游雁荡，在雁山避暑。

1986年5月间，全国园林会议在永嘉楠溪江和乐清雁荡山两地召开，我作为与会者，并为考察浙江沿海诸名胜古迹，先期经舟山定海，然后至温州，专访先生于谢池巷居所。拟再定今暑雁荡避暑之约。不料吴先生自返鹿城后，一直患病，比去年所见精神差多了。而且双脚浮肿难消，自然无法再往雁荡宴坐龙湫了。但是先生的神思仍然很清晰。此次访先生，承相赠《光风楼诗词外编》一册，为线装新印。没有想到的是此次访先生乃是最后一面。谢邻（承焘先生）逝于当年5月，先于先生仅4个月时间。先生享寿76岁，而谢邻长先生11岁，逝时为87岁。他俩一生挚友，就是离别人世也在同一年中，真是巧

事。先生之逝，当与酒相关。检《光风楼诗词外编》有1985年所作《水调歌头》“乙丑元宵津门望月寄谢邻”词，有“二竖故欺残客，作剧勒停觞”句，句下夫人蒋东帆注云：“勒令戒酒，时作者患酒精性肝脏病变。”先生于1964年从东北初归故里埭下时，有〈小圃晚酌〉诗，内云“但得南黄开口笑，何须北白破愁颜”。南黄谓南方老酒，北白指北方酒。先生自身酿酒，积多年的酒缘，殆以酒伤身乎！

先生逝后，因其钟爱雁荡山水，生前即有埋骨雁荡之愿，经夫人蒋东帆生前多方奔走，始营墓于雁荡二灵之间的游丝峰下。先生夫妇的合葬墓，我于1991年方才见到。我为归葬父母骸骨于雁荡山，经年前多方交涉，此时时机成熟，经择地，最终亦选中雁荡二灵之间的游丝峰石壁上凿龕深藏。我父母骸龕即在鹭山先生墓后崖壁上，相距不出百尺。雁荡山范围60平方公里，因为二灵腹地乃雁荡精华所在，择地于此，侥幸亦巧合也。自此后，年年归扫，及1997与2000年两番自纽西兰归国祭扫，均同时拜谒先生墓。我父与鹭山先生遭际略同，文史爱好亦略同，又是乡谊姻亲，英魂遨游夜话于雁荡二灵之间当不寂寞！鹭山诗人夫妇合葬墓，圆形，拾级而上，中建圆丘，圆丘之上后部高耸石楼一具，内壁嵌墓志一方，志文为苏渊雷先生所撰写。上横额前突似屋木檐嵌“光风楼”三字，为夏承焘（谢邻）手迹，前立墓碑，上书“诗人吴鹭山夫妇墓”。圆丘之上前部墓碑后有石制翻书一卷，覆盖墓顶，甚为别致。

鹭山先生出身名门，幼承家学，加上天资聪颖并好学，在 20 多岁时，先生的学问，已为当时学人推重。然中岁以后，即遭厄运。永嘉著名诗人，原温州图书馆馆长梅雨清（冷生），曾作怀人绝句 10 数首，其一绝云：“投荒万里逐臣心。斫桂人从谪籍寻。苏子吴郎南北雁，天风鸾鹤閤清音。”（首句“投荒万里”，一作“琼楼玉宇”。诗中的苏子指平阳苏渊雷，当代数学家、诗人，原执教华东师大，1957 年划为右派后，调黑龙江师院任教。吴郎指鹭山先生。平阳境内有南雁荡山，乐清境内有北雁荡山，故诗有“南北雁”之谓。“投荒万里”指二人同时被贬东北。

鹭山先生在 20 多岁的壮年时期，在温州谢池巷梅冷生寓结识夏承焘，两人订交成为终生契友。谢池巷传为晋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吟“池塘生春草”之地，夏先生于 1936 年曾买屋谢池巷故自号谢邻，抗日战争时期，二人同游雁荡，住宿经月，并有相偕终老雁荡之志。鹭山先生的好友除夏承焘先生外同时结交梅冷生、徐堇侯、钟钟山、浦江清等学者，抗战时期与避难前来的任铭善（心叔）、蒋礼鸿（云从）均为探讨学问的好友。

先生的一生，因为 1957 年的厄运，使他的事业不得发展，其实以他的才识与诗词造诣均不在夏承焘先生之下。但是夏承焘则以词学泰斗之名誉满世界，鹭山先生的著述甚少面世，则显得落寞，较少为人所闻，盖有幸有不幸也！

50 年代初，先生执教浙师院中文系，当时浙师院尚未迁到金华，校址在杭州钱塘江边的月轮山上，这一段时期应是先生最愉快的时光。先生时为研究生选注杜诗数 10 首，供课余之参考，这些资料竟流传至暨南大学刘大杰教授处，为浦江清所见，极受赞赏，当时浦江清正受人民出版社之托，注释《杜甫诗选》，因请当时亦在浙师院任教的陆维钊教授于中相挽，与鹭山先生合注杜诗。浦江清在北大与鹭山先生向未谋面。二人合注杜诗，遇有疑难，就通信商榷，来往的信札有数 10 通。先生谓浦江清先生喜作长札，如老妪般絮絮不休，这些信件都甚可把玩，并可作为史料保存，可惜大多毁于文革。先生在其《停云录》中有谓：“即此碎金亦尽被雷电取将，为可惜耳。”又说：“文字因缘，非夷所思！”

在现存的吴鹭山先生诗词集并夏承焘先生诗词集及其《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有大量记载二人交游的鸿迹，先是在抗战时期二人同宿雁荡，先生又于虹桥故里筑“来禅楼”以待。后在 40 年代后期同客杭州平湖秋月罗苑，滨西湖而居，一夕与谢邻闲眺，谢邻偶拈二句：“我羡游人泛泛舟。游人羡我水边楼。”先生续之云：“何如人我俱无羡，渺渺烟波点白鸥。”（此诗后被谢邻收载于《天风阁诗集》“西湖杂诗四十四首”中）。50 年代初，先生执教浙师院时，与谢邻、任心叔等都寓居钱江边月轮山之头龙头山上，衡宇相望，可数晨夕，每课暇，天晴时，3 人则同游月轮山，循涧觅谷，杖声锵然，又曾同至六和塔

最高层，凭眺移晷，又曾同登六和塔茶室啜龙井新茶。先生在后来罹难时回忆：“缅怀此乐，如在天上！”任心叔是夏承焘先生的高足，30岁即任大学教授，文字学家，工诗词，博学多闻，在当时甚着声誉，一时文字学专家咸相推许，连马叙伦老先生均叹为畏友。先而被定为“极右”份子，后文革中，与师夏承焘先后罹祸，疑谤株连，不胜辨白而殁。时为1967年。先生有〈闻任心叔讣〉诗二首，其一云：“出处平生最好修。胁肩金马不同俦。可怜竟被才名误，谗口猖獗到骨休。”胁肩金马是指谄媚趋走得意之徒。

鹭山先生对于雁荡、西湖、之江、月轮山，终生有特殊美好的感情，以能游历这些地方终老能埋骨这些地方为最幸事。他在记述老友梅冷生（劲风）晚岁瘫痪，颠连床第时，曾于虹桥过江问候。劲风恍然曰：“龙湫宴坐，此生已无望矣！”先生忆劲风时说：“虽在沈痾，神识未衰。”盖鹭山先生前寄劲风的诗有云“迟翁宴坐亭”句。先生以怀念龙湫是定神不衰的象征！王仲宣有“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之言。真是先生一生与友朋的写照！

先生平生研究陶渊明，著有《读陶丛札》。先生对陶渊明自幼年读书时起，就非常喜爱，心向往之，读《五柳先生传》，读《归去来辞》，都“如疗渴饥”。我以为先生对陶渊明的爱，救治了先生，使他在困境中能自娱，能面对厄运，晚岁归隐乐清虹桥，酿酒自斟，安贫乐道，他应是以渊明自况。即使在虹桥隤下，常有人慕先生高节前来求书。

有西乡陈素行者，曾专程三至虹桥而求字，说“必得数十纸传家方无遗憾”。先生有诗记其事，其中有句“退笔久无伤鵬赋，残年剩有狎鸥心”。我与我哥昌谷亦正于此时向先生求字的。萧湄也时时寄书寄诗以相慰。先生仍然是桃李满天下，他与陶渊明的寄酒为迹，同样都是既洒脱又都有所寄托。

我曾有谒吊鹭山先生诗和词各一首，兹录于下：

丙寅春至鹿城曾一游江心屿同日谒鹭山先生于其寓所不意此次竟成永诀先生埋骨雁山吾双亲墓亦在其旁诗以记之

孤屿迢迢草木标①。故山松竹更萧萧。

梵音久忆东西塔，海气能分日夜潮。

求益几寻灵运宅，问诗肯借水心瓢②。

晓来雨过知多少，洒幕侵灯共寂寥③。

①陆羽文：“日月云霞为天标，山川草木为地标。”

②水心瓢谓叶适。诗瓢见《唐诗纪事》唐球典故。

③杜牧《咏雨》诗：“连云接塞添迢递，洒幕侵灯送寂寥。”

减字木兰花

雁荡铁城障游丝峰吊吴鹭山先生时墓新筑成团湖颯面。

为写长笺并摺扇①。重谒谢池。更赠光风一卷词②。

胸怀冰雪。不道着番成永诀。铁障连城。骨与名山一样清。

①乙丑夏在京团结湖住时，时相过从，承书赠摺扇并条幅多件。

②次年5月谒先生鹿城谢池巷寓，承赠《光风楼诗词》外编一册。

“右派情踪”（十六）

（新西兰）周素子

潘怀素

我与潘怀素老人仅见过一次面，连续谈过近4小时的话。此次见面是蒙夏承焘先生热诚安排的。

夏先生是当代词学泰斗，为杭州大学教授，“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押批斗后，长时冷落在家，蓄须韬晦。所居杭州大学宿舍在西溪18平桥第一桥道古桥边。居处界于留下与城区之间，我当

时在留下村店做工谋生，凡假日进城，必经过先生寓所，常在那里坐谈、逗留。先生既是我哥哥周昌谷的忘年交， 又是我的同乡先辈；我又是先生平生教学在途穷时最末的一个学生，添为“入室”弟子。

那是 1975 年之夏，我在留下，奉读夏承焘先生致书，嘱我于某日到他家与老前辈潘怀素老人见面云。正当盛夏，我身着淡蓝衬衫，蓝灰格子裙，戴一系 黑带的草帽，师母无闻见了，大大赞美我的朝气哩。座间的潘怀素老人，其时 80 多岁，须眉皆白，背微驼，然神情开朗，无龙钟之态，随身带有一只硕大的沉重的 手提箱。他为夏承焘同乡少年朋友，原是某音乐机构的专家，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失去工作，近廿年漫长艰苦的生活中是如何过来的，家庭情况如何皆不及问，通 过见面交谈，知他在这廿年中，孜孜不倦仍于音乐的学理钻研不止，成果累累。在政策稍为松动的今日，他带着他的研究心得，数上北京寻找机会，日则到各部门、 各要人处求见，请求推荐其成果，夜则枕着大手提箱，宿于各车站候车室。他曾找过日本留学时期老同学，当时仍据文化要津、红得发紫的郭沫若帮助。郭看了他的 研究成果，说是“看不懂”，“无法介绍”，就此再没有理会他。

他没有渭滨遇文王的幸运，他以 80 岁的高龄，在寻求知音，寻找继承人。他此次来杭，一是知道法国蓬皮杜要来中国访问将经杭，希望他的研究成果有资 格进入蓬皮杜艺术中心，想找到接近蓬皮杜的机会。另外想在省城物色一个可以承继他事业的学生，以便在撒手西

归时，他的一生心血不至于白费。

夏先生对于潘怀素的研究硕果爱莫能助，但对于他要想找一个学生继承事业一则，立刻想到了我。我原先是学音乐的，反右前在福建师大音乐系学习。夏先生觉得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既可代潘物色到人，又可提携我走出困境，找一个出路。我面对着尚在为理想奋斗的中国老知识份子，心中充满尊敬、钦佩又深感辛酸。我们坐在夏先生客厅的小圆桌边，夏先生夫妇外出办事去了。我已经将近廿年脱离音乐，我怕自己听不懂潘怀素先生深奥的音乐理论，故全神贯注，潘先生对我的音乐修养似乎毫不怀疑。他打开手提箱，里面全是文字手稿，研究数据。他边向我宣讲，边展示文字数据。他眉飞色舞地讲了近4个小时，竟毫无倦容。我当时还不到他一半年纪，反觉神情紧张，疲倦起来。其实，潘怀素老人的研究成果，即使4天4夜也讲不完的。那天他和我说的主题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根据研究，他得出中国音乐将是今后世界音乐趋向的领导，他将中国庙堂钟鼓音乐、民间打击乐器、丝竹乐器，所有的音率振动频率数据，加以详细的纪录，归结到亿、万、千位数字。尤其对庙堂钟鼓音乐的纯净、协和程度，他对之十二万分推崇。二是对西方音乐的十二平均律持批判态度。他说西方钢琴即以十二平均律原理创制而成的，用“平均律”的方法就不可能很协调，不协调即不纯。音乐的本质是以协和悦耳为主，“平均”之法，终究不够完美。三是他根据自己求出的音频，发明了以中国最纯美的5音振动频率的钢琴。祇要有机会，有资金，即可投

入制造，进行弹奏。我看了那个纯音钢琴设计图，觉得反而比目前世界通用的十二平均律钢琴键盘来得简单、方便。潘怀素老人用恳切的眼光看着我说，这个钢琴将来就是由你弹奏的，它发生的纯美声音，将会震撼世界……。。如果我的眼泪不是在多年的折磨中枯干了，我一定会落泪！我虽然对千万位数的数字极不敏感，但我能清楚感知5声纯音之美，我应该舍弃一切，跟随老人徜徉在纯美的5声中，为之付出平生精力，也是值得的！记得少年时期，我尚在杭州音乐专科学校学习过，那时上海音乐学院的大哥大姐们特地来我校与我们交朋友，我和殷承宗建立通讯关系，我写信给他说，我恨自己不像莫扎特那样出生在音乐世家里，我为什么不在幼年接触钢琴。后来升学在福建音专被打成右派后，曾痛惜失去了与音乐的关联。可是目前，有这样的机遇，与音乐的缘份重新呈现。一位音乐家，肯把他的成就诚心传赠给我！祇要我愿意。可是现实生活，我有3个未成长、须要抚养的女儿，我不能没有为之活命的那点微薄工资。齐白石的祖母曾告诫孙儿说：“那见文章锅里煮啊！”对于潘怀素老人的诚心，一旦承诺，就要有始有终，我觉得我不可能为之付出一切。我深思后，慎重的说了我的想法。老人非常理解我，赞许我一丝不苟的态度。但他惋惜的说：“你是牛郎，这个事业是织女，隔着一条不能逾越的银河，我愿意作为鹊桥，成全你……。”

道古桥的一面之交，一席之谈，竟是我与潘怀素老人的最后一面。他后来的消息，均是夏先生夫妇告知我的。潘怀素在杭并没有机会见

到蓬皮杜；他后来又自温州上京数次，均求告无门。他与一位崇拜者上海人朱姓女士结了婚。我不了解潘怀素过去的婚姻史，80多岁的老翁因事业的追求而臻结合，算得上“迟开的蔷薇”。约在1980年，在改正落实右派的潮流中，他终于被落实在北京中央民族音乐研究院，他的研究成果，备受重视，视若国宝。姜大公终于遇上“文王”了。他大约歿于1982年左右。

1990年，偶然在我杭州音乐专科学校俞绂棠老师（也是右派）处，得到了潘老先生的一些消息。俞绂棠老师晚年编辑《浙江音乐》并纂修音乐史。在他的材料中，我见到了潘怀素成果的资料，他的成就终于进了“史书”。但遗憾的至今未听说五音纯音钢琴的诞生。中国纯美的音乐是否能如潘怀素所言，将是世界音乐的前驱，是否再有人致力于这一学说的阐发，并付之实践，我期待着。

吴藕汀

当代有关词学的书籍，既富学术价值而又简明、实用的并不多见，其中以龙榆生的《唐宋词格律》和吴藕汀的《词名索引》最为学者所推崇。龙榆生是南京大学教授，久享盛名，人多知之；而吴藕汀，在80年代前则知者甚少，凡报章杂志，迄未有过对他的生平事迹有

所介绍。我们最初也祇是在友人处获得点滴音讯，知道他生性高洁，乡居。《词名索引》之能够问世，是由于施蛰存教授的赏识而推荐给中华书局的，谓此书出版后甚受日本学界的重视，作为彼邦大学文科教材云。我们对吴藕汀先生心仪，非止一日。

1986年3月，春寒料峭，我和陈朗有浙北湖州、南浔、桐乡、嘉兴之行。于湖州，曾叩铁佛寺，谒谭建丞先生；于青、乌镇（属桐乡），寻南宋词人陈与义“简斋读书处”并“三友亭”旧址；于南浔，再访嘉业堂藏书楼（我曾于1985年初访此楼）……。在南浔时，文友陆云于偶然间提及有吴藕汀老先生蛰居南浔，著书自误，但曲高和寡，连他本人也无缘结识云云。南浔不愧为名镇，真乃藏龙卧虎之乡！可惜我和陈朗匆匆间即将离别南浔，亦无由贸然拜见，失之交臂，怅然而返。

两年多之后，1988年秋，在桐乡好友叶瑜荪的提议和相邀之下，我和陈朗再度访南浔，主要目的为拜望吴藕汀先生。到达南浔正是傍晚，下榻嘉业堂旁之小莲庄。不想吴藕汀先生闻说我们之来，竟先下访于小莲庄之双桂楼，从而得见先生神韵，作倾盖之谈！

小莲庄为南浔镇16名园之首，座落于镇南鹈鴂溪上，经清刘锦藻父子3代经营，曾盛极一时，庭园内有宋代“挂瓢池”，有亭台楼阁，游廊轩馆，墙间嵌列名家书法刻石。曾经琴棋书画雅聚，兼极人间

富丽之所。现建筑数百间尚存，而内容全空，显得冷落。有石门（属桐乡）人吴蓬父子寄寓于此，辟有画室，父子二人皆为画家。我们是作为吴氏父子之客人而来借宿的。左近即为嘉业堂藏书楼，书香氤氲，时时袭来，此时此刻亲聆先生之音，真是大快平生！藕汀先生体态丰硕，操吴语，无迂腐气，无俗气，爽朗从容，识见高卓。次日我们即到先生南东街寓所回访。自此拜识后，即与先生通信不绝，并在数年前，3 访藕汀先生于南浔古镇。

南浔古镇属湖州，有 800 年历史，地处杭嘉湖平原北隅，太湖南岸，大运河由此过境，东西苕溪汇合于此，水网密布，古时以水路交通为主，因之北接中原、南通八闽。原来有“七十二桥”，有“开门走桥、推窗见河”之谓，有“七里一相国，十里一阁老”的历史。镇上原有的私家花园多处，虽经废圯，但枯藤老树，颓榭倾廊，仍能想见当年繁华。从明代起，特别到清代，此地商家财力雄厚，以刻书而求留名，有多家藏书楼所刻书均精刻、精校，给南浔的文明推向一个高潮。其中小莲庄庄主刘锦藻于光绪甲午年后，在庄西兴建藏书楼，拓地 20 亩，糜银 12 万两，历时 22 年，购书 60 万卷，曾藏有宋刻 77 种、元刻 78 种、方志 1200 种、丛书 220 余种；并明刻本、抄本、稿本，及大量清人文集、各种诗集等。辛亥革命以后，刘锦藻之子刘承干曾捐巨款为光绪帝陵墓植树，逊帝溥仪为其藏书楼题赠“钦若嘉业”之金匾，所以这一私家藏书楼才称为“嘉业堂”。刘承干博学能文，礼贤下士，赏鉴亦高，常在家供养朝野名流，为之拟定刻书之目，并任

审核校本之职，有如张元济、林琴南等等。并礼遇前来访书之人，供给膳宿。鲁迅也曾至此访书。《4 部丛刊》初编时，嘉业堂曾出借宋刻二种、元刻一种、明刻 5 种，对“海内孤本”，绝无鄙吝之心，实在难得。嘉业堂于 1933 年后没落，1950 年后归公，由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接管。等到吴藕汀先生在嘉业堂整理、编纂图书时，嘉业堂尚存有 20 余万卷书籍，大多为清刻及钞本了。

吴藕汀先生浙江嘉兴人，家学渊源，学养富赡，性格不求闻达，浙江图书馆接管嘉业堂后，先生特受张宗祥馆长之托，遂住入嘉业堂内，专事编辑书目，穷年矻矻，无分昼夜，为时将及 8 年，直至 1957 年后被迫离去。他即在镇之南东街赁屋索居，一住 30 多年。先生从未再入书楼，也从不与人谈书楼的事。而嘉业堂藏书楼因为远离省城，此后曾派有多人前来管理编目，均不堪其寂，也无此功力，屡屡更换人员，藏书也陆续调往杭州孤山省图书馆古籍部，大有盛世难再，人去楼空之慨！

吴藕汀先生在南浔镇南东街所住，蜗居狭窄，即于园内梧桐树下，葺平屋一间，仅 10 多平方米，先生名其室为“画牛阁”。先生生肖属牛？推崇牛之祇知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似老牛反刍回顾平生？先生虽善画，山水、花卉、草虫不论，但似不以画牛专擅。到底这斋名的来历、内涵为何，惜未及请教。室外阶前，种兰 10 余盆，室内图书插架，一榻、一桌，案头置细菖蒲一瓿，茂盛、油绿。西墙上悬匾

“画牛阁”3字，为王遽常先生手笔，署年“戊子”，戊子为1948年，距我们访问已40年了。床头壁间悬故妻放大玉照一帧，饰以黑镜框。夫人于何时仙逝，不得而知。照中但见体态微丰，穿旗袍，绒线外套，立于窗前花下，秀发微曲，似30年代仕女装束，雍容淑静，一室母范。玉照下方先生自题有“青衫湿透”4字。先生此时年近80，犹老泪澜干！联系“画牛阁”匾，我们后来似有所悟：是否在运用“牛衣对泣”之典？想来先生中年夫妇定有一段非常辛酸的经历，以致遗恨到今，我们更不便多问了。

夫人嘉兴王氏，出身旧大家，父亲王迈常，叔父王遽常，均是当代极有名望和成就的文史学者，王遽常且为书法大家，章草成就，当代无人能企及，被号称第一家。

藕汀先生于词学外，于词创作、书法、绘画均有极深造诣，在画上，山水如石涛、石溪而简率过之，花卉介乎虚谷、赵之谦之间。书法从篆入草，任笔点染，然天趣独具。无论书画，格调高古，阳春白雪。先生能七弦琴，然久不弹此调，已将所藏古琴赠与后学石门吴丑禅，丑禅珍之、宝之，遂改其斋名“落花满枕室”为“眠琴堂”！

藕汀先生先后赠我们山水大小幅与扇面多件，更有装裱成册山水册页10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先曾特为陈朗作《西海填词图》，并以词代序书写《霓裳中序第一》见寄；后又为我之《周素子诗词

钞》作《素子女史填词图》，画面为一枯树下，茅舍中，有高髻宽服之二人对坐，出之简笔，萧疏有致。更以词代序，题“玉楼春”一阕，词曰：绝塞苦吟西海道。博涉庄骚深窈窕。多风多雨不知愁，伉俪情浓同管赵。披锦烂如飞凤藻。万里浪游存此稿。尽教遣此有涯生，喜见新声留木枣。

词后署“吴藕汀拜题时年八十有一”。“管赵”（管夫人道升、赵孟俯）实不敢克当，不过赵孟俯为湖州人，今湖州有他的莲庄遗址，刘锦藻正是企慕赵孟俯而给自己的园起名为小莲庄的，这倒有点本地色彩，且可回赠吴先生伉俪。“有涯生”，用清代词人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语。

2000年9月，我和陈朗由纽西兰返国，又专程访藕汀先生于嘉兴。是日瑜荪自桐乡驱车来杭州相接，我们再偕同陈朗之弟陈诒，再约会乍浦顾国华兄，在藕汀先生的新居书房相会。先生幼子小汀亦在座，叙谈别后种种，摄影留念。不料此次竟与先生成永别。

藕汀先生幼子小汀，奉父至孝，工作之余，趋庭问字，积若干年功力，自成一家。近日接顾国华信，报告文坛讯息，谓吴氏父子于“画牛阁”中着成《词调名辞典》一书，正谋出版中，国华兄誉此书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作。

（《词调名辞典》已于 2005 年 9 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吴藕汀先生犹于嘉兴新寓弥留之际得见此书之样本。）

【附】

寄吴藕汀先生南林并乞画四首

1987 年 陈朗

陈迹原堪入画图，前朝人物貌清臞。

浔溪水与姚江水，啼遍当时两鹧鸪。

（南浔董说若雨，号鹧鸪生；余姚黄宗炎晦木，人称鹧鸪先生。二人皆明遗民。又南浔有鹧鸪溪遗迹可寻。）

笔墨相看似石溪。落题字更见清奇。

（藕老曾为友人文韵作《花山题壁图》，自题[迈陂塘]词于上，字画皆精妙。）

新安大贾今多少，拟向庵前问董斯。

（董若雨《楸花砚随笔》谓“先借庵先生每品题翰墨，提着‘新安大贾’4字作书苑伧父目”。按借庵先生乃若雨父斯张也。）

花山图至起沉痾，追念先时乐事多。

为问小莲庄畔客，眼前可肯写新荷。

丰草庵前草不磨，迩来词客意如何。

频年我亦西溪客，犹忆春时踏雨过。

（若雨诗多有涉西溪客者。颇疑此一西溪客，即黄晦木。予有说。西溪在杭州西湖之西北。丰草庵为若雨为僧后屏迹之所。）

夜宿南林小莲庄于吴氏父子蓬丑禅所寓双桂楼与诸友倾谈吴藕汀先生闻讯先下访次日为吴氏父子书此

1987 年 陈朗

昨夜桂华趁瓦流，满阶黄叶听余秋。

欣逢野士留双斧，难得高朋共一楼。

人物品题多不忌，故书扃闭况无求。

感他瓢响先移屐，幽阁先生善画牛。

（小莲庄有挂瓢池。吴藕老南东街寓斋题“画牛阁”3 字，匾乃戊子年王蘧常先生所书。）

程十发

程十发是我哥周昌谷的同时代人，大约生于 1925 年左右，50 年代间在画界即负盛名。他是松江人，是上海最古老的华亭县世家子，松江古称“云 间”，他在画上常署“云间程十发”。他的人物画以张条流畅著称，着色甚简，摆脱艳俗，但仍不失世家书卷气，书法自宋徽宗瘦金体脱胎，然而自如挥洒，妩媚超 逸。

我认识程十发是在 1973 年的文革时期。经过“文革”的残酷斗争，凡为名画家者都早收拾纸笔，被迫下乡劳动了。画坛寂寞、万马齐喑。我哥昌谷由于 他的《两个羊羔》曾获 1955 年国际金质奖，“文革”中划为“三名三高”的“反动学术权威”，几经抄家，没收字画，剃阴阳头、挂牌、游街，然后关押牛棚 3 年之久，受尽折磨，在肉体精神上都极受创伤，以致于 1971 年始，患有肝病，经常住院治疗。1973 年程十发偕夫人来杭，我哥正住 9 溪屏风山疗养院，一为 养病，一为惯常用的躲避政治斗争方法。程十发与我哥既非浙江美院同事，又非老友，仅在画坛上互相知名，并不相熟。程十发的政治遭遇，似比我哥更为严酷，他 曾被两度开除出党。第一次是 1957 年划为右派后开除出党，后“摘帽”恢复党籍，“文革”开始打为“牛、鬼、蛇、神”，再度开除党籍。此次趁政治运动的难 得间歇中，程十发与夫人来杭作短期偷闲，住在杭州东坡剧院后楼的陋室内，是由浙江戏曲研究所的沈祖安安排接待的，行踪甚密，不为外界所知，大约还含有以防 别人求画之意。沈祖安喜欢接交名人，不论是政治名人还是艺术名人，他都主动积极与之交往，故人们说，北京的文化要人们，祇知浙江有

沈祖安，而不知有史行（浙江文化厅长）。沈祖安居室，书房内壁间镜框里，案桌玻璃板下，都是与各名家政治家的合照。政治家中最上能攀交邓颖超，政、佛（教）界赵朴初；影帝赵丹，影后刘晓庆；艺术界则与刘海粟、沙孟海等老一辈结交。诸名家逝世之日，沈祖安必有悼唁文章面世。至于80年代我哥昌谷住杭州洪春桥浙江医院治病时，沈祖安前去探访，被我哥拒绝合影，大约是唯一的一次失算。海上书画名家程十发来杭，自然在沈祖安“如来佛”的掌心上了。

我哥原住韶华巷55号，经抄家、患病后，全家暂住浙江美院内僻处待拆建之破败食堂里。食堂空旷，门窗俱无，于是用砖瓦草率堵塞，由我搭建炉灶，大有先民“笃公刘”携民“周原”的情况。沈祖安竟然到破食堂找寻我哥昌谷，商谈程十发意欲拜会我哥一事。时我哥住院未在家，适我从杭郊进城探母，遂与沈祖安相遇。沈祖安时年50多岁，瘦削、瘪嘴、田字脸，呈烟灰色，脑后见腮，戴近视眼镜，迈八字步。遂约定于次日赴杭郊屏风山疗养院探访我哥。程十发当时应该47、8岁，他幽默诙谐，一路上妙语联珠，令人发噱，若干年的政治磨难并未能使他气短。但那日屏风山疗养院内两个知名画家的历史性会见却出乎意料的淡漠！我哥平时热情好客，谈笑风生，可是那一天对远道而来并专程到医院看望的程十发，虽态度坦然，却没有多话，彼此也未涉及绘事，祇是普通的喧寒问暖而已。作为画家，艺术不被承认，而随时会失去作画的环境与条件。可能是彼此都触景生情，狐兔之感油然而生吧？

数日后，我到东波剧院后楼代我哥向程十发作回访，在临时的后楼居室中，居然铺有临时搭建的大画桌，略陈文房 4 宝。其时程十发为我当面作了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少数民族少女，头顶瓶花，其右边侧立 3 头卷角绵羊：一为头部正面，一为头部侧面，一为头部背面，当寓“三阳开泰”美意。上题“素子同志正腕”，下署“云间程十发乙丑秋”。据他说，此画所用宣纸，是一张他珍藏多年的旧宣。

70 年代中，钱君匋为我向沪上诸画家求画，既求得来楚生、朱屺瞻、丰子恺、申石伽诸人画之后，当这本画册转到程十发手中时，他家又值“批黑画”运动而被抄家，连同我的这本画册亦被抄走，此后石沉大海，“落实政策”以后，也未见发还。抄家时程十发家的情况，他的心情如何我就无从得知了。我哥昌谷当时被“批判”的一幅画为“荔枝熟了”，他画的是傣族少女肩挑荔枝和香蕉花，设色艳丽。批他有印象派画风且勿论，竟称他为“卖国贼”，正是匪夷所思。至于 1973 年程十发送我的此件“三阳开泰”则幸存篋中。

陆俨少

近几年来，中国画进入拍卖市场。我手头有数份大陆、香港、马来

西亚等大拍卖行宣传资料以及价格表，其中陆俨少的书画价格相当昂贵，仅在张大千、徐悲鸿等以下，却在先辈蒲作英、吴昌硕等之上。

陆俨少上海市嘉定人，他从何人习画，究竟毕业于何校，在何处打成的右派，我均不知其详。祇知中年生活相当颠沛，战时避难，入川，曾经三峡历险（当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从渝东下）。青年篆刻家石开在己巳（1989年），为其所刻数方闲章上可以窥见其端，如“算来一壑最关情”和“曾犯峡江险水来”白朱二方，后者边款为“陆俨少先生曩年曾举家乘木筏自峡江而下，历尽风险，今属刻此印以为往事记，己巳三月望”。以三峡之险，且乘木筏而举家同经，足令垂老难忘！陆俨少又曾避难浙江德清上柏乡，石开为其刻有“上柏山人”印章。在80年代末，俨少曾欲仿钱君匋在桐乡梧桐镇建艺术馆之举，拟于上柏建纪念馆，后此事竟未能如愿。至于为何不欲在嘉定故里建馆扬名后世，不得而知，然在俨少字画上，每每能见“嘉定”、“嘉定陆俨少”等印章，可见他对故乡之情老而弥笃。嘉定在明季人物有“嘉定四先生”（同代人编有诗集或称“嘉定四君”）——四先生为娄坚、李流芳、唐时升、程嘉燧，4人均为诗人兼为书画家，前3者为当地人，而程嘉燧则为新安（属安徽）人侨寓嘉定，他的画即被后来称作新安画派（或称黄山画派）的先行者。嘉定自明末至清前期还以竹刻着，可谓竹刻之乡，其间出过不少的竹刻名家。想来嘉定的传统文化和艺术土壤曾给陆俨少以不少的滋培。

我见到陆俨少是在 60 年代中，“文化革命”前夕，那时他受聘于杭州浙江美院，其前似在上海画院，此次他独自来杭，未带家眷。他的画艺其时虽然已达 炉火纯青，为他一生中最高境界，可是在那个无视文化的年代他没无闻，独来独往。他在浙美诸多老师中，唯独与我哥昌谷最为相契，我哥对陆俨少的书画成就则 推崇到 5 体投地的膜拜程度，虽然当时我哥年仅 30 左右，而俨少已在知命之年，然两人却成为忘年之交，日日相聚。那时我哥和老母居住南山路涌金门韶华巷 55 号，离南山路浙江美院仅数百米，陆俨少不但日日光临，有时还一日数次，如同家居。韶华巷在西湖东岸“柳浪闻莺”附近，55 号为一个独立墙门，内有前后天井，楼上楼下 4 个居室，临巷二间平房，其中一间作为厨房，并作出入之门。整幢房为青盖瓦，室内红漆地板，深巷小楼，宁静舒适。房主为无锡籍、于上海 40 年 代名舞女顾曼卿。中共建国后，顾氏不及去香港，遂将平生积蓄购买此屋以度余年，后期经济拮据，遂出租二间大房。至于顾曼卿其人其事足可写一部艳史、泪史， 此刻又当别论矣。浙江美院素乏教师宿舍，因其临近该校，遂租赁以分配与教师居住。楼上西侧为一套间，为我哥及老母居处，楼下东侧一间则为诸涵（诸乐三之 子）所居。顾曼卿有洁癖，要求一尘不染，故红漆地板光可鉴人，虽非豪宅，然甚雅致。我哥居处南向为整排玻璃窗，下瞰庭园，临窗陈放红木大画桌。我哥喜古 董，故案头笔洗、笔挂、画具等等，一律非寻常之物，壁间张挂名家字画，精雅别致。陆俨少每来，必落坐于东侧画桌之前，我哥必预陈纸笔，供其赏心时随意涂抹 消遣。无论我哥或有事暂离，俨

少亦随遇而安，不受拘束。我母形容陆俨少：“喝喝茶，圈圈画。”陆俨少笔意似石涛，画草似圈形，饶有风情。陆氏在我哥家所作字画，并不携归，或随手丢入纸篓，或收拾一边，故我哥家有陆氏那时的字画甚多，即使后来经过“文革”的涤荡，仍然有所留存，我母收藏多幅，后来均转送与我。其中有一幅为陆俨少与昌谷照阁饮茶图，高古清新，在其作品中属上品，可惜被人所“豪偷巧夺”。又于1994年，另两幅俨少山水画被人借去不还，至今梦魂系之。韶华巷离积善坊大华书场仅数分钟行程，我母善听评弹，我哥时时伴随，时我女二幼祇得3、4岁，寄养于我母处，评弹演唱时间为下午1时至3时，正是孩子午困之时，若陆俨少适来寓，我哥即托他于二幼睡醒之时照看片刻，他均乐意胜任，甘为孺子之牛。陆俨少在清贫时，与我家有一段墙头呼酒的朴素交情，而我家对于他的成就，亦早在60年代未成大名时已是倾心服膺。约1965年，我们尚在兰州，我哥昌谷曾随信寄来陆俨少所书毛泽东韶山行“故园三十二年前”4尺3开直幅一张，陈朗十分激赏，张挂壁间，时时观赏。此幅字亦遭劫不存。现存者尚有横幅书诚斋诗3首一幅。除陆氏在韶华巷的随笔山水画外，直到1983年间，我才又正式得到陆俨少所赠具上款的“峡江拉纤”山水直幅，都属上品。

我未见过陆夫人，据我哥讲，夫人极其贤惠，曾在某次政治斗争中，陆俨少受批斗，因身体欠佳，夫人亦上台亲手扶持陪同，相濡以沫由此可见。

“文革”结束，陆氏因其高寿、功力，在画坛逐渐大红大紫，他终于撑过艰难的岁月，老树逢春，名满天下了，但是他的画品，似以其60年代的清静无为，无利欲扰人时境界最高，我所收藏的数幅正是该时佳作。

陆俨少因其字画价值过于昂贵，约在80年代之末，他的日常所用印章几乎全部遭人偷窃，现时书画膺品充斥市场，而以陆氏所作最难办认，因为字画虽假，而印章往来的真的，又是常用章，故为鉴别制造不少疑阵。陆俨少1989年后所用印章，一律出自福州石开之手。石开生于1951年，是陆俨少后辈的后辈，以名满天下的80多岁高龄之大画家，能赏识他并嘱刻全部常用印章，可见石开的功力之不寻常了。石开之名为其父所取，原姓刘，后来石开得知3代时刘姓靠屠夫发家，石开好禅，遂恶之不复用，乃以石为姓。石开16岁从福州谢义耕、陈子奋学印，早在70年代即刻有《百花谱》，请郭沫若题签，广赠书画家。那时，即与我哥昌谷交往，曾以巨石刻“周昌谷印”4字为赠，边款云：“拟秦汉，钤巨障。石称寿，用者昌。谷公大教，清狂赠石，石开并识。”他对我哥相当推崇。赠石之“清狂”，盖吴进也。石开曾在闽北吉舟乡务农5年，因自号吉舟居士。石开斐然成家。不但与陆俨少交谊深厚，非常有缘的是，他为我哥昌谷刻印后，又为我堂哥昌米刻有“周沧米印”“雁荡山民”等印章。1991年又为陈朗刻有“念柳客”、“陈朗”、“西海牧竖”诸印，在“西海牧竖”边款上刻有“朗

老诗翁曾贬 居西海自号牧豎辛未二月”。盖陈朗则于青海牧豕 13 年，石开为其刻石以永志之。

石开刊有《石开印存》，为沙孟海题签，扉页有陈子奋题词，由陆俨少作序并亲书之。陆俨少在序言中对石开刻印渊源、流派、成就评述甚详，赞许备至， 誉之“不衫不履，不事修饰”，且在篇末有云：“予以为笔墨之道，出传统而不为传统所缚，与石开治印有相合者，所谓老年变法，不在面目之间，如得其理，由此 而进，不激不挠，轨辙自得其极也，自有水到渠成之乐。由此而言，予之画与石开之治印，取径相同，则以其印施之予画，必无凿枘之憾矣！故乐为之记。己巳 3 月 （1989 年）春 3 月八一 叟陆俨少并书于湖上之晚晴轩。”由此可见陆俨少对石开的刮目相看了。《石开印存》中，有关陆俨少行踪及其心态，如“平生不欲随人 后”、“曾犯峡江险水来”、“不羨神仙羨少年”，性格神情跃然石上！

1986 年我哥昌谷终因“文革”中身心重创，10 年多来药石无效，于该年 9 月歿于上海瑞金医院。陆俨少暮年失去贫贱时的挚友，白发泪眼，伤痛可知。我哥之墓志即由陆俨少撰写。

陆俨少晚年以居杭州“晚晴轩”为多，曾在深圳购屋，故亦时在深圳居住。1993 年逝于上海，享年 80 又 5。其前一年，包立民为《百美图》征稿，曾于其上海病榻间请他自作画像。

（全文完）

悼念程海果

（新西兰）周素子

海果去世了，虽然近年以来她的身体已逐渐衰败，但对她的去世还是觉得突然。我一直没有觉得她已步入老年，她是不会老的。在《北京之春》今年9月号的封三上，有她与方励之夫妇的合影，还是充满活力，没有病容。可是她去世的消息是真实的。

2007年暑期，她参加了洛杉矶举行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会”后，逗留美国期间，由胡平来电相约，我和海果通了电话。我们在电话中作了长谈，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的会面，过去将近30年了，都老了，她说她身体不好，独自在巴黎居住，深感孤独寂寞，我劝她争取时间写下自传，纪录她坎坷不平凡的一生，是给后世的财富，这一代知识份子的遭遇，是对专政的控诉，一定要写下来。她又提到前些年曾在澳洲居住过四个月，但那时她不知道我和陈朗在奥克兰，否则纽澳相近，可以顺道来访。我们邀请她，条件许可时，一定来奥克兰小住。但是她去世了，不可能如愿了。

1980 年暑期，海果从金华市来杭州访问过我俩，在我们武林村的阁楼里，住过多天。那时国内正是“落实政策”的时期，幸存的右派们纷纷回城参加工作，我也从乡村回城工作，在一所中专教书，正是 40 多岁的壮年。海果虽然不让“摘帽”，但她也被落实在金华市文联工作。一经安排，就有许多人找她办事，大多是法律方面的事，人们信任她，觉得她有能力判断、找门路，她原先是学法律的。人们明白，在中国这个权大于法的国家里，一个曾经坐牢，今日又并非身为律师的人，能有多少能量？但是人们还是以为通过她的能力、关系可能解决问题，甚至连出版书籍也托她找门路，那次她来我家，即带了曹天风的诗集〈水平集〉，来找寻出版机会，寻求门路。她的热情奔放、助人为乐、天真烂漫，给人印象至深。她的个性并不因为磨难而变成冷酷！

在我阁楼的某个深夜，我俩曾经深谈，她责备自己不是好妻子好母亲，她觉得自己不应该结婚，不应该为人母，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她母亲带大的。她是思想家、革新者，她是社会的，不属于个人的。这个世界未能提供她施展的机会，是社会的过错，社会的不公。

我和程海果有太多的共同处，我们同是上世纪 50 年代的大学女生，年龄相仿，我们是小同乡。她和陈朗同是浙江温岭人，我的乐清县与她是相邻而居，说着同样的方言，且同时被沦为右派，得到同是下

乡劳动的处分，只是她比我更惨烈，陷身囹圄多年，后期关在浙江永康的一个劳改农场里。

但是她与我又是不同的，她观点鲜明、有思想、有抱负，她的右派当得轰轰烈烈，全国声讨。在反右初期，我钦佩她，我在报章上识得她，她当然不认识我。她在廿多岁的即是文章高手，洋洋数万言，言之有物，有改革纲领，这才是右派。而我算什么？我糊里糊涂当了右派，戴了帽子，还问别人“右派隐藏在哪里，什么是右派”？还期盼党国有一天会告诉我，给我平反，说他们反我反错了，幼稚可笑，有负于这顶大帽子。在反右前，我不过问政治，平日不看报纸，头脑里没有一颗政治细胞，成天努力学习钻研业务，期待今后当个教授。我和海果又是相去太远，那个时候我俩互不相识，可我知道她，她不知道我。

1980年以后约81年，82年，海果到北京寻找胡耀邦等老关系，想通过他们达到摘帽、创造前程，她逗留北京较长时间，并数次到北京。因为与陈朗老友陆阳春也是老师，由陆阳春介绍给陈朗，尝借榻在陈朗和平里的寓所，那时陈朗从流放地甘肃返回北京不久，先住和平里，后住团结湖，算是我们在北京的家。二幼、三幼也在北京求学，周末都在家。海果到北京活动不止一次，大都住我们北京的家中，与二幼、三幼结下很好的友谊，在给我杭州的家信中常常道及海果种种。

我在上世纪 70 年代已被赶出兰州，曾流落在陕西富平一带，后直接回到杭州，得以落实在杭郊谋生，故在一九七八年“落实右派政策”能回杭城工作，我们有南北两个家。孩子们小时住杭州，长大后到北京上大学，故海果在北京活动期间，在家庭成员中独独没有见过我。孩子们在寒暑假回杭度假，不但带来海果的种种讯息，还带回她遗留我北京家中大袋小袋的东西。

我在杭州见到的海果，虽在中年，仍然朝气蓬勃，仍然信心满满，似肩负千斤重担，仍然敢说敢为，不畏强暴。15 年的劳改生涯，并未击垮她，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也是一个可爱的人。

可惜的是党国没有肚量容她，不能利用她的智慧，她在国中不能容身，即使她不出国也不会得到施展，因为她锋芒毕露。

我和海果仅在杭州一面之交，今后天南海北再无会期，海果先我而去世了，她的未竟的理想、抱负，要在中国实行民主，这有待我们的努力。我相信世界潮流如此，民主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与目标，这迟早也会在中国大地上实现，那时后人千万别忘了祭告海果在天之灵！

有关程海果（林希翎）的文字，我在拙著《右派情踪》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录。《右派情踪》2008 年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 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禁书禁闻禁片大陆直连: <https://goo.gl/C6xxGf>